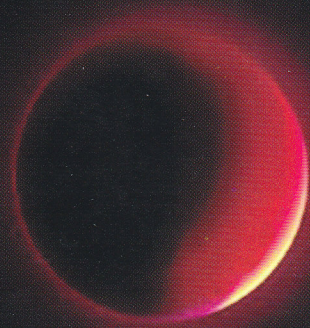


黑色文库 第七集



黄湛 著

永远的北大荒

黑色文库



劳改基金会出版

黑色文库 第七集

永远的北大荒

黄 湛 著



劳改基金会

华盛顿

2004

目 录

出版缘起	9
从黄湛悲剧看中国人的宿命（序）	林达..... 13
前言	19
第一篇 “三民主义”——大镣的别名	
走计不成 悔恨终生	23
入监受刑险丧命	37
交响乐和电话机	46
死神手下留情	49
充军万里	53
第二篇 雪原因徒	
狼与暴风雪	61
“劳改”工程师的艰难	71
第三篇 天灾乎？人祸乎？——饥饿变奏曲	
鼠口争粮 纓子救命	87
饥饿众生相	92
第四篇 无墙之囚（1961—1968）	
留场就业海伦农场	103
巫士黄湛	108

第五篇 下放农村十年

下放成了无期徒刑	113
文革期间的劫难	115
天打雷劈遭报应	124

第六篇 亲人挽歌

两岸遗恨	133
八弟之死	137
大哥的冤狱	141

尾声 重返流放地

回家	147
宽恕	149

附录 忆熊韞石兄长	151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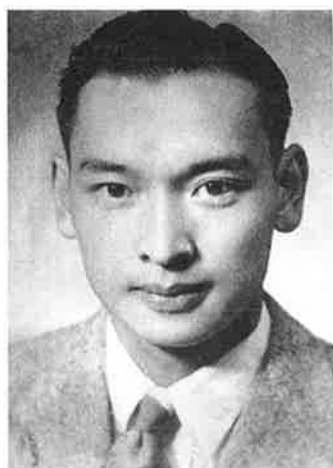
全家福，中立者即黄湛。1931年



中间的白须老人为黄父，其旁为舅父朱，朱右抱小孩者是黄母，朱后即黄湛，其左为黄清，黄清左二为黄澍，右端戴军帽者为小弟黄治，其余为亲属。摄于昆明黄家花园。1946年春



黄湛大学毕业照。1935年



黄湛最小的兄弟黄治(1929-1976)，1976年于监中被处决，1990年才被平反。



左起：堂姐夫、大哥黄汶，三哥黄湛，五弟黄清，六弟黄澍，七弟黄泽(于19岁死于伤寒) 八弟黄治(1976年在监狱受迫害并被处死)。1931年



黄湛夫妇。1985年



黄湛的父母和妻儿摄于昆明。1956年



黄湛和长子合照 1996



黄湛在镜泊湖的留影 1984年

出版缘起

劳改作为中共专制统治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远在其建党未久，在其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革命根据地”已存在了。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参照了当时苏联的劳改制度，在斯大林派来的“古拉格”专家指导下，溶合了毛泽东的“改造与生产结合”的思想，发展出这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狱制度。劳改是一套政治工具，一方面要消灭犯人的独立人格和意志，剥夺其人身和思想的自由，并美其名为“改造”。另一方面要利用这项庞大的无偿劳动力，为共产政权创造财富。

早在五十年代，中国的劳改犯就被调动去筑路架桥，修河造坝，挖煤垦荒。这些无声无息的奴工为共产政府献出了健康、青春和生命，没有人记得他们。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生命价值的轻贱和蔑视，直接造成了对中国人文精神及文化的摧残。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原始疯狂的暴力行为和愚民式的政治运动逐渐式微，而邓小平为暴发户和拜金主义者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了社会发展的金科玉律。二十年的开放政策使中国社会从粗暴进入俗媚，从暴戾走向糜烂。一个经过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批林批孔、四人帮、反精神污染这些颠倒黑白是非、绝灭人性、轻视知识和道德长达四五十年的社会，如果不经过反省、忏悔、痛定思痛和惩恶抚善的过程，怎么可能就直接跨入现代化的社会呢？无可讳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方面有了一定的变化，但是毛泽东架构的极权政治制度，包括劳改制度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中国大陆的社会必须经过彻底的反思，对灾难的根源进行检讨和思辩，重新认识知识和道德的重要性，中华文化中特有的人文主义精神才有复苏的可能，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荒谬无知的悲

剧重新上演。然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几十年的毁灭性破坏，得有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初具成效。这样的净化过程只有在民主制度的体制内，自由和人权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开展。

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劳改犯，是制度中最大的牺牲者。以往共产党将人任意划成不同的阶级。以阶级分贵贱，以阶级区分天堂和地狱。成千上万的人因为阶级出身、思想意识、政治观点、宗教信仰，甚至因为微不足道的个人原因，被共产党政府送去劳改。劳改营里，在“强迫劳动”、“改造思想”、要求人人挖掘灵魂、脱胎换骨的严酷环境下，人被剥夺了意志、尊严、情感和良心，即使肉身备受折磨后，幸能存活，心灵上和精神上所受到的蹂躏和残害也万难愈合。人们在寻求历史的真实面目时，那个时期里，人为因素所造成的历史灾难，特别值得我们警惕。历史巨轮所辗过的苦难者的经历是一面忠实的镜子，幸存者的故事永远是最具有震撼力的。研究和整理劳改营幸存者的生活经历和资料就成为我们拂拭染上尘埃的历史镜子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尘拂。

劳改基金会自 1992 年成立以来，一直锲而不舍地寻访及收集劳改幸存者的事迹和证据，迄今已达五百余份。在当前全球商业化的过程中，世界更倾向于资金财富的集中，文化事业的推动备为困难。虽然在重商业、轻文化的趋势下，不少幸存者非常艰苦地一字一行地把他们的亲身经历写了下来，却苦于无处出版。还有一些人不具备写作的能力，也有些人丧失了记忆的能力。那些来自劳改的呼声和呐喊，那些血泪记录的文字实在应该有一个机会被容纳及保存。这是我们对子孙后代的责任，也是对公正及自由的承诺。劳改基金会愿意，向散布在全球，特别是如今尚在中国大陆的劳改幸存者继续征集资料，整理、编辑并出版这些文集，我们称之为《黑色文库》。

劳改营是中国畸形社会的缩影，它的幸存者就如但丁《神曲》

里那些经过地狱炼火煎熬过的光怪陆离的众生。烙在这些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贱民身上的，是专制政权掌控下国家机器的铁的印记。劳改不仅对这些受难者摧筋断骨，残其躯体，还对他们洗脑换心。他们有些进去时是没有受过完整教育的青少年，出来时已是白发人；即使受过教育的人，一旦被投入这个大炼狱，也跟知识和信息长期绝缘。因此幸存的生还者中大智大勇者有之，圆滑机灵生命力特强者有之，至于心智消磨殆尽，看破红尘，苟延残喘者更占很大部分。《黑色文库》就是要保存这些人的声音，哪怕是文字粗糙，文体拙朴的记录，我们都愿保存其原始面貌。也有人身在囹圄，言不由衷，我们也都不加文饰，原文照登。相信读者自能判断。遇到当事人自己不能亲自执笔的情况，我们则尽量以接近原始叙述的语调和情感予以记录，以求传真。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经历了“失语”的时代，邓小平和他的继承人又想把中国人变成一个“失忆”的民族。让我们来记录历史，为专制政权谱写挽歌，为民族丧失的记忆招魂。

《黑色文库》编辑委员会

2004年5月于华盛顿

从黄湛悲剧看中国人的宿命（序）

林 达

看完书稿的第二天早上，打开电子信箱，看到朋友送来的作者黄湛和他的八弟黄治青年时代的照片。

书稿中，那 30 年牢狱下苟延残喘的黄湛印象，那被冤杀的黄治，都还鲜活地留在脑海中。此刻，骤然看到青年黄湛和黄治的照片，无法不感受强烈的心理冲击。

那是 1935 年的照片，年轻的黄湛戴着学士帽，穿着毕业的盛装。他显得自信，却还带着涉世不深的天真和腼腆。他一定心情愉快，在照片斜角，他略带装饰地用英语写道：给我亲爱的父亲和母亲，这照片证明你们钟爱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了。

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黄湛对人生和未来充满憧憬。聪慧的少年黄湛在 13 岁那年就中学毕业。虽然战乱使他的大学生涯几经周折，可照片上的这一天，他还只有 19 岁。此后的 14 年里，中国始终处于战乱之中，大局势的动荡，固然会影响到每一个人，可是，社会环境还是宽松的。作为一个积极进取的工程师，还是有发挥自己才华的机会。他循着朴素的、要造福一方的古训，也循着人自然拥有的创造欲望，以一颗年轻的心，积极地挑战着自己的能力。渐渐地，他不仅在工程技术上成为一个出色的专家和管理人员，也成为社会中的一个有责任心的公民。他娶妻生子，尽孝报国，关心周围的朋友，也参与一些正常的政治活动，在家乡还被选为国大代表。33 岁，正是他成熟起来、开始实现自己抱负的时候。

照片上作者的八弟黄治，是一个美少年。看了照片，你绝不会怀疑亲友们的回忆：他如何格外受到母亲的宠爱，也如何得到

周围女孩子们的仰慕。

这两张照片让我们相信，他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光，有过一个正常的生活。

就在黄湛 33 岁的那一年，1949 年，中国发生了政权的变换。这个变换被称之为“革命胜利”。很多人没有料到，法律的界定、罪与非罪的概念，这些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文明规则，都产生了本质的变化。大量在前政权的机构担任过职务的人，在前政权的部队服过役的军人，曾经持有与现政权不同的政治观点、参与过寻常政治活动的人，等等，都突然变成革命惩罚的对象。即使他们没有任何反对现行政权的言论或者行为，他们都被以一种推论的方式，被度测有可能对新政权“腹诽”，仅此，就被定为一种新的政治罪行：“反革命”。而多年前的正常职务，可以被定罪为“历史反革命”。这样的罪名一度在这个国家成为最可怕、惩罚最严重的罪名之一。

人们在前政权下生活的时候，当然也要吃饭穿衣，要吃饭穿衣就要找工作，就会有大批人在政府机构任职。在前政权下生活的时候，当然也要正常地思维和进行社会交往和活动。人们在工作的时候，养活了自己，也造福了他人。没有人认为正常的工作和职务能够变为一种罪名。人们更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拥有怎样的亲戚和朋友、持有怎样一种人生观、参与什么派别的政治活动，就会是一种刑事犯罪。这是文明社会的常识。

依照这样的常识，世界上很多国家，在政权轮换更替的时候，社会并没有什么大的动荡。人们照常工作，持续自己的日常生活，乃至维持自己原来的政治观点和正常的政党活动，而不是在轮换一个政党执政的时候，就要造成平民的巨大恐慌。

假如这样的情况发生，问题当然不是出在被迫害的民众身上，

而是执政的政权，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史称“法西斯”的性质。这样的情况，在此之前已经发生过，如上世纪 10 年代的俄国，以及 30 年代希特勒上台时的德国。

本书的作者黄湛，鉴于这样的历史先例，在一些朋友的警告下，曾经准备在政权交替之际逃离家乡。可是，只因三天的犹豫，黄湛失去了机会。

看上去是三天之差，实际上折射出黄湛和千千万万个普通人，内心都在挣扎之中。直觉的感受，是故土难离，亲情难舍。内心深处，却是无法真正相信：无罪也必须逃亡。我想起我的一个经历 21 年政治冤狱的朋友李梧龄，少年的他当时已经随亲戚抵达台湾，却又折回返来。黄湛的小弟弟黄治在军校毕业后，曾在军队任低级军官，从未上过战场。母亲不舍得他离去，他也犹豫着，留了下来，决定重新进大学读外语。1949 年的黄湛和他们，就在这样的犹豫之中，永远地失去了自由。

在所谓的“镇压反革命”、“肃清反革命”的“政治运动”中，大量无辜平民被冤捕冤杀。而这几个清洗运动的发生，较之后来的“反右派”、“文化大革命”等，其年代更早。被网入其中、还能活到所谓“平反”的幸存者也更少，因此，这段历史的回忆文字，也要相对少得多。黄湛的回忆录也就显得格外珍贵。

作者在记录自己和亲友经历的时候，旁证了在世界已经进入现代社会的时候，一个大国如何倒退到中世纪的黑暗。没有任何像样的司法程序，没有任何制度上的约束，政府杀人如麻。酷刑逼供，甚至陪杀都成为逼供的手段。黄湛本人无罪却被判 15 年刑期，没有看到判决书。在所谓的“刑满释放”之后，他和其他被称为“劳改释放犯”的人们，依然被变相地囚禁在劳改地，回乡无望。他在读着大学的小弟弟黄治，无罪而被“内定”五年徒刑，却没有任何人通知他刑期，导致他在被关了三年半的时候，绝望

外逃，被抓获后又改判无期徒刑。最终只因公安部长一个臆断的杀人比例，黄治就在饱受几十年非人折磨之后，被无端改判死刑，遭到枪杀。作者出身著名将领之家，在五十年代，他所有的兄弟都进过监狱。大哥黄汶和小弟黄治，再也没有活着离开监禁地。

我们作为读到这本书的后辈同时代人，在作者面前，也不得不深深地反省自己。虽然当时新闻受到钳制，资讯有限，可是，我们并非不觉不晓。大规模迫害发生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对所谓占人口“百分之五”的“黄湛悲剧”转过头去不看。直到祸水泱泱，高涨到文革，从我们所有人的头顶漫过。可是，当我们露出水面，庆贺自己的幸存，几乎立即又忘记了，水，并没有退尽。黄湛告诉我们，他生性软弱的大哥，直至去世的1986年，还在劳改农场领导的威胁下，不敢为自己的冤屈申诉。直到他去世之后的1987年，他的孩子才从法院取回那张已经失去意义的“平反书”。这本书也在提醒我们，直到今天，我们的法治建设依然远没有完善，作为“行政处罚”而不是“刑事判决”的劳教制度，今天依然存在。也就是说，未经司法审判的监禁，在2004年的中国，依然存在。“黄湛悲剧”，并没有过时。

以个人回忆记录历史，牵涉大量细节，是这一类文字最珍贵的地方。可是，把这样的回忆诉诸文字，却是需要巨大勇气的。作为读者，我们都感觉不忍卒读。对于作者，每一段文字，都是旁人无法体验的生命、尊严、精神、肉体遭受践踏的痛苦历程，也是自己从一个身心健康的正常人，为了生存而被迫扭曲改变自己的过程。当你被迫跪倒在地，当你写下羞辱自己的文字，照片中那个年轻骄傲的黄湛，就被碾碎了。心中曾有过的，维持一个完整自尊的自己，这样的美好心愿，就已经永远不复存在。写出这个过程，是重新听到自己被社会模具活生生压塑时，别人听不到的、心底的大恸悲声。那是一个最好不去触动、封存起来的角

落。可是，作者艰难地把它打开，展现给公众，正是他清醒地意识到：这不是个人抑或家族的命运，这是“中国的悲剧”；他在记录的，不仅是个人的遭遇，而且是这个国家的人权历史。他是在为他的子孙、我们的后代，拥有和维持一个正常的人的生活，提供历史警讯。

黄湛的书令人感动，还在于他让我们看到，哪怕在最幽暗的深处，人还是可能坚守一个不被邪恶战胜的灵魂。在漫漫长夜中，只要出现一丝机会，黄湛就开始在创造性的工作中重建自己的自尊。人们会惊奇地发现，在历史上，善总是弱的，可是，就是这善良之星火，不会熄灭。它驱退黑暗，推动人性的进步。黄湛让我们具体地看到，邪恶能够糟蹋他这样一个弱小的个人，可是，却无法迫使他也变得邪恶。在黑暗年代，邪恶像瘟疫一样蔓延，吞噬着人们的心灵。而终有这样的人，有善良的天性，有智慧和坚持常识常情的能力，有创造的欲望和本能。他被剥夺了一切，几乎已经被砸成碎片，可是，他一生都在建设，造福他人。这样的精神底气，来自他年轻时曾经拥有过的健康的生活环境，使他通常识之理，晓常人之情，建立起他做人的不变根基。正因为有了一个这样的人，良善，才穿越重重黑暗，传递下来，传到我们手中。

今天的中国尚在摸索前行之中。我们有时候听说，我们不需要抄录别人的价值观，我们要建立自己的体系。可是，有了这本书，在需要作出选择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黄湛和所有的受难者，他们永远站在那里，在提醒我们：价值观不是抽象的概念，并不因“你们”、“我们”、“他们”而存在区别，因为这是一个共同的人类。读过这本书的人当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所谓价值观的判断并不复杂，可是，定要有一个起码的标准，那就是：必须“以人为本”。

前 言

吾常感世事之不平，黑白不分，善恶倒置，因果无常，强权即公理。真、善、美与假、恶、丑在强权之下，混淆难分。余在耄耋之年，勉然作此书，聊以告慰无数无辜之灵，并遗之后世，知社会进步之艰难，上、下求索之坎坷。

诗二首

留后世

七律（之一）

天道无常因果空，世事颠倒愤不公。
毕生为善累遭难，作恶多端运长红。
光明正大劳无功，钻营献媚反道通。
强权公理无明处，留待后人论去从。

恨难消

七律（之二）

老骥伏枥恨未消，亲历遗篇似嫌少。
坎坷风险难数尽，九死一生硕果多。
浩渺烟波今犹在，坦荡胸襟化长歌。
安得自由遍大地，香祭乃翁舞婆娑。

第 一 篇

“三民主义”——大獠的别名

走计不成 悔恨终生

“一着走错，全盘皆输”。命运往往取决于顷刻之间。

我自 1935 年毕业于云大土木工程系，一直搞的是铁路勘测，修公路桥涵。1944 年以后，搞昆明市自来水供应工程，不过区区一自来水厂厂长。己之为人，从不做亏心事，光明磊落。由于不了解政治，而又不自觉地涉足政治，更不了解共产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以致于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被极权专制机构打入十八层地狱，比狗不如地过了卅多年。不但自己智慧、知识和血汗的硕果变成嗜血者晋升的阶梯，还因身陷囹圄，戍边万里，而无法奉养慈爱双亲天年，无法分担发妻教养子女之辛劳，还连累了内兄罗曙的夫人和他唯一的儿子。

那是 1949 年，我 33 岁的事，而今已近半个世纪。老妻过世之后，睹物伤情，长夜难眠……。

1949 年，大陆上国共两党殊死之斗已达最后阶段。11 月底到 12 月初风传“云南起义”只在旦夕。有钱的人全家走，到国外去做寓公，没钱又不能耽下的，盘算着个人走。我想父亲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从辛亥革命、护国起义后没有介入国共两党之争。而自己不过是市政府下面处局级区区干员，1946-47 年，在三青团任职又没有干过见不得人的事。至于“国大代表”的头衔不过是藉父亲的威望，在祖籍边远穷乡镇沅县当选的。自己是家中的嫡长子，上有老，下有小，能丢下不顾吗？1949 年 11 月前我是不想走的，但有些朋友告诫我说：“别人还可以考虑考虑，但你是非走不可的。”卢国良走前也慎重地对我说

过同样的话。尤其是美国朋友哈雷几次说：“You absolutely can not stay there!”

最后，我于11月底才决定走，并接到内兄罗曙从香港来电，要我送他夫人到香港。他已随军于49年初赴台。飞机票是12月4、6、9号都有，要我赶快决定。由于罗二嫂要走，罗大哥于11月30日接二嫂回去。我的同学朱子英（卢汉副官兼警卫营营长）悄悄暗示我起义就是近日之事，我赶到大哥家问罗二嫂哪天走。她说不了解情况，由我决定。

我说：“由于太仓促，6号走吧。”

正说间罗大哥从外面回来：“6号走？不行！不行！她才回来住几天，你就要她走，我不答应。”

大哥罗曙，是辛亥革命云南元老罗佩金将军长子，他一生吃、喝、玩、乐，花光了罗家数世积累的整个家产，这时已是一个地道的酒鬼。

他说：“6号以后哪天有飞机？”

“9号有。”

“那就9号走吧！”

我又说：“外面风声很紧……”

“三天到不了哪里！”当时大哥二嫂都说。

没想到12月9号云南起义，未能成行。我碍于情面，又缺乏警觉，更不能审时度势，终铸成大错，以致于忠孝不全，自己九死一生，老母娇妻历尽艰辛。而我远徙北大荒，茫茫雪原一囚徒，“吃的是草，挤出来的都是血。”两次险遭枪毙，累得一身病痛，五痨七伤，双眼几近失明，两手空空，一贫如洗。

老伴及二嫂，靠缝衣服、拉板车、做小工，养大了失去受教育权利的、被歧视为“黑五类”、“狗腿子”的儿女们，大半生吃尽人间苦，到头来仅够温饱，还免不了断腿而死。

是我的命吗？亦或是中国反复折腾的一幕悲剧？但愿从这些真实的篇章中，读者能看到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极权专制制度的一点揭露和要求人权的几声呐喊。

我出生于 1916 年 4 月，当时父亲黄毓成（字斐章）正率领护国第四军（挺进军在广西白色大捷后增编的）挥师北上，进入川黔境内，支援护国第一军（蔡锷任总司令，罗佩金任总参谋长）定鼎西南。其后袁氏败亡，父亲晋升为陆军上将，任驻北洋政府地西南军事代表。婴幼儿时期的我，随父母亲住在北京。父亲目睹国事日非，辞职回滇。又奉命去广州作为滇军代表，支持孙中山大元帅的临时革命政府。而任副元帅的唐继尧与孙大元帅貌合神离，欲取而代之。父亲几次劝告唐“以大局为重”，终不能为唐继尧所容，只好出逃上海，母亲带我和五弟住上海棘斐得路将近十年。

我 5 岁启蒙读书受教于母亲。母亲朱玉芝，是石屏名儒朱攸园之次女，毕业于昆女师的高材生。1915 年经唐继尧作媒主婚嫁给父亲。唐继尧和父亲、叶荃、赵又新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曾结拜为兄弟。

我幼时非常淘气，总想爬到最高的楼房上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一次由晒台上爬到遮住整个天井的蓆蓬上去看晚霞，踩通蓆蓬几乎摔下三层高的楼房。又一次在夏天的午后，天很热，我们全家还有大叔（舅舅）、大舅母和他们两岁的女儿朱竞，去泸西半松园玩。那个地方很大，他们正玩得高兴，只顾看对联，人又多，我（六岁）、五弟（三岁）、竞妹（两岁）三人与大人走散了。我们到处喊呀，哭呀，都找不见。我想起何不在大门口等，其实正好

错过。看着夕阳西下，弟妹惊慌。我忽然看见两条有轨电车的轨道，联想起我们家门口也有这样的两条轨道，于是就背着竞妹，拉着五弟往回走……。实在走不动了，前面轨道又分出两股岔道，我不知往哪边走，又不敢问人，眼看着天快黑了，弟妹们大哭，拖也拖不动。我到处看，终于看到法租界与中国界的界碑。我知道我家在法租界，决定往左转。上灯过后好久好久，才拖着一身泥灰、满脸涕泪的两个小不点儿到家。全家早已惊慌失措，四处报警，母亲抱着我们热泪横流。也许我和“路”就这样结下不解之缘。

我当时总喜欢在大人的麻将桌上，用牌搭房子。在门口的沙堆上“打山洞，架桥梁”，“火车铁轨”还搞了岔道。那时（1922年）唐继尧回昆复辟诛杀同学，许多滇军将领都出逃到上海。一天，住我家的朱玉阶大叔，惊奇于孩子的智慧，曾我和玩：“山洞的火车要开了，嘟嘟！哐哐开回昆明……”他把我牵进家，交给我父亲，说：“这孩子将来准是搞工程的一块料。”父亲叔叔们哈哈大笑。

1935年，我19岁毕业于云南大学土木工程系，尊父命去日本深造。到日本后立即被遣返，当时中日已临近战争边缘，父亲的日军故友不愿再予关照。

回到上海后，我在中国无线电工程学校学了半年，学院在一栋法式建筑内，大约80名学生。教授也姓黄，我和他常在一起交谈，他慢慢知道我的家世。十多年后，我在昆明的街上遇到一位解放军军官，竟是我在无线电工程学校的同学，姓赵。他告诉我学校原是共产党办的，那时的“解放区”需要大量无线电技术人

员。办学校一来培训人才，二来招募人员。他们也曾看中我，后来了解到我父亲是云南地方军阀的著名将领，知道我不可能是共产党培养的对象。我这才了解到这所中国无线电工程学校的真相。

半年之后，课程还没有结束，我决定回昆明去结婚。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初遇妻子罗静娴的那一天。那是1932年，她还在昆明中华女子中学读书，水汪汪的大眼睛，明眸皓齿，举止优雅，令我一见钟情。我们打算在我赴日本之前订婚。她父亲去世后由大哥当家，他认为我并不富有，我们算不上世家，只能算是暴发户，故而反对这门亲事。其实他志在占据罗家的家产，甚至谋害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孩子的母亲因此伤心而亡。他要妹妹嫁给他既能够驾驭、而非比他强又不会依赖他的人。后来，我请求两位著名的将军周中获和金汉鼎出面，他们向罗家大少施压，令他让步。我们终于在1935年我赴日前订婚。

婚礼于1936年2月在我家位于昆明圆通街的大宅内举行，达官要人云集，十分轰动。父亲时任云南省主席的军事参谋，省长龙云也出席了婚礼。婚宴席开180围，千余宾客、侍从挤满了厅堂花园。那时仍兴新娘由四抬的轿子抬进男家。我向朋友借来福特小汽车代替花轿，开风气之先。

婚后不久，我们搬到中国战时的首都南京，像大多数那时的热血青年一样，我一心只想为抗战、抵御日军入侵奉献青春。我非士兵，但深信只有科学才能救国。我在南京考入铁道部工程局任职，工作是勘测铁路新线。到南京后不久，又随铁道部勘测叙昆铁路。当时我廿一、二岁，爱好运动，体魄健壮，爬山越岭，餐风宿露在云贵高原上。从乌蒙山脉到滇中高地，到处都有我们的足迹。几个月后，1937年7月，日军对中国全面进攻，八年抗战开始，半年后日军攻入南京，那时我才刚刚离开近代史上最为血腥的暴力事件——南京大屠杀。其后战事日紧，财政拮据，叙

昆铁路停建。

1937年抗战爆发时，我仍在西南铁路段做事。仗打起来，南方铁路建设成当务之急，我先在昆明铁路局，后在省建设厅工作，那时我已由练习生升到技士（助工）、技正（工程师），常年从事滇缅公路及滇缅铁路勘测。当时，沿岸省份已沦为敌占区，在内地建成通向外国的补给线，对中国至关重要。后来日本攻占缅甸，向外的通道只得再移向印度。在云南崇山峻岭的丛林中测量地形，勘察公路，条件异常艰苦。我们能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为国效劳，只觉得是份内事。建路即建国，正圆了我的梦。日本人终未攻入云南，我在昆明安了家。1938年10月，第一个孩子出世，取名黄梅先。

1942年9月，我被派到战时的民国首都重庆，接受为期六周的军政训练。中国表面上是统一国家，云南却长期被军阀盘踞。龙云从1927至45年是云南的土皇帝，他在抗战期间对国民党采取合作态度。那一年蒋介石命令龙云将云南省政府处级以上官员，分批送到重庆中央军政大学接受军政训练。我当时任云南省铁路局测量大队队长，也在送训之列。两个月的训练主要是政治训导和听国民党的宣传，上课的内容包括“三民主义”，“礼义廉耻”，向领袖效忠，为党国效力。当时看来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我却因短训落下罪名，后来被共产党打成国民党特务。

我搭上一辆从缅甸经云南往四川的小客车，车上大多数是在缅甸赚了点钱回乡的人。我和邻座一个北方人模样的人聊起来，他倒不似那些衣锦还乡者。我们聊得兴高彩烈，车驶到荒野处，他的帽子掉下车，于是要司机停车让他去捡。他捡起帽子转过身来，举起的不是帽子而是步枪。车上还有两个同伙，一车人所带的珠宝、钱币统统缴出。我带了五千元，全数交给他。我想和他还算有点邻座之缘，于是问他可否给我留点路费盘缠，他倒当真

还了我几百元。我想起庄子说的“盗亦有道”。

到达重庆集训班，我们站成一排接受问话，一个个被问，是否国民党员，不是党员的被带走。我从未加入过国民党，也不打算加入，此时察觉情况不妙，于是轮到我时就说是党员，证件留在南京那被飞机轰炸掉的家中。“什么时候入的党？”“十年前”，我随口答道，他们补发我一张党证，从此以后，我便成了有十年党龄的国民党员。

两个月里听了无数轰炸式的训导便毕业了。倒没有接受什么严格的军训。蒋介石出席了毕业典礼。学校方面特意介绍我给这位“委员长”，说我是云南著名的黄裴章将军之子。他说：“问你父亲好，告诉他有事可来找我。”

还在重庆，我就被指派在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昆明分团部任职。从1942年到45年，我在三青团内任的都是无关要紧的位置。1945年，我任了短短的一期分团主任，那是有名无实的头衔，一个月大约只做一天事。我升为主任后不久，因内部人事纷争，我就不再任主任，而只任小差事。我们做得最多的就是在昆明和周围的县搞宣传，要大家信任国民党，别信共产党。与三青团的这段渊源，令我日后啣当入狱，且容后表。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我们勘测了滇缅铁路的许多路段。按说我出身于滇军高级将领之家，虽然父亲早已不任职，但要做官，于我也不是难事。可我总主张实业救国，筑路架桥，风霜雨雪，全不为苦。抗战胜利时，我不过是省公路局桥涵股的股长。我的工作是根据当时的需要，按上司的安排去勘测施工的。1944年7月，日本投降前一年，我担任昆明市自来水厂厂长后，有了很大的自主权，可以根据城市发展的需要以及用户的要求，去开拓经营了，我仍然保留在铁路局的职位，但之后主要做的都是自来水厂的事，说来也属偶然。

我们家与云南水利本有缘。在辛亥革命后，昆明市范围很小，只是后靠园通山，含翠湖，五华山在内的东、南、西、北四城门中。1914年父亲担任云南省水利总办，在任期内，他除了修松花坝水库，疏挖金汁河以外，倡办了官商合股的“跃龙申力公司”和“自来水公司”。而自来水公司到1944年时，已是设备陈旧，债台高筑，惨淡经营。一天，我刚从金沙江边修公路回家，听到客厅里股东代表和厂长向父亲诉苦，恳请父亲向省府主席龙云反映，没有政府的支持将不能供水，只有破产。

我突发奇想，何不接手此厂呢？我从小好胜心极强，人家铺好的床我不愿睡。就干一任吧，兴许对桑梓有益。当时的市长罗佩荣，是妻子的家门叔父，曾劝我“何必收拾烂摊子”，我仍坚持所请，遂由市政府任命我为第八届市自来水厂厂长。

记得我接手时，水厂帐上只有300元现金，卅几个员工。开任命大会时正值大雨，会场上好几个人撑伞而立，大家听我发表“施政演说”。我从维修旧设备，整理财务，催收欠款入手，加强管理。又用厂里全部固定资产作抵押贷到了款，支付电力公司电费，得以运转。其后用美军招待所安装自来水的机会，搞到第一批美军器材。1947年7月又借去南京参加国民代表大会（我竞选为家乡镇沅县国大代表）的机会，向“国际善后总署”要到了美军在云南祥云的输油管泵等一批器材，准备在大观楼外，向滇池取水来供应已比抗战前扩大三倍以上的地区的供水。其间我又参加了滇军对越南日军的受降，考察河内法国建的自来水厂。1948年帮助贵阳市建立自来水厂，派员参加世界自来水会议，还拟就和考察了最好的水源——阳崇海远景供水规划……。真的，我是很有一番事业心的。

但时机不对，到1949年，物价飞涨，货币一再贬值，云南地方政府也动荡不安，哪有钱和功夫来管自来水呢？取滇池水净化

供水的新厂一搁再搁。刚过而立之年的我，不甘心混日子，要干对桑梓有利的事，无奈难以实现，也异常苦恼。因舅父朱向东当时出任卢汉政府秘书长，所以我对于政局动态，也时有所闻。我心想共产党执政后，说不定我的计划能实现，同时我又因在 46-47 年担任过三青团昆明分团主任，而惶惶不安。

就在这风雨飘摇中，我迎来了决定一生命运的 1949 年。

1949 年 6 月，杨大叔耿光回昆欲策动卢汉起义，他曾多次与父亲聚谈。杨杰字耿光，滇军名将，早年护国起义时曾任挺进军梯团长，护国第四军参谋长，是父亲的部下助手和亲密朋友。1949 年 8 月，杨大叔曾介绍父亲和我参加中国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前身“民联”。当时卢汉曾被蒋介石召到重庆，要进一步控制云南政府，整肃异己，作为最后的反共基地。蒋系特务遍布春城。舅父朱向东代主席（卢汉离滇期间）、杨耿光大叔是蒋系特务要杀的头号人物。就在特务监视杨大叔，欲动手的当天，杨大叔越后墙而逃，后辗转到我家。次日一早，我开着舅舅朱秘书长的专用轿车——当时最新式的黑色林肯牌，送杨大叔去机场。八弟黄治是 26 军派系机场的警卫连连长，掩护杨大叔上了飞机，安全离昆赴港。如果不是杨杰后来被蒋帮杀害，我和父亲与共产党的接触将会更具体。

当时昆明有中央派来的各大员，各系特务。但卢汉政府几面应付，我们也静观局势的变化。市警察局长王伟几次向我说起：“你们水厂有异党活动。”他要我及时开列名单给他。我又从厂里一个技术员蔡飞虎口中知道，厂里进步组织为首的是张昆毓和李德生，有十几个人。我没有去惊动他们，更没有开名单给王伟。

相反的我还准许黄强（厂里职员）用三青团的名义，举办歌舞晚会，侧面宣传反蒋支共的进步思想。

有一天翠湖九龙池取水点的机器发生故障，我赶到现场，看到张昆毓也在。检修完毕后，我邀请他回家吃饭，开诚布公地说明自己的观点：

“我也对蒋系政权不满，以后不论谁执政，我们要为市民负责，要保护厂，要坚持供水……。希望我们能够合作。”

他不愿正面回答是否共产党地下组织，但达成口头协议。他们不干涉厂内行政。我不管他们的组织活动，共同任务是保厂。从7月间到12月起义，一直相安无事。

1949年11月底，一天早上，厂里所有职员的办公桌上，突然出现了铅印的一份“约法八章和四项号召”，是以共产党名义散发的。大家哗然，议论纷纷。后来才知道散发此通知的竟是原昆明市长罗佩荣的妹妹罗玉仙，她是厂里的出纳员。

在周会上我公开说：“水厂的机械设备是大家的，谁要破坏，我坚决反对。文件档案是水厂历年办事的见证，不论情况如何，总要妥善保管。大家发现这份传单，不必惊慌，照常办公……”后来我按规定件件做到了。上面第一条就写得很清楚：“凡是伪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只要遵守约法八章，四项号召，不论以前犯了什么‘罪恶’，一概既往不咎。我倒是老老实实办到了。可后来被抓进监狱，一概不许讲，稍有申辩，就立即被封住嘴：“那些事我们知道得很清楚，不用你说……”把莫须有的罪名硬扣到我头上。他们用尽了刑、讯、逼供，但又口口声声说：“我们不搞逼供，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但等口供弄到手就说：“你自己承认的吧！还可以教育别人嘛！做反面教员，也可最后对人民有利……就是宣布枪毙，也是极好的社会教育材料嘛！”

且不说解放初期的“四项口号，约法八章”，就是其后的“三

反”“五反”“肃反”“反右”无一不是“引蛇出洞一网打尽”。

不论是“反省”、“向党交心”、“帮助党整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到后来无一人得到好下场，有的做了“反面教材”——枪毙，有的“自绝于党和人民”——自杀，有的“打入十八层地狱”。等到有幸重返人间，无不是皓首白发，枉有为民为国一片诚心。怎奈青春早逝，壮志难酬，一身疾病，行将就木。哀哉！中国的一代知识分子。

1949年12月23日，那时昆明保卫战刚刚结束，第八军和廿六军围城已经撤走。晚上八点钟，有两个据称是学校的职员，来找黄校长。六弟黄澍当时任省龙渊高中校长，英语专科学校教育长。因为澍弟不在家，我把二人请到书房坐着喝茶，等了半个多小时，还不见澍弟回来，他们就请我再去看看，澍弟刚回来，我就请他们过澍弟住所去。他们去了廿分钟回来，提着手枪，押着澍弟，并要我一同去，等在外面的警察也进来把我们押到警察三署。过几天又被押到地方法院看守所，二月份转到陆军监狱，3月6日保释。

我找到张昆毓质问他：“我们一向相处很好，连我家里的武器枪药全部交给护厂队保厂，没有做过半点对不起你们的事，为什么要整我！”

“这事我们不清楚，绝不是我们干的，等查查再告诉你。”

过了几天他来找我说：“他们是要抓黄澍，你去找他时，他们坐不住了，起来走走，偶然发现你桌子上有半盒废名片，一看是三青团昆明分团主任黄湛。他们二人一商量，决定连你也抓进去……。”

那名片是最初我兼任三青团主任时印的，后来陶榕又扩充了四个分团，昆明分团就改名为昆明一分团，原名片作废。那天我

检查发现此半盒名片，正要销毁，一时有事就忘在桌上。

可见当时无法无天，想抓谁就抓谁。而这一抓，我原来随政府起义的职务就没有了。直到四十多年后，所谓落实政策，依然是推来推去，按政策起义人员既往不咎。因无单位负责，我多次向省高院提出申诉，最后由省高院汇同市自来水厂、省建设银行（我被捕时所在单位）、五华区勘测设计处（我 81 年所在单位）决定平反，但无一单位负责善后问题。我又不得不奔波于北大荒劳改农场和昆明之间。直到现在无人理睬，老、弱、病、衰，一贫如洗，连退休金也无处发放，四处推诿，求告无门。

牢也坐了，审也审了。保释后总认为只要按当时法官告诫：投身革命，好好工作，想来不会有祸了。政治上的幼稚确实可笑，就连当时的法官也不成了日后的牺牲品吗？等到人心稍安，政权巩固，又换了一副凶相。解放初期接管政权的土共、地下党换成了真共。在 1951 年全国规模的镇反中，我又加了一条罪状曰——“混入革命阵营”。

父亲多年赋闲在家，而我们要吃饭，要养家糊口，就必须工作。1950 年 5 月中旬，经过由世交好友马荣标介绍，我参加了东川铜矿勘测队，6 月初出发到寻甸县勘测修路，却又按兵不动，整天无事地街上茶馆喝茶。有一天我一个人去，忽然有人向我借火，随即在我对面坐下轻声说：

“你弟弟的同学×××要我告诉你，欢迎你立即上山，请务必允应，我们来接你！”说罢不等我反应过来，扬长而去。我哪会去上山落草呢？一辈子光明磊落，何须如此。那时城里天天枪毙人，城外天天被抢，连小新街火车站都遭抢劫。我决心不干了，

还是回家去吧！请了假，步行到小新街搭火车，路上差点被土匪追上，幸好跟着邮差走，他路熟，拐几个弯后在草丛中躲开了。

在家中闲了两个月后，经介绍又到交通银行当一名科员。干的是投资审核拨款和清产核算工作，曾到大成实业公司、电石厂、面粉厂清产核资。由于知识面广，工作努力，进展顺利，颇有好评。到 51 年初镇反开始，银行把我调回昆行。我天天提心吊胆，生怕共产党翻脸不认账。

担心的情况很快来了，1951 年 3 月 15 日，天气晴朗，我正在上班，马经理忽然找我去开会，十点多钟来了几个人，马经理刚介绍说：“这位黄湛，这位是×××。”

其中一个人说：“你们被捕了。”

“你们还有什么没有交代的公事吗？”马经理又问。

我摇摇头。有人下令：“带走！”

于是一帮人前呼后拥地走到总行耳房楼上，那里已经有几个人，外面走廊上有兵把守，他们命我们坐在床上，随即打开我们的手铐。

我坐在床边看见床头上放着两个酒瓶，换个地方坐，觉得下面有一块硬东西，伸手一摸，是一支廿响手枪。我侧转身偷偷地取下弹夹一看是满的，我想逃走的机会来了。我可以向门口的警卫借个火抽烟，用酒瓶把他打昏，提着手枪往外冲，大门口只有一个卫兵，解决后逃进菜市人群中。在昆明熟人熟路，随处都可以藏，然后海阔天空，跑吧！以后可辗转香港、台湾……。又转念上有老，丢不下父母双亲，父亲年逾花甲，赋闲多年，诚心信佛，田产上收入甚薄，难以持家，社会上徒有名望而已。下有小，丢不下娇妻和五个儿女，一时脑海翻腾着：“上次都放出来了，我又没做非法的事，充其量判个三年五载吧！忍了，忍了。”我真向卫兵要了火，他摸出火柴给我，我才告诉他：“这里有个

危险的东西，赶快拿走吧！”

从此，我失去自由近卅年。我同时代的很多人，被关过战俘营、监狱、进过劳改队……或者什么集训队、劳改农场。多是在一、二个省内。而我却在其后的年代里，从南到北，不知住过多少看守所、监狱，一直到茫茫北大荒劳改农场，被耗尽了年华，榨干了骨髓。

我们一共十人，用卡车载到大观楼，渡船到庾家花园，交给解放军野战部队看管。隔了半个月开始审讯，要我交待罪行，我答道：

“前次被抓时已交代清楚，保释后我没有犯法，为什么还要关我？”

那人蛮不讲理：“问你以前没有交代的事，你有血债没交代。”

“没有。”我答。

他大怒拍桌子，我也拍桌子。

“警卫。”“有。”“快把他押下去。”两个持枪警卫，连推带扯，把我揪走。

“听！看我收拾你。”他瞪着我说。

隔了几天，早上八点，我被叫出去，五花大绑，押上汽车，共有 12 人到潘家湾体育场，开公审大会。我被按下跪在主席台下前排跑道上，我气愤之极，什么也听不见，心一横管他的。约一小时后，只听见“押下执行”就拉到沟边，硬将我打得跪下去。

“人生谁都免不了一死，何惧之。”35 岁的我历险不少，犹记父亲当年战场豪言，真的做到了面不改色，心不慌。一阵枪响后，我侧着头看看，只有我和另一个没有倒，我大叫起来：（那时还没有堵嘴）“给个快信吧！”

背后那个兵说：“再让你活几天。”

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的腿没有软，奋力一站就往车上走，

而我隔壁那个，是三、四个人把他抬上车的，幸好没丢底，这就是“杀下马威”收拾我吧。

入监受刑险丧命

1951年5月初，我们被送到蒲草田原陆军监狱，押送方法很奇特。用10# 铅丝在每个人右手臂上绞得很紧，当即肿胀，真是死活不管，每隔2公尺，绑一个。走起来一个命令一齐动，二人中间的铁丝不准碰地，也不准挣紧，否则刺刀对付。有一个人因不慎铁丝碰地，刀尖立即刺下，血从手臂涌出。我的左臂麻木肿胀一星期以后才好，这也是闻所未闻的。

我们被送到当时最牢固和历史悠久的市内钱局街陆军监狱。这是一座高墙加铁丝网（带电的）围成的。内部建筑结构，效仿日本曹鸭监狱，分东、西二监，每监五排，各关1000人，每排有20间，各排呈放射状，一头集中于正厅中间看守厅，向四周放射出去，角度为30°，看守于中间坐时，每排都看得清清楚楚，中间机枪亭，四角高墙上有岗亭，虽然就在市区内，却是个鸟也难飞的地方。

在这里，人没有名字，只是一个号码，我的代号是1177。1951年6、7月间，大审讯开始了。白天黑夜都在审，我关在东监一排。有国民党的司令官、军长、师长，还有众多的本省军政首脑人物如：朱丽东、马涣、孙渡、庚晋候等等。一看便知是关朝廷要犯的地方，我不过是小巫而已，怎么也会关在这里？

监规也十分严格，真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每监住十个人，脚对脚地睡在统铺上，六点起床号响，立即起身，把内务整理好。六点十五分看守来开锁，一声哨音顺1号2号依次单列走出到放风场，一共半小时。四周架着4挺重机枪，枪口对准下面，士兵

都处于戒备状态。半小时之内必须大小便、洗脸做操。收风了，鱼贯而入，各人坐在自己被子前 30 公分处，听候点号，完了开始学习。有指定的人念，接着发言，无非是歌功颂德，接着大骂自己……。一坐就是三个小时，原地不动，不准靠被子，不准站起来，换腿统一由组长发令才能动。排道上有凶神恶煞的狱卒，来回监视。如要大小便，由组长报告，单人出号。若有违者，先行检讨，接着立即戴上刑具，关小号。所谓“小号”，大约有四个棺材那么大，一个送水饭的小洞，一个拉尿尿的小坑，转不了身，直不起腰，漆黑无光，潮湿腥臭，关十天出来的人，只会闭着眼睛在地上爬……。

我们吃饭，晴天在操场，雨天在监号，由组长分饭，每人每顿单手捧两掬，吃不饱，饿不死。早上十时吃饭，十一点学习。下午四时半吃饭。之后有半小时自由活动，可以躺下，可以靠在被子上。六点又学到八点。九点睡觉。

接着大审讯开始了。主审的“法官”操云南顺宁口音，满脸横肉，卅多岁。狱卒把我带进审讯室，在一个独凳上坐下，顺宁人就气势汹汹地骂：

“你好大胆，居然敢拍桌子，在我这里你试试看。”

又逼我交代血债，我说：“没有。没有叫我交代什么？”

他大怒说：“对你们这些丘八老爷，不能客气。”接着，他走到我面前，突然抡起手，打了我几个耳光。

“你是军校几期的？”

“没有当过兵。”

“我都看见你穿军装的照片。”

“那是军训。”

“在那里训练？”

“中央训练团。”

“中训团是中统特务，你比当兵的还厉害！”

他硬要逼我交代杀了几个共产党，后来我也火了。

“我有两种说法，任你选一种，你说我杀了多少，我就算杀了多少，要签字画押都可以，但要写明是你说的。另一种说法是按事实，共产党和我不是敌人，我的父辈是追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的人，从来没有做过蒋介石的官，在共产党里外倒有不少朋友。我是搞工程技术的，你们要如此相逼，我就不理睬你。”

他大叫：“这是审讯，你敢不回答！”我仍不理。

他气急败坏，叫来几个兵，把我打翻在地，又踢又蹬，一顿好打。我从小就是一个倔脾气的人，越打越不服。顺宁人怒气不息，坐一边。又换了一个人，装出张笑脸：

“你在中训团第几期？”

“廿一期。”

“受训多少日子？”

“原订五周后延长两周共七周，是 1944 年 1 月。”

“见过蒋介石吗？”

“见过。”

“讲过话吗？”

“讲过！”

“讲些什么？”顺宁人跳了起来：“蒋介石都和你讲过话啦！快交代！”

“毕业时团长（蒋兼任）点到我的名，我立正，后举右手敬礼，有人对他低声说，‘他父亲是辛亥元老，滇军名将黄斐章。’蒋接着说：‘问候你父亲，有困难可以找我。’父亲以后非但没有找过他，倒是 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曾被邀请北上议政，因不愿再涉世事而辞谢。”

“谁要你讲这些，你和蒋介石还谈了些什么？”

我哈哈一笑：“报告法官，我还没有那个资格呢？”这下他更加恼羞成怒，非要我交代，十六军官总队，哪些人是三青团员，昆明分团有多少大、小队；中、小队长的姓名……。”

1946 年到 47 年我曾兼任过三青团昆明分团主任。那是借助我家声望的挂名职衔，实际的事都是总干事（那才是蒋的嫡系）在干，我确实说不出来，顺宁人就大叫要严惩不贷。

“你居然敢抗拒，从严、从严！”一拍桌子站起来。

我心一横就用脚使劲蹬他的桌子，他更加大怒。

“我看你踢，来人！叫铁匠来，让他试试三民主义。”立时两个人进来，提着一副三个大铁环的脚镣，重约十六、七公斤，铐在脚上，双脚只能分开 35 公分，走路时用手提着中间的那个环，磨磨蹭蹭移步，皮肉磨破了，填些布条在铁环与脚踝之间，不几天磨烂了。冬天刺骨的冷，一整夜盖在被子里双脚仍然冰凉，双脚伸缩困难。

这个“三民主义”卡了我 532 天，在监内宣布劳动时才取去。四十多年过去，现在痛风病时常困扰着我，最痛的就是双脚踝骨，时常痛得夜不能寐，这就是“三民主义”一年半伴随着我的“功劳”。

在监号内不准看书报，不准下棋，不准交头接耳，当然更不准高声喧哗、唱歌、哼戏了。那么一天 24 小时怎么熬啊！马二叔（马涣）就教我凭脑筋下棋：炮二平五、马八进七……最初下一会我就糊涂了，后来一熟悉就运用自如了。

1951 年 5 月下旬，天气闷热，在那窄小的监舍里，大家按规定端坐在被子前 30 公分处，读指定有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文

章。脚坐酸了必须组长发令“换脚”才能动一下。室内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一点风也没有。有人在发言，谁也没有去听，时间真难挨！前天上大课说：“你们大家要认真思考，坦白罪恶，态度好的，可以出去劳动改造，你们要向这些天早晨叫出去的人学习，他们认罪好，就让他们到草铺或者是加利泽，到了劳改队，就像到家一样……。”

我们也都知道暗中流传着一句话“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那些早上喊出去的人真的是去劳改队吗？有人相信，有人怀疑。就在那天下午三点钟左右，天下了几滴雨，天空顿时黑云笼罩，从西南向东北有一股股的旋风吹过，把地上的渣子、废纸、尘土卷入旋涡飞上天空，又旋转着落下来，又碰上地面上旋转着的风力，一阵尘土夹着废纸片就扑向我们监舍的窗口。我正站在窗口想吸几口凉气，见一角废报纸被风吹着贴在小窗口的粗铁条上，我一把抓住它，拿来一看，原来是上旬报纸的一半，标题是“反革命遭镇压，市民莫不拍手称快”，小标题是：昨日我市分四个刑场，将 128 个反革命分子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后面有军管会出的布告，并印有被判死刑人的名单。其中有大半数的人都是我们从这里出去“投入劳改”的人。这一下我大吃一惊，谎言被“风”揭穿，真相大白，全监所八人都看了。组长把报纸丢出窗外说：“自己知道就行了，千万不能说出去。”

那知下午“放风”时就传开了，犯人们情绪不安，有人暗暗地饮泣。晚上监管人员都知道了。当夜我被提审，一进门就挨了几巴掌几脚，铁镣太短站不稳，跌倒在地，他们又把我抓起来又打倒在地。凶狠地大骂：

“黄湛，你狗胆包天，造谣惑众，图谋不轨……。是谁告诉你的？……”我一肚子火不敢发作，怕关小号，只冷冷地说：“老

天爷。”其实他们已经调查好了，故意拿我泄恨。动手打得凶的就是那个主审官顺宁人。另有一人较平和一点，问我经过，我照实说了。最后顺宁人命令把我押进小号。

那个小号，不能站立，坐着顶到头，睡下不够长，漆黑无光，脚边一个小坑拉尿尿。打开水洞透进一束光，给我一碗酸臭的菜饭。臭虫、跳蚤毫不留情，混身火辣奇痒……。我昏沉沉地也不知道过了几天。突然，门打开了，叫我出来。我爬出来，已拖不动那十多公斤重的脚镣。两个人冲我屁股上踢了两脚，把我架起拖着走，丢到审讯室地上，顺宁人吼道：

“这回你说实话了吧！是不是你造谣生事？”

我两耳嗡嗡作响，尽最大力气说：“没有造谣……。”

“押回去！”

管它回什么地方去，我想绝不能承认是我造谣，否则“煽动监狱闹事”是可以立即枪毙的。

押回的是原来监号，我关了四天小号，他们对其余七人分别审讯，结果确实是“风吹来的报纸”造谣，那天下午果然有旋风。当天下午“放风”时开大会，他们要我承认“造谣”。我勉强站起才说到“旋风吹来纸”，又挨了几拳几脚。此时心想，不论受什么刑，绝不能承认。我又一次被揪起站着，我只好说：“风吹来报纸我没有看清楚……。”典狱长看看也只能如此下台。

“既然你没有看清，就不能瞎猜，他们确实是去劳改了。随即又拿出一张报纸念了投入劳改人员的名单。最后说：

“黄湛有错不应该乱猜，看来他还能认罪、认错，从宽发落……。”

一会来人把我双手，从后面上起手铐，押回监号。

我就这样戴着“三民主义”大铁镣，又卡上背铐，大小便要报告，由组长请监管人员开铐。吃饭不许别人帮忙，只能把碗放

在地上，侧身卧着吃，这边侧身吃几口，滚过身子，那边侧身吃几口，叫做滚龙饭。到 13、4 天人已经脱形，气息奄奄。第 15 天才把背铐取下，双手已经血肉模糊，发炎肿胀。

旋风底揭穿，欲盖反弥彰。
迁怒取纸人，背铐双手惨。

1951 年 6 月间一天早上，天刚亮，大家都睡不着，静候着从“笼子”里提出去“劳改”，也就是争取当“教员”。排道口岗位上又热闹起来，有很多人的脚步声到门口停住了。小洞口打开，有人高叫到：

“1177，出来！”

我监狱中的号码是 1177，我曾打趣地说以后我的汽车、摩托车、电话都要用这个 1177 以示纪念。

同监犯挖苦说：“别做梦了，你的墓碑上刻个 1177 号倒还可以。”

我一阵紧张，随后又横下心来“不能丢人现眼”。立刻从被子里站起来。衣服是早已穿好的，大家都如此。当时正值“镇反”高潮，每隔一两天总要提人出去枪毙。既然犯人都知道，也就毫不客气，特别阴森恐怖，夜里经常听见自杀未死人的嚎叫。

天刚亮，大家就作好准备，聚精会神地听着那一声的吼叫：“1436”、“781”、“1177”，叫到我了。两人打开铁门进来：

“你的行李呢？”

“没有！”

“你现在盖的呢？”

“借来的！”一人一边架着双臂：“走！”

连拖带夹押出门。我回头一笑：“再见！”要不是脚镣太重，我定会昂首阔步地去“视死如归”的。

到了岗厅旁，有十来个人，有两人已捆好。我还没有站定，就过来四个人，手拿浸过水的麻绳，往我脖子上一套，使劲往后拉，同时二人用力挤肩部，并把手拉直往后上方一举。此时我呼吸困难，两肩巨痛，其余诸人七手八脚从肩捆到手腕，然后用劲往下拉，穿过跨裆从前面到肚脐眼两分开往上吊。这样头颈、上身、手臂都不能动，全身火辣辣疼痛难忍。我生平第一次尝到五花大绑的滋味。然后两人押着，推推搡搡直到中楼。我想这该是验明正身的公堂了。大厅高高的柜台前南面坐着三个人。中间那个顺宁人，浓眉大眼，满脸横肉，是老交道了。他穿一身褪色的军服。右边一人戴着眼镜，年纪较大。左边也坐着一个穿军衣的人。堂下两边已经站着十多人了，他们已被塞上嘴，瞪大眼睛，胸腔起伏，呼吸困难。我排在第三个，到我了。顺宁人恶狠狠地问：

“号数”

答：“1177”

问“姓名”

答：“黄湛”

问“年龄”

答：“35岁”

问：“毕业于何校？”

答：“云南大学土木工程系”

问：“最后任职？”

答：“昆明市自来水厂厂长”

问：“曾判刑吗？”

答：“没有！”

顺宁人一摆手，我被拉到西边，上来两人用铁棒撬开嘴，破布往里塞，又用木棍用劲塞紧，硬将嘴闭上。两个人把着下巴用细铁丝扣住，往上拧死在头顶上。有两个人正在脚下准备敲开铁镣，我瞪大眼睛，呼吸困难。这时只看见那个年长的戴眼镜的中年人说了声：

“且慢！”拿着材料转向中间，低头和顺宁人说了些什么话，我没有听懂，顺宁人不屑一顾地大声说道：

“前后几天的事，何消认真！”

“那不好吧！”右边那人声音也比较大。左边那人也站起来拿着本本过来，指着本本说：

“都不对头，那不行吧！”

顺宁人停了片刻：“把他先押回去！”

我明白了是与本本上的不符。

于是，脚镣停敲，从头上拧下铁丝，推过岗亭去松绑。我的手臂红肿麻木。随后被连拖带拉到监号。他们开开门，就给我一脚。我跌到铺位上。大家十分惊奇：

“怎么又回来了。”

“飞机人太多，挤不出去！下次再飞吧！”

不一会又听见喊：“带177。”

这下我全明白了。177 姓潘的，是过去的同事，我们很熟。他们扶我起来到水洞门口，我想看一看潘××的最后一面。一阵清脆的金属撞击声过后，他的面孔出现在排道上，他挤挤眼睛说：“后会有期，老朋友！”

旁边两人大声喝斥：“不准讲话！”

从此他被开除“球籍”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这昙花一现的回答成了我永久的记忆。

主审官“顺宁人”是要将错就错先杀了我，那知在验明正身时，戴眼镜的“认真”了一下，才刀下留人。

直到八十年代初期我回昆后，才从幸存者和亲友口中知道，这个“顺宁人”姓张，是边纵（滇、桂、黔边区纵队某级负责人）的，在文革中被活活打死。这使我想起历史上治理中国颇有“政绩”的一代女皇武则天，她就是起用如周勃等若干酷吏，制造了多少冤狱！最后当政者觉得积怨太重，失去了使用价值，处他极刑，尸首被仇家无数人爬在地上一口一口啃，顷刻之间只剩下一堆白骨。就连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中，有一章也说到这种因果的辩证关系，不是吗？

交响乐和电话机

42年过去了，有很多事苦苦思索印象还是淡漠了，唯有这交响乐，这特殊的交响乐，仍在耳边回响……监狱中人越来越少，每天早上照例的叫号声、铁镣声……。我们犹如笼子里的鸡，随人家抓哪个杀哪个！要杀你还得叫你自愿承认去做“教材”。他们口口声声讲：

“教材还得有选择，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嘛！是光荣的。”“教材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做反面教材也是好的。”

“你看×××坦白了，以做反面教材为荣，我们让他安安静静，不找他的麻烦，比你拖着十多公斤重的脚镣，吃不好，睡不好，不知要好多少倍呢。”审讯员们不惜苦口婆心地劝导。

我们也知道熬不过，受不了而坦白的下场，就是“承认罪行”，签字画押，接着公审大会“枪毙立即执行”，阴森恐怖，心理压力极大。夜里我们常被号叫声惊醒：有声嘶力竭喊冤的；捶胸顿足痛哭的；自杀未遂的呻吟；写绝命书的；用头撞墙的……。

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持此乐观态度的也大有人在。每星期五准许家人送东西进来，大家也不客气该喝的就喝，能吃的就吃。监舍里犯人越来越少，五个排道拼成了三个、二个。“交响乐就响得越有韵味了。”

这些不坦白死硬犯或是够得上军政首脑的“准战犯”大都带着脚镣、手铐或者兼而有之。脚镣有普通 10 公斤以内的多链镣，也有“三民主义”大镣。走起路来，各种频率的金属撞击声，从排道响到厅堂，声音由远而近，由小到大，到厅堂时达到高潮。犯人们也故意按节拍迈步。于是“亲聆仓！亲聆仓！”“亲仓，亲仓，亲聆仓……”不时有人把“三民主义”大镣中间那个大环提起又砸落在地面上，“哐”“咚”很像鼓点。真够热闹的，到出了放风场，外面大了，宽阔了，声音小了，人散了，变成细碎的轻音乐，十分美妙。

如此热闹还不到一个月。早上又开始喊人点号了，原来有 200 人左右，又渐渐减少，最后只剩下五间房子有人。除去“球籍”的人，谁也不耐烦带行李，剩下的铺盖越来越多。五床做垫的，一床做盖的，好不舒服。

家里送的好吃的东西越来越少。后来我才知道，全家扫地出门，只带了随身衣服和被盖，除了全部房地产被没收外，连工商业部分也没收。没收的又不符合当时的政策，当局就变个花样胁迫老父，让他亲笔写下温泉宾馆等处的全部产业捐献给国家。老父亲由于是“辛亥革命元老”，需要装点门面，给个政协委员头衔，每月 100 多元工资。家中还有老母亲，妻子和五个孩子，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两岁。妻子向朋友处借得一架缝纫机，开个小店维持起码的生活。孩子们上菜市拣菜叶豆豉，拌在饭里充饥。

到 1952 年 3、4 月间，监所又热闹起来。新来了大批犯人。其中有留用人员，南下干部，土共干部，工商业者等等，才知道

对面在搞“三反”“五反”运动。他们是犯错误来反省的。交响乐被冲淡了，消失了。

一天传讯我，顺宁人又见面了，他气冲冲地说：

“过去的话，你还记得吧！你说没有血债，这回看你怎么推。”我没理睬。

“前年你在自来水厂，整死一个进步人士，总不假吧！”

我想起厂里48年确有一个叫张××的，是个一般职员，经常神经兮兮的，因失恋而自杀。有法医验过，他母亲也来过厂里，一切善后都很好地处理了，怎么变成我整死的呢？

我把情况重述一遍。把当时负责处理的人一一列出。他还是认定我不坦白，他示意记录员出去，一会儿拿来一部旧式手摇式电话机，问：

“这是什么？”

“电话机。”

“以前我们的人被你们整死多少，今天要你尝尝滋味。”

记录员把两根电线绑在我手上，导电的裸线塞好。

“你承认了吧！免得受苦！”

“我只能按事实说！”

长年累月的工程计算，练就了我一丝不苟的思维方式，我仍然一字一句的说：“经法院法医鉴定，他是自杀。我亲拟给予厚葬，抚恤其老母。”

“顺宁人”大怒，摇起电话机来，我被电流击倒在地，趁势双手交叉，虽不太难受却放声大叫。

“麻死人啦！麻死人啦！”

“我坦白，我坦白。”

“说！你怎么毒死的！”

“没有毒死，他是自杀的，吊死的。”

他又大摇电话机，我就地打滚大喊大叫。

电话机一摇发出的电，电压高到 200~1000 伏，而电流却很小，只有 0.01~0.001 安左右，两手绑上电线，我滚在地下，两手交叉，电流走最短的路线，由这手传到那手，我并不感到太难过。我大喊大叫只是做戏。他是不懂电的。残酷总是和愚昧相伴随。

这样持续了五、六分钟之后，走进一个人来说：“大喊大叫的，监舍都听见了，影响不好，先叫他回去吧！问题已经决定了。”

我装作站不起来，记录员和典狱长还用手扶我，我扶着墙跌跌撞撞地回去，同牢犯人都很关心，我只说了三个字“电话机”。大家默然。

看来这个主审官“顺宁人”是想要从我身上再捞到点什么“钢鞭材料。”

死神手下留情

“三民主义”大镣拖了双足 532 天时，狱官忽然在放风场上召开大会，一百多人打盘脚坐在地上。监狱长宣布“现在开宣判大会”。另一个人上台，他讲话极其简单：

“今天对你们宣判，你们要好好听着：一、判死缓的有××等人，二、无期徒刑的×××等人，三、十五年有期徒刑的有黄湛……等人”，直到最少为五年的。我也不知犯了什么罪，内容更不清楚，更没有判决书之类的东西。下午就被取去脚镣，他们宣布我为大组长，领着三个小组约 30 人在监内劳动，任务是检漏，清扫顶棚，疏通大沟。其中有三个被指定为“办公室清洁人员”，到二门外办公室打扫卫生，其中一青年姓刘，江苏人，南京金陵中学学生，跟着解放军南下，犯了小贪污案关了进来，曾是我们牢舍的小组长。有一天他对我说：

“你的狗命大，不然早就完了。”

“你怎么知道？”

“昨天我在门外窗旁扫地，听见办公室两、三个人在谈你的事，有一个口音很怪的人说‘黄湛这小子太便宜他了，照他这种十个也完蛋了，我真不服气！’另一个说‘你莫不服气，人家有大靠山，连周保中盖章都不顶用！’”

这事一直到后来，我患腹膜炎保外就医时，父亲来看我，才给我讲明：“你不会死的，要死早死了。”真相是这样：我于 51 年 3 月被捕后，父亲于 5 月间写信给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字玉阶。朱玉阶在云南讲武堂丙班就学时，父亲是讲武堂骑兵教官；辛亥革命后父亲任梯团长，重庆镇守使；护国战争时父亲任挺进军、第四军总司令等职时，与朱大叔有多次共同革命的上、下级关系。后来在镇压反革命高潮中又写过一封信，大意是“嫡长子黄湛由于历史原因曾任过伪三青团分团长及国大代表等职务，但他是爱国的，对蒋不满的，解放前夕参加了‘民联’，做过有益于人民和家乡的事，等等。秘书转给朱总亲阅，朱总在信头上写了个“阅”字，交秘书，用朱总的私人信封，内部军邮给云南最高当政者陈庚将军，信到了陈的秘书手中。朱老总关照说见有我这一案就送过来。陈是军管会主任，周保中是副主任。陈当时到广西去了，故周保中处签章就执行枪决。我的上报死刑立即执行的文件到周处，图章都盖了，正要发下。幸亏陈的秘书关照过：“有黄湛这人的送过来，等陈主任回来处理。”

后来陈回来看过后亲笔批了“给予长期管训的刑期”。那时有期徒刑最长的是十五年，就这样判了。

父亲说：“好险啊！朱的批信才转回来，头一天陈的秘书对周的秘书说了这事，第二天你的案就报上来了，已经盖章下发时才被秘书发现，不论在哪个环节上耽误了一点，你就完了。”

我是这样免去了脑袋如割韭菜般被割去的下场，可是有多少人却在狂妄的报复情绪下，还有泄私愤，甚至图财物的情况下人头落地，而且，杀人者统统打着“革命”的旗号。乡农会可以批准杀人，假土共可以杀真的进步人士……。例子举不胜举。每一个有姓有名的人都可以写一本书。这本书可以写到本世纪八十年代初。这种毫无理性的报复、怀疑、残杀，侵入到“人民共和国”的肌体深处，终于又从共产党内的最高层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的疯狂”根子早就埋下了。

我多灾多难的祖国啊！在数千年历史的重负下，在改朝换代的废墟中，你的步履是如此艰难……。这更加激励我写出来，把极权专制的残酷如实地揭露于人间。让儿孙们，不！儿辈已经在这个制度下耗尽了年华，只能让孙辈们更快地奔向科学、智慧。让执政者能真正在人民的监督下，逐步减少黑暗吧！

1953 年，我已被判为 15 年有期徒刑，投入劳改。昆明市内的蒲草田监狱正建些平房，由我负责技术。一天正在上屋架，大家又饿又累，但中午一定要完成。

12 点多钟我吃完饭去看他们操作。我刚上到房架跟前，我旁边一个用力一踩，脚打滑跌了下去。我看到房架已经歪过来，就奋不顾身用尽全力往上一顶，屋架给顶住了，没有倒下来。我只觉得什么东西在小腹部抽动了一下，也没有在意，跌下去的人也没有大伤。总算圆满解决了。到晚上我感到腹痛，越来越厉害，吃点止痛药仍然抵挡不住。到医务所去看，医生说我是“肠结”。草草打发回来。

路上曾昏倒两次。回来后卫生员（犯人）告诉我说：“你是

阑尾炎，要用盘尼西林，管监狱的不开口，是拿不到的，你能否设法弄来。”

正好前天我因公出去，有人托我买的一瓶油质盘尼西林（青霉素），我还没有给他。卫生员就给我加倍剂量注射进去。以后几天发高烧，昏沉沉人事不知。……一天刚睁眼，模糊地瞧见妻子。两年多了，恍如隔世。她叫了人力车把我送进昆华医院。看到她焦急的眼神，消瘦的面庞，我想问问：“这几年你们是怎样熬过来的……。”可我声音微弱得简直听不清。

到医院，妻子找到苏树言院长，他边检查边说：“怎么弄成这种样子才来？”他对我的病诊断为：“阑尾穿孔，弥漫性腹膜炎，病情十分严重，需要立即手术。”我半身麻醉后，头脑反而清醒了。打开腹腔后，脓血喷得主刀的苏院长一头一脸。手术完后，他说肠子腐烂得不能动，只有插上三根橡皮管，反扑在特制的床上，下面接个盆子排脓血，一方面大量注射青霉素、生理盐水和葡萄糖。我妻子静娴一直守护在旁。我昏睡了三天，第四天流出来的是黄水了。橡皮管抽去两根，人也可以仰卧了。苏院长笑着说：“你总算闯过来了，这种病死亡率超过 96%，我们认为你阑尾穿孔的第三天就该死了。”这是那几针油质青霉素救了我的性命。

我为了抢救人命和国家财产而挣伤得了阑尾炎。而由卫生员摇身一变为大夫的“医生”连普通阑尾炎也诊断不出来，硬说是“肠结”，而由医生打为“犯人”的卫生员，说了几遍是阑尾炎，反遭训斥，以致延误，发展为弥漫性腹膜炎。眼看要死了，才通知家属给予“保外就医”。在医院住了 20 来天，伤口未封，流脓不止，又被数次催回监狱。后来，在狱中和劳改队所见的病和死，我才知道了这也是一种杀人的手段。只有眼看不行的病人才“保外就医”，又推脱了责任，又变相地杀了人。

充军万里

我为什么会去东北劳改呢？“想来是战犯吧！”我的小儿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因为“其父在东北劳改，想来是战犯”而被以莫须有的人命案抓进监狱，此是后话。

人生就是扣在一连串的机缘之上。1953年云南还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而东北所谓解放早起步早，已开始建设。黑龙江省公安系统拿着公安部的介绍信到西南来找刑期长而又有技术的犯人，带到东北去使用。云南省公安厅要他们与劳改局洽商。当时我恰恰在“保外就医”，勒令回监后，伤口未愈合不能劳动，间住在医务所。当时市劳改队并入省劳改队。“三、五反”运动又有一批犯人技术人员，因而技术人员不缺，而我的情况又符合黑龙江省来人的要求，几种条件不谋而合，促成我从此离家万里，在茫茫雪原上挣扎。

在昏沉沉只有一丝气息的几天中，恍惚觉得只有一个念头，“不能死”，疲累得瘫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比“三民主义”大十倍的千斤铁链拖得跌入黑不可及的深渊，仿佛听见一个声音。

“深，”我的号叫子深，只有妻子这样叫我。

“深，你别走，你不能丢下我去啊！”

我又奋力地往上爬，爬呀爬……。

当我重如千斤的眼皮微微张开时，正是娴的面庞由模糊而清晰的呈现出来。那种欣慰，由那双又大又黑的眸子深处透出来的欣慰，使我忘掉了一切一切的不幸。不再是一只任人宰割的鸡，不再是死神魔爪下垂危的羔羊。我仍然是我！

逃过了死别的关，现在却要生离了。

离，是那么远，万里之外冰封雪飘的大地。

离，是那么惨，一个被判重刑的囚徒，肚子上未封口的洞里

还渗着脓水。

离，是那么无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答的揪心。揪心的是年迈的双亲，没有一个儿子能孝养，五兄弟差不多都先后被囚入牢笼；揪心的是我三十多岁的妻子，带着十三、四岁到三、四岁的五个子女，而且家无分文，全靠妻子的一双手，漫长的日月怎么熬啊！！

1953年1月23日，分别的这天终于来到了。出了钱局街监狱，押解的干部事先做了工作，只要我立功赎罪，好好工作，可以让我最后见家人一次。我被铐上单铐坐在人力车上，到火车站上小火车到沾益再坐汽车上路。在南站前，我远远地看见妻子静娴牵着十岁儿子小果，站在那里翘首以待。他们看见我就奔过来，跟着人力车小跑着。静娴手中提着廿个鸡蛋，儿子瘦了也长高了。离开车还有十多分钟，报告了领导，准许我们去吃点东西……看着这廿个鸡蛋，我一阵阵心酸，不知是妻子多少个不眠之夜的辛苦才挣来的……

妻子于我是功勋卓著的。她是云南辛亥革命元老，护国第一军参谋长罗佩金将军的小女儿。童年父母双亡，虽然经济宽裕，但常受异母长兄欺凌。我们1937年结的婚，当时她是昆明女中校花。我大学毕业后一起到南京欲再深造，其后抗战爆发，逃回故乡，她一直是我的贤内助。现正值三十五岁的盛年，要拉扯大五个幼小的子女，生活该多艰难……。她一面流泪一面劝慰我：

“爹爹请人推算八字，推了你一生的凶吉，会逢凶化吉的，你要好好保重，常常写信回来……。”

我心想只要活着总有见面之日。但是监狱、劳改队、长刑期的政治犯，稍有闪失，秘密枪杀的事还少吗？一咬牙我终于诚恳的提出：

“此去万里，我身体极差，有合适的人你就改嫁吧！孩子能

送人的送人，大点的请湘弟（堂弟）、清弟（当时还未被抓的亲弟弟）帮帮忙。总比守着我这个前途渺茫的囚徒要好些，只要你过得幸福，我会很高兴的。”她一声不响，只是呆呆地看着我，泪如泉涌。果儿靠在她身边也呜呜哭开了。

催命的汽笛声响了，她拉着我的手说：“要保重啊！我等你，小果快说，爸爸你一定要回来……。”

干部来了，我忍痛告别，连头都不敢回。上车了！他们母子也跟进站台，车动了。静娴泪流满面，牵着果儿跟着车跑呀跑……。从不掉泪的我也控制不住泣不成声。我不由得打开车门探出身去，想多看一眼。教导员一把把我抱住。我才明白过来，他们以为我要跳车呢！他们的内心也许闪过一丝同情的念头，也有人性不灭的人啊！

送别最是催心肝，
汽笛长鸣似绞肠，
神魂颠倒无方寸，
藕断丝连万里长。

火车到沾益（当时云南只有米轨铁路）开始坐汽车，白天我和一姓李的（被判刑十年学机械师专毕业）单铐，铐手连在一起。晚上凡有县城的地方，就把我们寄押在看守所，一路上住过许多看守所。最奇特的是在贵州。第四天到了关岭县。黄昏时分教导员把我们送进县看守所。大院靠着山边，没有高墙碉堡，四周的围墙也不高。当中有三间房子，没有墙，四周是一根根圆木栏杆。“这里晚上还不得冻死？”心中正在嘀咕。过半小时狱卒紧催，“赶快大小便……。”不一会收风了，犯人们都鱼贯而入。里面很奇怪，地上中间有一床大草垫，靠头的一边是一根大园木，挖成

七个半圆形凹槽，靠脚的一端一根大园木有 14 个半圆形的小凹槽。狱卒喊声“睡下”。大家就躺下，不脱衣服，又喊声：“头脚摆好！”大家把头和脚分别摆进大小凹槽。我们俩不知所措的站着。

“你们是新来的？”

“是”

“判了几年？”

“十五年”

“到里面那间去！”他用手一指。

进去一看也和外间一样，只是木头更粗些。命我们把头脚都分别摆进去。他们又把竖立着的带同样凹槽的两根大木头，分别卡在头部和脚部，一头套在铁环里，一头用大铁链锁住。我们就是这样平躺在草垫上，脖子卡在一个大圆洞里，脚脖子卡在两个小圆洞里。只能稍稍旋转，左右木头卡住腮帮，特别难过。过一会拿来一床又臭又重的棉被盖上。这真无法入睡，三、四个小时过去了。从木栏栅缝隙中看到北斗星座斗柄上转，仍然睡不着。此时那些有经验的“臭虫”活动大大加强，专咬膝盖以下手够不到的地方。只得听凭它们为所欲为，喝血喝个痛快。天快亮了，我小便太急，未封的伤口又在刺痛。我大叫要解手，又无人答理，无可奈何，歪着身子就尿。天亮了狱卒来取掉头、脚部位的大木头。我正在活动活动颈和腿，狱卒发现我撒的尿，大发雷霆，硬要我舔干净。正在为难之际，教导员来了，把我们带走了事。

1953 年了，中世纪的黑暗依然在中国的土地上肆虐。

旧历卅晚上到了重庆。山城，久违了。1944 年我在省公路局任桥涵股股长时，云南地方政府已服从“中央调遣”一致抗日。蒋为了抓住人心，训练骨干，曾要龙云把云南省各级政府中的青年干员科股以上，分期调重庆中央训练团轮训，轮训的时间不到两个月，讲的是：“三民主义”“礼义廉耻”“忠于领袖”“为

党国效力”等等。去时是坐汽车从宣威、赤水河、泸州走，在宣威过去的黑松林被强盗抢光了盘缠……。回来坐军用飞机，几乎遭遇日本飞机轰击……。事隔九年又到了重庆，山城依旧，也许更旧了吧！而人却面目全非。时光匆匆，我已是三十七岁的人了。

到重庆监狱后立即交劳改队管制起来，大队长王某，还算客气，叫人把我们带到伙房吃饭，大师傅听说我们是远道而来，每人给了一碗红烧肉。然后每人发一个小橛子命令去看戏（川戏）在大操场上有千多人。四方八面的墙上都架着机枪，大军手扶枪柄，子弹上膛对准人群。不看不行，听又听不清，好容易熬到11点半才解散。第二天吃过早饭又命令看戏，连着面对戏台三天。

第四天出工，我被分配磨水磨石地面，没有磨石机，蹲在地上用手磨。我弯腰困难，就变个花样站着用脚磨，很快就有人打了小报告。下午管教干部来了，大家都说我搞破坏，我说“不会的，不信检查。”用水冲净一看没有两样。当时七嘴八舌还是要开我的斗争会。我不得已讲出在昆明才动了手术，扒开裤子，肚子上的伤口还在流脓，才算饶了我。次日换个工作，帮人家放线测量，这是我的老本行，其中有条线不对，组长很着急：“明天就要开工，延误了承担不起，赶快吃饭，下午来重整。”

他叫我看着仪器，不准任何人来动。我详细看了图纸，找到毛病，擅自动了测量仪改正过来。他们来了后非常生气，立时就把我扭起来。

“你居然敢搞破坏……。”

“我跑不了，你校对后再说。”五分钟后他大喜过望，命把我松开。队长也来问长问短。

“你到我们设计室工作吧！”

“我也想离家近点，可是不行啊！人等齐后就要往东北去的。”

三天后，去成都和贵阳要人的干部回来了。又从当地监狱提

出三人。两个判死缓的，一个判无期的。汽车停在大门外叫他们出来。他们一出门就爬在地上磕头不止，一个要求见老娘一面，一个要求见见妻子……。后来才知道重庆也和昆明一样，说去“劳改”都是枪毙的别名，死前的一点要求才敢冒昧提出……。

铐上手铐又开始茫茫的长途跋涉。

第 二 篇

雪原囚徒

狼与暴风雪

我们一行到哈尔滨劳改局报到后，关入中心监狱。监狱发一身大红色的棉袄裤。我们汇同当地的技术犯人，晚上被关进监狱，白天带出来办公室。立即投入设计省公安厅大楼的紧张工作。

设计室除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工程师后就数到我，又干上了房屋建筑的本行，且规模比我过去设计过的大得多。除了睡觉吃饭，就是查阅资料，计算，绘图，心情比过去舒畅得多。只是工作太繁重，身体仍很消瘦。半年多后，设计任务书通过，投入施工。劳改局配合农垦局——开垦北大荒。

哈尔滨往北 102 公里到绥化，再往西北，到北安、齐齐哈尔，铁路伸延在茫茫的北大荒中。西北面是小兴安岭。越往西北，林越密，山越大，就进入大兴安岭原始林区。往东离铁路越远就越进入荒原腹地。夏天是一人多高的茅草、荆棘，还有河流、沼泽地、万古淤泥。冬季长达八、九个月，都是风暴冰雪统治的世界。我们带着帐篷，长年在野外工作。点的是煤油灯，吃的是苞米碴子加馒头。我们在这广袤的荒原上，作着大地地形地貌测量，冬天冒着零下 30-40℃ 的严寒仍坚持野外工作。夏天暴雨冰雹、沼泽泥泞，稍不注意陷下去就是灭顶之灾。更有无数的小咬大咬（毒蚊子）来光顾。困难是没法形容的……。

我是测量队的技术负责，身份是犯人。任何失误将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因此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在油灯下绘制出万分之一的地形图数百张，其中 381 张后经国家测绘局抽查，精度极高，并入国家图册中。为此后这二个地区的海伦、红光、星火、绥东……十几个大型国营或劳改农场的开发打下基础。

1955年七、八月间，正是北大荒的夏天。庄稼和荒草都在这两、三个月里拼命拔高，生长，成熟。各分场都在抓时间盖房子，挖水渠。八井子分场在河上修了一座大桥。我晚上审核、设计在摇曳的油灯下，一点点精确计算到深夜。我清楚地知道，只要有一点失误，技术人员不过是挨批评写检查，严重者撤职。而我是犯人，等着的是关小号（活棺材）加刑，甚至就地正法。

那天一早通知我到八井子分场工地去平桩头（核查桩头的水平）放线。测量队的人都出去了。我只有扛上测量仪，喝了苞米碴子（一种包谷碎粒煮的稀饭），揣上两个馒头，搭车赶去了。直忙到午后两点多钟，才测完校平。刚在工棚里坐下，想休息片刻，分场李场长进来：

“总场基建科来电话，有事要你立即赶回去！”

“赶快吃饭，走吧！”煮饭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一边升火烧水，一边抽着他长长的旱烟管：

“我这就给你下面条，虽说廿多里地，可这一路没人烟，狼可是厉害哪！”

施工的犯人大组长从外面就嚷着进来。

“黄师傅，你再来看一下，有两根桩按你说的校正了，不合格。”

老头说：“快去，快回。你还要赶路啊！”

“你一个人要赶回去，少说也得两个多小时，别走了，就是大白天狼吃人的也不少啊！我听老乡说，八、九年前有一个解放军连长和警卫员，在三井子总场部那边的村庄附近被狼吃了呢。”

我不由得一呆，已经很黑了，确实不想走，但不走不行。大组长越说越起劲：

“傍晚他们四个执行任务回来，碰上狼群，黑压压几百只，一层层围过来，连长扫了一梭子弹，打开一面缺口，叫两个兵快

去拾机枪。他和警卫员背靠背，警卫员用冲锋枪打点发，连长用盒子砲打……。等到一班战士抬着机枪赶来时，只见死狼遍地，还有撕烂的衣服、枪和一滩血，顺着血迹追下去，只找到了两颗血肉模糊的人头……。你还是别走了吧！”

设身处地一想，不觉毛骨悚然。但分场长的命令是不能不执行的。我跑了现场又吃完饭已是四点多钟。沿这条旧公路到总场只有12公里，两面都是漫草荒烟，没有树，没有人家。我一路疾走，一路四方打量，顺公路有我们新近设计架好的电话线。6米的电杆，埋入土1.3米左右，上面还有4.6米高，电杆上有横档，距地面有3.8~4米。走到八里湾时太阳快落山了。阴森森的冷湿气直透衣裳。这里夏天中午可穿衬衣，早晚需裹棉袄。

怕狼，就偏遇着狼。这时，由右边的草丛里大摇大摆的走来了一条大狼，黑黄的皮毛，就跟在我后面十多步。我走快它走快，我走慢它走慢，我站住它也站住。我掉回头抄起测量仪的脚架朝它冲过去，它回头就跑，我赶快朝前走，它又跟来，我干脆加快脚步。此时我耳朵里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又要听着后面狼的脚步声。记得小时候听父亲讲过，碰着狼千万不能跑，要装得比它更胆大。我突然发现左边路旁草丛中有一只狼跟着走。再看右边，“坏了！还不止一只呢！”怎么办呢？四周一公里的视野内连一颗大一点的树也没有。而太阳却走得更快，已经完全落下了山坡，只听得由远而近的狼嚎声，一声比一声凄厉。我情急生智“只有上电杆”。走到前面转弯处，一电杆三面被密密的灌木丛包围，那边草里的狼钻不过来，我把仪器箱放在地上，拿出一把螺丝刀当武器，又把三角架腿卸下一支，此时狼已渐渐逼近，我拿起脚架把尖角对着它猛冲过去，它们被这种从未见过的东西吓着了，回头便跑，我乘此机会赶紧踩着靠在电杆上的三角架往上爬，也不知哪来那么大劲，一爬一纵就抓住了横梁。这时狼已回

来，跳起来咬我的脚，我双手吊住横梁，一缩脚，狼已咬住了鞋子，把胶鞋撕破了。我突然大声咆哮嘶叫，它们回头跑了几步又站住了。乘此机会我用脚把三角架勾上来，用手拿着，坐在横档上，抱着上面的杆子，心里稍安。此时我的脚距地面至少有三米多，狼站直了是跳不高的。

四周黑漆漆的，风也很小。电杆下却聚集着越来越多的狼。只见一双双渗着绿光的眼睛，“呜呜……噢噢……”一声声凄厉的狼嚎撕破夜的寂静。我被一大群蚊子包围，往手上，脸上拼命叮咬，我脱下帽子搗打，轰不走，反而越来越密。据说从前日本人抓住抗日战士，夏天剥光衣服，绑在树上，一夜之后只剩下一架白骨和一滩吃剩的肚杂，血肉都被各种“小咬”“大咬”吃完了。我正上轰蚊，下防狼，一阵全身苏麻，差一点失手栽下去，才发现屁股旁的电话线是裸线，总场和分场正在通电话，我全身震颤着，只有死命抱着电杆……。电话终于打完了，但刺骨的寒冷使我上下牙不住的打着颤。我穿着从家乡带来的妻子织的毛衣，农场发的棉背心，黑色厚布劳改服，还抵不住这种夏天夜里的奇寒。稍一定神，我才发现狼在拖仪器箱，又在“轧轧……”地咬电线杆。“唉！这下完了，用不着两个小时，30公分直径的木电杆便会被咬断。

“天啊！想我从未做过害人之事，而就在今晚却要葬身恶狼之腹。”在这远离亲人的万里之外，揪心的悲苦，使我束手无策。一个个死里逃生的镜头从脑海中闪过……。九年前我在金沙江边修公路，汹涌咆哮的金沙江急流把正在江里游泳的我卷入急流，擅长游泳的我怎么挣扎也出不来，漩涡卷着我向对岸峥嵘的岩壁砸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想起父亲讲过，他年青时代在日本留学，士官学校的游泳课要求学员在激荡的海浪中游向一公里外的小岛。先到的两个同学被巨浪卷起砸向岩石，他停住冷静看好

岩面高度和浪头，向侧边数米处乘着又一个巨浪顺浪尖一涌跳上了岩石。临危不惊。我当时就挣进涌向岩壁又回流的急流中，看好方向用高速的自由式拼命游，才摔脱死亡，在下游一公里多处获救……。

现在不能束手待毙。我解下裤带把三角架绑在脚上，伸下脚打它们。起初它们退缩了一下，继而一只狼一跃上前咬住三角架铁尖狠命往下拖。我死命抱住电线杆，它用力太猛，狼牙滑脱了，我才赶快把三角架提起来。“不敢冒失了！”我再仔细看看摸摸我坐着的这一电杆，正值转弯处，两边有电话线栓住，前后有 5 根 8 号铅丝拧成的铁索栓住，用铁爪钉在地上拉住。即使被狼咬断了，一时也倒不下来。它们啃电杆我就不管，谁跳起来我就用三角架打。

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狼群轮换着啃咬木电杆，一双双绿眼睛射出凶光。有的蹲坐着仰首长嚎，有的来回走动着，不时总有一只只跳起来。据说狼群中有一种前脚短后脚长的叫“狈”，它是狼群之首。奔跑时伏在狼王的背上，它会想出各种诡计，指挥狼群，千方百计把美食弄到口。夜半时分，只听远处的山沟里有狼嚎叫，不一会许多双绿眼睛不见了。只有三只不走，还在想方设法把我弄下来。又过了大约半小时，我快冻僵了。忽听有马蹄声由总场方向传过来。我欣喜若狂地想决不能丢失这机会。我拼命呼叫：“狼吃人了！救命啊！”一声枪响，一只狼倒下了，另外两只赶快逃走。刺眼的手电光照在脸上：

“什么人！”

“总场基建科搞测量的犯人黄湛，由八井子回场，路上遇着狼，只好爬在电杆上。”

两个骑马的武装警卫，看见测量仪器相信了我的话：“快下来吧！”

我手脚冻木了，他们把我接下来。

“看见有人过没有？”

“没有！半小时前南面沟里有狼嚎叫，大部份狼都赶走了。”

“朝这个方向走吧！”他们牵着马，我们顺南边小路摸到沟边，发现草倒了一片，在扑鼻的血腥味中手电的白光扫过，看见撕烂的衣服、鞋子，一只吃剩的脚，还有没来得及啃的头，眼睛恐怖地大睁着，牙关紧咬，嘴裂开。这就是他们要追的逃犯。

在北大荒的劳改农场中，只要晚上由看守兵把犯人的袄袂抱走，即使在夏天也没有一个人能徒步逃离的。我用烂衣服包好了头和脚，背上仪器，用打狼的三角架，挑着狼的剩食，跟在马后走了回去。到总场我们几个技术犯人的宿舍，已是夜半三点多钟。我冻坏了。由于在惨死的恐惧中挣扎过久，连着发了几天烧。总恍恍惚惚看见那一双双射出凶光的绿眼睛。

北大荒的冬天，阳历 9 月间就开始了。夏天开冻一公尺左右的土越来越硬，接着地面结冰。几次寒流过去，大雪纷纷，气温降到摄氏零下 20-30 度。周围全是白茫茫的一片冰雪世界。到了 12 月冬至前后，晴天太阳从东南角升起，十点多钟才露脸，画一个小小的弧形，两、三点钟就在西南边沉下来了。

1956 年 12 月间，我们测量队冒着严寒，测量一座水库的一条引水大干渠。廿多人的测量队，除了队长、技术员（海伦县中的高中毕业生，我的徒弟）事务员以外，全部都是犯人。实际负责技术工作的我，每天晚上都在昏暗的油灯下，核实、汇总白天测量出的各种数据，并绘制在地形图上。白天又得解决实测中的各种问题。队长知道自己是门外汉，也清楚开春以后，成千上万

人将要按图施工。这一引水渠将解决数万公顷机耕地的灌溉，因此对我们还比较客气。我把人员按素质和能力分为经纬组、水准组、基标组。训练每个人的工作能力。经纬组长白文高，28岁，原是哈尔滨铁路局客运段的会计师。他自己也不知道犯了什么罪，51年被判刑5年投入劳改。他父亲是绥化的大地主，48年被镇压。他当时在哈尔滨读大学。后来把老母接到哈尔滨。妻子是他大学的同学。他被捕时，他们的儿子还没出生。他人很聪明，我才教他一个来月的测量，他就能独立操作，其精确程度，犹如他的财务数字，分毫不差，我完全能放心。夜晚他常伴我到深夜，不是帮我计算，就是帮我绘图。在油灯下，他常常从贴身的荷包里掏出两年前妻子寄来的照片：一个美丽的少妇抱着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他总是满怀深情的看了又看。我也从贴身的皮夹里取出珍藏多年的十五年前的旧照片：一对年青的夫妇抱着个像洋娃娃一样的两岁的女儿。我们对着两张孩子的笑靥，久久地沉浸在幸福的回忆里。

12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准备搬到下一个居住点，两地相距约10公里，其间已测了4公里，再测两公里多，收工就顺路向新住宿地迁移。像往常一样，太阳未出前就吃好了饭，穿上薄棉袄裤，再套上厚棉袄裤，穿上粗布面的羊皮大衣，大皮帽，填好毡靴里的乌拉草，带上馒头出发了。共有水准组4人，经纬组8人，基标组2人。我整理资料，队长和余下的人准备搬家。太阳出了我们才动身，下午1时左右到达新住地。此时天气突变，黑云压顶，呜呜作响的风暴越吹越猛，我们住的四合院老房东说：“看样子这场暴风雪不小啊！”

我当即报告队长派人赶快去找他们收工回来。两人出去不到1小时，风暴寒潮已经来临，温度骤降了10度左右。天昏地暗，风暴夹着大雪冰碴，铺天盖地的压下来，又呼啸着卷起地上能卷

的一切，旋转着、狂舞着横扫而去，3点多钟天已黑定。我着急得很，推门出去，脚下是齐膝深的雪，脸如万把尖刀锥刺着，睁不开眼。我建议队长把剩下的九个人分成两组，能穿的衣服全穿上，戴上护耳皮帽，无指手套……。各组带指北针、手电、馒头。三个干部烧暖屋子，做好饭等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抢救生命，我大声强调：“人员不准分散，听组长命令，午夜一点，不论找到与否必须返回。”

我们组朝线以北，另一组朝线以南，蹒跚着出村后就消失在暴风雪中。我只觉得其冷难当，好像全身没穿一件衣服，头脑转动也不灵了，每走数十步就弯下腰解开皮大衣，用电光照着罗盘定向。从走过的脚步计算已经离村四公里多了，还不见人影。风暴吼叫着，背风处的积雪已高达数米。两人对面说话都要拼命喊叫，到10点多钟，我们四个人已精疲力尽，只好挣扎着回来，到家已经快1点啦！另一组也回来了，同样没有一点踪影。队长下令赶快休息，明早天亮前再请当地民兵汇同分段分区寻找。

出工的14人呢？太阳出前就来到了工地。头天的标旗被风吹倒，积雪又厚，找顶角桩耽误了一小时。他们边测边往新的方向走，到下午1点多钟，看到黑压压的云层笼罩过来，组长白文高叫大家：“天要变，快收工回去吧！”埋基标的两个壮伙子，只穿紧身棉袄袂，正挖得起劲。大伙也说：“我们今天多干点，等于慢慢往新住地走，明天就可以多休息一会。”又抓紧时间干到两点左右。此时距新住地不过三、四公里，没想到风暴来得这么快。白文高把经纬仪的望远镜拆下，留下罗盘部份，用指北针定向，他拼命对着同伴的耳朵大叫：“一个个传下去，大家紧跟我，不许掉队。”前进了七八百米方向是正确的。这时风暴更猛烈，每迈一步都十分艰难，跟在组长后面的记录员摔倒了，来拉的人也摔倒了。此时正走在一块冰面上，风暴把积雪刮光，其滑无比。一

个个蠕动的雪球般的人挣扎着前进时，组长却消失了。“白文高！”“小白！”……。在怒吼的狂风中，叫喊等于零。

白文高顶着风，抱着罗盘，口中呼出的气已在睫毛、眉毛上结成冰，睁眼十分困难。他不知道同伴已摔倒，仍继续前行。就在此时，他一头栽进早几天挖的 13 号试坑内，他仍紧抱着罗盘，头砸在坚硬的冰地上，昏了过去。暴风雪无情地覆盖了他，瞬时填满了坑，没有一点踪影。

在冰面上摔倒的人，好不容易爬起来，又朝着原来的方向前进，行走十多步后什么方向也搞不清了。有的说“要继续顶风前进。”有的认为应往树林里去避风……。

意见不统一，没办法，在这生死关头，只有自己选择。水准组的 4 人由小组长带领，朝左边的树林里摸去。“林中风雪总会小点吧！”半夜过后，他们摸进看林人的小屋。老头要他们在约零下 10 度左右的外屋，先搓脸、鼻子、耳朵，搓手搓脚，直到青黑的颜色消失，才准进到里屋，大约零上 15-20℃。要不然暖得过急，鼻子、耳朵、手指、脚指都会冻掉的。他们在地板上睡了一夜，次日早上风暴过去平安回来。

有五个人认为他们顶着狂风方向继续走是正确的，其实有山，风是时常转向的。他们实际上是在一个范围内转圈子，衣服穿得少的两个埋标工，落后失踪了。其他三人发现一个烧炭的破窑洞，躲到洞内，活了下来。有二人认定自己的方向正确，他们终于在走过头二公里外找到了人家。还有三个人认为水准组钻树林的方法对，也往林中摸去，风暴虽小点，但严寒却把他们冻僵了。

第二天上午，风暴息了，我们这一组由当地老百姓带领向森林一边呼叫着，一边搜索前行。在距林边不远处，看见经纬组的老李，坐在一段砍倒的大木头上，前面堆着一堆枯枝，根本没有点燃，却有模有样的在烤火。大家高兴极了，一面喊着，一面

不顾齐膝深的雪要奔上去抬他。

“不行！”一个当地大汉把猎枪取下交给身边的人。

“他已经失去知觉，离冻死不远了，要让他体内发点热才有救。”他走过去突然把那堆干枝抱起就跑，到离开七、八十米处放下作烤火状。坐在树杆上的老李大怒，一拐一拐地追过去，快追到了，他又把柴抱起跑，到另一处，有滋有味地“烤火”。老李又追过去，他又抱着柴跑，这样跑了七、八次。老李跑路也接近正常了，喊出了声音：“别开玩笑，给我烤烤吧！”

大家赶快拥上去，把老李用皮大衣裹起，放在挡架上，这时他才认出了我们，涕泪涟涟。我们问：“还有其他人呢？”他指指林中：“他们在那边不远处已经昏倒了。”我们按他指的方向找到了其余二人，已冻昏，脸是青黑色的，一副狞笑状，心口尚有一丝温，赶快裹好抬回去，这三人救活了。下午又找到两个衣服单薄的，已经冻死，只差小白一人。我心里一阵阵发颤“会有什么情况呢？”他们回忆起摔倒的地方，缩小范围一点点刨。第三天挖出来了，白文高已经死了，双手还紧紧抱着经纬仪，如果一摔交，他丢掉仪器，用双手支撑还不致于丧命。

一星期后他的母亲、妻子来领尸，老人扑在儿子身上哭昏过去，五岁的孩子抱着妈妈的脚哭喊着要回家。年轻的妻子泣不成声。白文高判刑五年，距刑满只差三个半月……。谁没有老母、妻儿，“老天啊！你为什么睁眼看看这人间悲剧。”

黑龙江省气象台早在暴风雪来临前两天就预报了这次灾害的风速、温度。可是在这荒原上，村屯里没有电，更无处听广播。配给我们测量队的一台装电池的直流收音机，又被基建队大队长，原海伦监狱的看守长张史奋拿到自己家里“玩新鲜”。暴风雪夜他正躺在热炕头上，听得正舒服呢！在他们看来，死几个犯人算什么！不过是一个反革命两个坏分子，上报除名完事。

这次冻伤的六个犯人，一个最后锯掉了一条脚，一个没有了六个手指。

“劳改”工程师的艰难

希特勒曾经认定日耳曼民族为最优秀的种族。相形而较，犹太人却是最劣等的种族，必须消灭。二战时期数百万人的集体屠杀，使世人永志难忘。而共产党对所谓“阶级异己者”的镇压，是随着政策的越来越左，其酷烈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直到毛老人家寿终正寝，才略有扭转，但仍离不开中共的“功利”二字。八九年的“六四”事件说明什么？此是后话。温故而知新，“故”是必须温的……

在1955、56年以前，为了调动积极性，在劳改队着实也采取过一些宽大措施。54年我在黑龙江省劳改局勘测队，曾参加过两次欢送大会。犯人刑满的头一天晚上。大家吃得较好，白面馒头还有肉菜。饭后开大会，队长主持，被释放人谈自己改造的收获、感想以及出去后的打算，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指导员用托盘送来一套黑棉衣，一个释放证，一封介绍信和回家的路费。

“从今天起你就是一个新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並要他立即脱下劳改犯穿的大红袄裤，换上黑色的袄裤，将钱和释放证一一点交，大家从心里羡慕，又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散会后他向我们告别，去和干部们住一起。第二天早饭后大家又到队欢送，挥手惜别，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总觉得有奔头，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

确实是无家可归，无业可就的，还要在刑满前两周提出申请。我也曾代人写过申请，由队长转上级调查属实批准留队，干力所能及的工作，也有相应的工资。出去的人有时也写信回来，指导

员都要当众宣读一通，说他在社会上並未受到歧视，加强思想改造，加倍努力工作，前途是光明的……等等。虽然有卖狗皮膏药之嫌，但想到是开发北大荒，为国家建大型国营农场群的迫切需要，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改造者和被改造者好像近了许多。那时我们测绘的图纸精度很高，每次考核都很满意。我也干得特别起劲。事隔十多年后，65年国家土地测量总局的一个测量队来找我，了解这346平方公里土地的地理测量及图纸情况，我告诉了当时的详情，他们借去十张底图。四周后，副局长亲自来到，对我们图纸的精度赞不绝口，送了不少慰问品。当场要求我们与他们合作，借去我们的全部底图复制。不再重新测量，並写来了感激信，当然是给农场党委的，信中说：“图纸的精度经他们三次核查，全部优良，为数十年之仅有，由于免去重测，为国家节约了近百万元。

可是承担全部技术重任的人，他们绝没有想到是一个刑满释放留场就业的试用工人。由于这次最高的考核，我才被以最低一级工程师的待遇（国家技术十级）留场工作，每月工资99元。此是后话。

1956年初，冬训后规定评级，办法是按社会上的标准定级，工程师需经省公安厅批准，並按正规工资发十分之一，算“假定工资”，我被评为五级工程师。除了一位长者外我就是最高的了。我怕“出头的椽子先烂”，自愿下退一级，即六级工程师。58年以前刑满的，按所评级录用。58年降一级使用，到我64年刑满释放变为降三级还不正式录用。

记得58年初有个姓李的刑满，他不填写留场申请表，写了一个报告，说明自己是有家可归（上海人）、有业可就（有修理机械技术）不敢麻烦政府，领导批准他走了。大家为他高兴。时间快到的人也为自己高兴。次日一早，他拿着自己简单的行李就向火

车站奔去。快到车站，过一个小桥，在他前面走的一个妇女，手提包掉了，她还不知道，李某走前一步，捡起包来一边叫：“包掉了。”正要还给她时，那个妇女突然回过头来，一把抓住小李，大声叫嚷：“抢人啦！大天白日敢抢人啦！快来抓贼啊！”此时有三个武装的公安，从三面包围上来，其他赶火车的也围上来，那个妇女叫个不停，他极力分辩：“自己看到她掉了提包，一边喊包掉了一边捡起来正要交给她，根本没有抢……。”三个公安不由分说：“呸”一声卡上手铐，又对大家说：“我们都看见他抢人，人证物证俱在，还有什么话说。”“你是哪里的，嗯！搜……”从身上搜出释放证：“好！你劳改释放分子，昨天释放，今天就抢人。”

劈头劈脸，拳脚交加，揪到县公安局。后来法院受理，又判五年刑，仍押回农场劳改，于是县里有专门材料宣传，要老百姓提高警惕，“没有改造好的劳释分子，绝不能放到社会上危害治安。”农场也专门开大会批斗他，拳打足踢，只准“规规矩矩，认罪伏法。”根本不容他讲话。我们明知有假但不敢说。从此以后识时务者，谁还敢不写请求留场的申请，凡到刑期者就发表填写，领导还要叫去训示：“我们哪里需要这么多人？不过是看到你们无家可归，无业可就，只好勉强留下吧！”刑满后又照例歌功颂德一番，这就是自愿留场了。

过些日子，果然新花招又下来了。凡刑满释放者，案情属反革命和坏分子的，一律为“预备工人”。其他案由的为“试用工人”，从预备到试用，多则三年，少则二年。试用期为2-3年，经过考核无误者，才升到“正式工人”。“预备工人”只准在场内行动，未经批准离场者，以逃跑论处。“试用工人”请假稍宽一点，一句话又得经过五、六年的时间，所得的工资，仅能吃饭。熬到“正式工人”也不过每月有一、二十元零花钱，可以请假回家而已。

到我 64 年刑满时（还是表现好减刑两年），由技术六级降三级录用为预备工人，不予技术职称，每月有 90 元左右的工资，还是特殊人物了。

有个叫许元德的绥化本地人，刑满三年多了还是个预备工人，他是坏分子，属于屡教不改的“杀牛犯”。那时规定非经镇政府一级批准不得杀牛（自己养的也不准杀）。第一次他没钱用，杀了自己的牛，吃一半，卖一半，被告发了，罚了款。后来又杀了一只牛，杀了卖，赚了一点钱，被告到县里，以坏分子为名被判刑二年，刑满已经三年了，还是预备工人，要想回家都不行。有一天他告诉我：“准回家了。”我惊讶了：“你不是预备工人吗？”

“其实也很简单，我叫家里人给队长家（也是本地人）送去一角（1/4 个猪）就解决了。”别看规定得那么严，说简单也真简单得可笑。

知道这些内幕，我才得以在十年下放中，熬过且避免过许多非人的折磨，其中的奥秘“带云南的名烟、酒送队长”。浮夸、说谎、腐化、堕落随处可见，其最后一发不可收拾也。

海伦农场是最大的劳改农场之一，有十三个分场，开垦着三百四十六平方公里的肥沃黑土地。1955 年前后开始建场。后来派了省劳改局的杨彦处长担任场长。我和杨彦在建省公安厅大楼时就认识。他是审查设计的领导之一。从他所提的问题中，我觉得他提的问题能抓住重点，多少是个懂行的干部。后来听说他是哈尔滨地下共产党出身，有相当文化，性格开朗爽直，他带了几个干部来农场，其中有他的老部下，曾犯过小贪污案的曲立萍担任基建科长。后来我就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这些从省里来的干部被人称做“省派”。另外有原海伦县副县长主管公安工作的钱德福担任书记。他带了一帮地方上的干部，像张史奋是原海伦县监狱长后任基础大队长、农业局副局长、原土匪出身的王海富副场长，

还有大、小干部几十人形成所谓的“地派”。“省派”和“地派”你争过来，我斗过去。我这个犯人就成了斗争的焦点，作了替罪羊。

杨彦上任后为了作好全面规划，就向省劳改局新建勘测队，指名借调我到农场工作。设计规划任务刚告一段落，省劳改局派来二人，要我交待工作，回哈尔滨另有任务。据说是搞哈尔滨至佳木斯铁路以东，一直到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江汇合处，纵深五、六百公里的大荒原地形地貌测量和建场规划。

就在这前几天，我意外地在这荒原上碰到一个老乡，一个昆明人。他在昆明读中学。51年就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最近才从部队转业下来。说起来他还是我的一位工程界老同事的儿子。万里之外见到故乡人自觉分外亲切。要另调其他地方就特意去生产科找他告别。他听说我要调走，当天就赶到六分场，找到了杨彦场长，又和杨场长连夜坐吉普车回来。第二天一早杨场长亲自来告诉我：“不要走。”他和来调我的干部去省公安厅找领导面谈。三天后杨场长回来对我说：“这回你就再也不走了，我把你的档案材料调来了。”

“今后你就大胆的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真正的工程师。在这里好好干吧！”

廿多年我就在绥齐线上的这片荒原上，尝够了酸、辣、苦、甜，不！没有甜，有的是屈辱、压抑、几次差点儿就命丧黄泉。

杨彦是有事业心的好干部。面对占地 346 平方公里的大农场，要建成国家商品粮基地，他雄心勃勃，只要解决了水利设施，排干了涝、荒地，不用肥料，一脚踩出油的黑土地，就会给人们带

来滚滚的黄金。

水利靠人修，广袤的土地靠的是机耕，是人来操作。上万人的大农场，90%的人是犯人或留场就业人员，5-6%的管教干部，4-5%的武装警卫。不动调积极因素从犯人中找能人是不行的。在占总人数5%的管教干部中，又分成了所谓的“省派”，即以杨彦为首的由省公安劳改系统调来的。另占大多数的是所谓的“地派”，由海伦县及县属公安劳改系统来的。以场党委书记钱德福为首，钱书记兼主管犯人的管教场长，还有主管农业的张副场长等人，以及各大队或分场长，也都大部分是地方干部。夹在这两大势力中的是我这个犯人工程师，我也是从省劳改局调来的，受到杨场长的“重用”，就成为两派斗争的焦点。

1958年开春前后，在全国大干快上的大跃进中，农场准备在通肯河上修造拦河坝，大面积蓄水，开挖数百公里的引水渠。总场召开了数千人的动员大会，各分场的精干劳力水利基建大队由分场长带领，整齐地坐在草坪上，新建土台上插满了红旗、布标。武装警卫站在台前，路口上架着机枪，台前的木条凳上坐着各分场负责干部。整个规划和勘测都是我们设计室冒着严寒在冬天里搞的，在多次的审查研究会上我已详细地报告过，讲完后我就退出由领导作决定。这次开动员大会，我们总场基建科设计室的人，照例坐在紧接台前木条凳的草地上。大会开始钱书记主持，杨场长作报告，他讲了农场的前景，讲了这项水库及配套干渠对提高产量、新增垦区面积的巨大作用。说到施工的土方、坝高、质量要求时，他突然大声叫：“黄湛！”

“有！”我站起来。

“上来！来台上详细讲。”

我在台上桌前坐下。他调整好扩音器，亲自给我倒了杯水，大声讲道：“你大胆地把自己看成是真正的工程师，简明扼要地

把所有要求讲清楚。”

我指手划脚地讲了 40 分钟，讲完他就带头鼓掌，坐在前排的干部们都楞住了，犯人们却鼓掌热烈。

不知道中国监牢和劳改队情况的人，也许会觉得这很平常嘛！“讲得好就鼓掌，有什么不可！”但我是个犯人，不能有掌声。

我讲一个简单的事实，读者就会知道杨场长的这一作法是多么“大逆不道”。我到哈尔滨之后，搞公安厅大楼的设计，下班收进监狱里，上班到大墙外面的办公室里工作，早上起来放风、洗漱上厕所都按监狱的规矩。铁门一开，上述动作要尽快完成。上厕所时我意外地发现原滇军六十军的几个师长顾视高、李长雄、景阳，他们跟着卢富泉在海域被俘，也关在这监狱里。我们都是年轻时踢足球的朋友，万里之外相见，我正欲打招呼，他们别过脸去不理。顾视高乘对面走过来的机会，擦身而过时嘴里喃喃道：“此地规矩很严不能相认。”我的动作还是逃不了监管人员的眼睛，立即就被认真审讯“我与他们是什么关系！”可见管得是相当紧的，设计时除工作以外的话不许交谈。

来到农场后，除了晚上必须住到铁丝网以内的小宿舍外，白天，在基建科设计室，可以在职工食堂吃饭，可以参加场长通知参加的会……难怪许多干部，背后议论纷纷。

有一次，上头通知我去参加一个会，研究引水干渠的问题。一进门正听见杨场长说：“你们哪个会干，我就不要他……”我正欲退出，他叫我坐下。古语曰“士为知己者死”，虽然我和他没有谈过什么知心话，但我把他视为知己。

就在水库快要通水的一天，突击抢干到夜晚九时，还没有吃上饭，疲累不堪的犯人们口出怨言，被他听见了警觉起来，立即离开工地。

他把我叫到水库大堤上的临时工棚里，说：“老黄，我累极

了，想睡一下，你帮我外面放哨，有手电吗？”

“有！”

他拉开他的十响枪，压上子弹。

“你会用枪吧！”

“会！”

“你拿好，务必提高警惕。”

“是！”

我深为他信任自己而感动。当时我也疲累以极，仍精神百倍地到外面放哨。到了半夜，有两个人匆匆走来，我大叫：“站住！”他们不理。

“站住！是谁，否则我要开枪了。”

“我们是刘丙星、王永乾。要找杨场长。”王、刘二队长看出是我。说：“你说要开枪！哪来的枪？你的枪呢？”

“我哪有枪，不过说说而已。杨场长在里面睡觉，他叫我看，不许人来打搅。”

就这样，杨彦重用坏人，叫个犯人站岗。“地派”的干部恨死了我。

在主干渠 9 公里加 300 米处，有一个坡。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这干渠都在上坡。我们也很奇怪，重测了多次，证明是下坡，下八千分之一，每百米 1.25 公分，反复计算确实没错。一天主管农业的王副场长从那里过，看见了大为震怒，把我叫去，训了一顿，又到工地指给我看。在场的有几个队长都说：

“不行！这段高，水过不去的。”

我说：“这是错觉，我们反复测量过多次，完工了又测了几次，您看看这测量数据。”

“哼，你还要强辩，你知道自己是什么人？”

我也急了：“我敢立下军令状，水过不来我拿命担保。”

“用不着立什么军令状，看我能不能枪毙你。犯人还居然敢顶撞我，那还了得！”队长们议论纷纷。

“我看把他押进小号，关他十天半月，看他还敢逞能。”

“这种人不搞破坏才怪呢！还要重用他……。”

“好啦！”王场长把腰间的枪一拍：“等到放水时，水过不去我亲自毙了他。”

后来水顺利地通过了。仇恨却在他们心里畸形地澎湃，导致了一场场欲置我于死地的“阴谋。”

从 1958 年水利会战之后，我们设计室又接着按杨场长的意图，设计和参加施工安装了面粉厂、榨油厂、汽车库、利用玉米芯生产糠醛的厂，还在三井子西边建成砖瓦厂和发电厂。建小水力发电厂之前，杨场长找我去设计。

“我确实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你就是工学士不假，我们场就没有一个工学士。行了，给你三个月的时间，要什么书籍资料，开单子来给你买。”

“这……。”

“别再犹豫了。总场部要搬到三井子，有这个小水电站，解决多少问题。”

回想起我刚到农场时，电话线找我设计，架广播网是叫我搞的，水泵不出水也来找我，扩音器坏了也要我修，这都与我的土建专业无关。搞不来也要挨骂，搞好了也要挨骂，真是整天忙得团团转。更可笑的是拖拉机坏了也要我去修。我说：“不会修。”他们还骂我反动思想顽固，抗拒改造。那时正好碰上杨彦，把事情汇报清楚，杨彦说了句公道话：“工程师也分专业，不是万能

的。”

我感动得自告奋勇地去修：“我会修汽车，机械的事大同小异，试试看吧。”原来是离合器坏了，螺丝掉了，上好就好用。这下坏了，反动保守的名又传开了。

1960年糠醛厂、锅炉房、烟囱、锅炉等都安装了，但生产等技术问题尚未解决，不具备开工条件。除砖瓦厂外其他建筑都要安装暖气，又什么都没有。单是采暖用的锅炉，就要12万元，时间也来不及，就要求用糠醛的锅炉送气。最远的是总场部，距糠醛厂锅炉房715公尺。通过一系列计算，我认为可以。基建科曲科长听我详细介绍后，也认为可以。施工的和机务的负责人却说“气送不到！”其中有新调来的管机务的王工程师。杨场长就召集各方面开个研讨会。他们首先提出路程远保温困难，送不到总场部。况水暖器材购买困难，以建立小型低压蒸汽为好。又说，设计主持人是犯人，无权做设计，特别是事关重大的有争议的项目。他们要求场长命我退席离开，他们才愿继续研究。

杨场长说：“先叫他把糠醛厂送气方案报告完了，就叫他走。”

于是我就把方案的可行性论证，优缺点及所需设备管道概算数，预计进度并所有计算书、资料等陈列桌上，详细讲完后，留出10分钟回答问题。我举例说明了714米不算远，就如列车送气，一列车箱连走道共43米，普通火车平路拉15节车箱已达645米，只用一根一又四分之一的管。大家都说不不对。

那位机务工程师也说：“不对！是两侧底上车厢内各有一根2吋管。

我说：“那是散热管，不是送气管。”说完我就告退了。

后来会开到半夜，杨场长建议选择糠醛厂送气的方案，终于通过了。组成专门班子抢赶工程，由我负责施工。我知道很多人在看笑话，北方冬天的采暖问题甚至比吃饭问题还重要。

终于，一个月的苦战后，11月2日试送气到末端的总场部，但气很微弱。反对派议论纷纷，矛头指向我。当天各处检查后，发现两处疑点。晚上我严厉地单独质间接管负责犯人工头（组长）关于两个可疑的转弯处：“我事先三番五次交待要亲自检查，为什么不畅通，定有鬼。”他否认。我连夜去检查，拆除管道接头。发现管内有石头砖块，被气冲到转角处聚集堵塞。天亮时三处畅通了。在铁证面前，犯人工头承认是李队长叫他干的。李队长是基建大队长张史奋（外号专使坏）的亲信。我答应他“我可以为你保密，不向上级报告处分你……。”我又与烧锅炉的二毛子说好，叫他先放一点点气迷惑基建总队长“专使坏”。

送气了，室内仍很冷。大家愁眉苦脸，基建总队长“专使坏”却声大气粗，先扣了我一大堆帽子，要我在事先准备好的认罪书上签名“关小号”，我知道这种天气关小号，能活下来的很少。这时杨场长来了，他问我：“这是哪里错了？”

我说：“一点也没错。”

“专使坏”正待发作，我当众打电话给锅炉房。一分钟后所有房间全部都热了，大家转忧为喜。我向杨场长报告昨夜抢修的情况，未说谁叫堵的。有的水暖工气极了，故意把阀门蕊子拔走，一连三天可把他们热坏了。

由于我打乱了他们的计划，“专使坏”气极了，找点事和曲科长吵了一架，就把施工人员撤走了。这时回水尚未按计划送回锅炉房，实在无法，只好排进渗井里。渗井满后水溢出，浸泡了房屋的墙脚。春天融化了，墙出现几处裂痕。“专使坏”又说我搞破坏。我也把李队长叫犯人组长在管道内塞砖头的经过报告了杨场长，请他不予追究。我把此事的详细过程记录下，以备后用。

事后多年我才知道，当时“地派”的势力要整跨杨彦，必先倒曲。因为基建科长曲立萍是杨的同事，是杨把他要来的。曲虽

然知道盖房子和修水利的事，但不能做设计，不能实地测量，这些都要靠我。所以要倒曲，必须先把我除掉。就由“地派”的干将、基建总队长四处收集材料，在恰当的时机上报，要求定我死罪，立即就地枪决。

1961年，伟大领袖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告。从57年的反右，59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极左路线一直升级到搞四清运动，和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

搞掉我的时机成熟了。1962年，先是反对派一再向上级反映杨彦右倾，敌我不分，阶级斗争观念模糊……。上级决定调走杨彦。杨场长面对他一手建立的农场，要突然调离，真是感慨万千。杨场长走后，据说在省劳改局挨了批判。曲科长呢？就被罢了官，下放烧锅炉。而我呢？上报八大罪状，要求批准就地枪决，以儆效尤等等。我若干年后才完全了解了当时的真相，原来是这样的：

海伦农场上报的文件，送到省劳改局及公安厅。由于我是1956年在省劳改局实行“假定工资制”时，经过省公安厅考核批准的“六级工程师”，而且案情重大，涉及面广，所以黑龙江省公安厅厅长兼党组书记批准，成立了由省公安厅、省劳改局、绥化地委、海伦县委、海伦农场党委、省农垦局、行政干部和技术干部各一人的调查审判组，所谓的“六堂会审”，先查现状。

他们先查八井子分场的排涝工程。

1959年后，农场调来了一位关场长，他认为要发展旱田，八井子地区有4000公顷土地太涝不能耕种。而八井子分场当时只有400多公顷耕地分散为483块，其余都被水淹。当时曾命我主持搞全场的排涝规划。由于要赶出成效，只好边设计，边测量，边

施工。到 60 年国家极端困难时，农场紧缩，基建下马，工程只完成约 40%。“专使坏”等人大作文章，说我搞“反革命破坏”。把施工队长撤职反省，取消排涝试验站，理由是“反革命分子”黄湛搞破坏，干了两年毫无成效。我心里有底，排涝不可能立即见效，一般必须水排到一定程度，拖拉机能下田翻地，土壤疏松，湿度适当才能播种。到 62 年来查时，已经收效显著，完成排涝原订计划的 3/4。八井子大柏树地区增加了两个分场，耕地面积达 3600 公顷。调查组一对照上报原文，大家心里开始怀疑海伦农场所报事实了。

罪名最能成立的是：以兴修水利为名，搞反革命破坏，把农场拖向绝境，工资发不出来。指的是：1958 年大兴水利时我提出一个计划，“由通肯河引水到旁边各存水库的干渠相连，发展水田 1000 公顷。”原定以 5 年为期逐步完成，后来领导说我右倾保守，要求一步见成效。欲速则不达。由于眼大肚小，削足适履，因此干了两年以失败而告终。这是领导的事，我只能干着急，没日没夜地干，把通肯河水引到大干渠。大规模水稻失败，有多种原因。其一是工程不配套。要求快把靠山边的渠道改为单堤……，单堤过坡由设计的 1:1.5 改为 1:1 等等，由于坡比改动后安全系数降低发生冲毁。其二是农业部门忙到种子都不进行消毒。第一年丰收在望，忽然一场稻瘟病，全部死光。第二年播种达 1050 公顷。一部分水不及时，种晚了“冻死”。水时有中断“枯死”。还有一部分是头一年留下来的稻瘟病毁了，两年不收，上级决定放弃。反对派用此指责上告，造谣无所不用其极。我的罪名是搞反革命破坏，把农场推向绝境。幸好每项计设都有计算书，每一次改动都有记录，曲科长也都认帐。农业方面的问题不是不能种。此地朝鲜族村片沿河边都种水稻，而不会大规模种。这些问题也能怪我吗？所以调查来审问去，我非但无罪，连工程上也都无个

人的差错。

所谓“以反革命为目的，包庇星火水库冲毁责任者，编改技术计算书为责任者开脱罪责……。”也是靠完整的计算书才说明问题的。事实是60年一次大洪水把星火水库大堤冲毁了100米长的两个大缺口，土方量约3-4万立方米，属重大事故。杨场长叫曲科长通知我，要我从测量洪水流速，大堤耐受力等实际情况精确计算，看看是不是人力所不能抗拒的因素。我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收集第一手资料，认真计算，每一项数据都有来龙去脉，精制成80页的计算书。底子自己保管。按重要文件上报，结论是写：“人力不能抗拒的情况”，因而主管施工的吕队长无事，杨场长等领导也放了心。“专使坏”又企图烧毁上报场党委的计算书原件，幸好任稻祥技术员有准备，把复制件报党委，场部留有原件，我也呈上自己留的底稿。

其余罪名如：威胁队长、水渗墙开裂、用外语搞秘密串连等也不能成立。两天后，又提审。任调查组长的公安厅周处长明确告诉我说：“我们多方面调查结果，所有问题责任都不在你，罪状不能成立。你今后应该继续一丝不苟地工作……。”

农垦局水利处秦副处长感慨地说了一句真话：“在这个环境里，以你目前的身份，能做到这样是不容易的。望你相信党、相信上级各领导，处好同事关系，前途是光明的……。”

好险啊！如果不是那些完整的计算书，不知会有什么下场。一个月后又来了一纸公文曰：“黄湛，工作负责，据查实应给予减刑两年的宽大处理……。”

如此说来由51年3月到64年3月，我13年徒刑即可满了。可以回南方，可以回家了！万万没有想到农场的实力派“地派”恨得咬牙切齿。要拍死一个劳改犯在他们看来易如反掌。毙不了你，整死你的办法还少吗？

第 三 篇

天灾乎？人祸乎？——饥饿变奏曲

鼠口争粮 纓子救命

所谓 59、60、61 三年自然灾害，造成大规模的饥荒，是天灾还是人祸？不是中央和省一级最高决策者，谁也说不清。北大荒黑油油的土地，夏天虽短，植物都在疯长，争取在有限的时光中活上一夏传宗接代……。除非在收获季节有冰雹、早霜冻、连月阴雨，一般是绝不会闹饥荒的。61 年秋收是个中丰年，联合收割机在金黄的麦田里，来往着。成百上千辆汽车，满载着粮食，往国家大粮库拉。粮食拉光了。天寒地冻吃什么？饥饿的恐惧笼罩着整个农场。后来果然宣布减粮 30%。每天每人定量不过七市两。早上两个小小的窝头。晚上稀稀糊糊的一碗。我们队里有个当地人小丁，他小时候因粮食不够吃，曾有与老鼠争粮的故事。

“从老鼠嘴里能夺得多少粮？……”上海人老李讥笑着。

“别小看老鼠。这里的田鼠比普通老鼠大，它们最会打洞。整个冬天就在地洞中过活。它们的洞有卧室、粮食储藏室，哼，连厕所都有呢。它们洞里有通气口，有防寒设备。你这人还打不出这种洞呢！

一听说鼠洞里有粮食贮藏库，大家就来劲了，报告了队长。怕挨饿是共同的心理，队长同意了。我们七个人组成一支抢粮队。那是 11 月初，天气已经很冷了，土层冻了 40、50 公分深。我们背着行李、工具和锅碗来到山边。向阳坡上挖坑、挖冻土要用十字镐，像挖水泥地面一般的开凿。我们砍树、割草、搭成一个“地印子”。“地印子”是当地人在旷野里简易避风雪严寒的窝棚。先挖成宽 2.5 米，长 5 米，深 0.5 米的大坑，把土堆集在三面，砍来的树搭成人形字罩在坑上，再复盖上树枝、茅草。四点多钟，天渐渐黑下来，我们钻进里面，点上蜡烛，啃着打得死狗的冻结了的馒头。六点大家都睡下了，听小丁详细讲，并准备明天的行动

计划。

“那么大的林海雪原，上哪去找田鼠……。”

“别急！田鼠选洞大都在树林空隙的灌木丛里。表面有厚厚的枯树叶层，再加上 20-30 公分的雪。就比咱们的窝棚还保暖哩！它们没有给水设备，口渴了要出洞来吃雪。它们毛短，耐不住严寒，要立即回去，我们看好了，就跟踪挖。

“我们也耐不住一天的冻着等啊！”

“别忙，他们有时间性的，一般总在上午太阳出来以后。”

我们就分成两个组，次日行动。

第二天一早烧了开水，又吃了馒头，就往山里去。小丁选好了地方。我们拿着锄镐，倚着树木悄悄地监视，不能动，不能出声。寒风刮来，穿着皮大衣，还冷得发抖。过了大约一小时，果然看见一只大田鼠探头探脑地出来，就在洞边吃雪，洞口有一大树枝叶遮住。我们一齐上去，快挖快刨，一会儿就挖到田鼠的苞米库。约有一斤苞米。监视的人又发现从另一洞口跑出田鼠，钻到隔壁邻居家，跟踪追击，又挖出了两个粮仓。失去家的田鼠乱窜入邻居家。如此跟踪，两小时下来。一个口袋差不多装满了。

有家的田鼠守在洞口，拼命地咬那些丧家之鼠，一场混战暴露了许多目标。丧家之鼠，别的鼠不肯收留，在那里的冬天，气温在零下二、三十度，田鼠在地面很快就会冻硬。在冻死之前，都会有神经错乱的情况。它们拖儿带女，乱跑一阵后，胡乱爬上小树的枝杈上，卡在树杈上，死在那里！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实在不忍。好好的一家子鼠，倾刻之间，被我们这些人匪抄家，弄得家破粮绝，又不为邻里所容，天寒地冻，濒临绝境，无可奈何！一只只田鼠卡在树丫子上，倾刻间便冻得硬梆梆的了。

我们抢了三天，得各种粮食 300 多斤，逼死田鼠百把只，胜利地返回。只留下那些挂在树杈上，眼睁得大大的，死不瞑目的

受害者们了。

1959 那一年，场长杨彦，据说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内受到批判。那时我们这些劳改犯是不得看报的，只能由指导员的时事报告中，嗅出点味道来。有时也从不逦而走的小道消息得知点情况。杨场长离场了，到哈尔滨劳改局去了。他看重的水利、基建、技术设计等，也面临着覆灭的危险。果然 60 年设计室解散。在钱书记和“专使坏”等人的“安排下”，我被下到最边远的北河分场，指定干大田作业。

“毙不了他也要让他累死、饿死……看他还敢得意……。”

分场丁场长看到了我：“你们回去吧！”他指着押送我来的大军（武装看守）说，“我会好好管教他的。”

他关上了门对我讲：“我知道你会有这一天的。”是幸灾乐祸，还是……我摸不着。他走过来，上下仔细地看看我，又叫我“伸出手来！几岁了？”

“报告场长 44 岁。”

“你干什么活。去、去、去老残队去。”写了一张条子叫我去报到。

这丁场长是部队转业，顶多卅岁吧！在总场几次开会见过。老残队归行政科管，主要任务是种菜等等杂活。当时天已大冷，白菜已收光，正收萝卜。

“怎么！你也来跟我们为伍啦！又犯了什么错误，一溯到底。”

“杨场长走了。他们害不了我，想出来的妙计……。”

“别看丁场长年轻。这些人谁个正直，谁个邪，他心里清楚。你就在咱们这里耽着吧！”老王悄悄地对我讲。他原是国民党军中

的团长。他把我安在大铺上他的隔壁睡下。旁边是张老头，五十二岁，是原吉林一个县的建设科长。同是天涯沦落人吧！

粮食越来越紧了。政府号召以瓜菜代粮。冬季冰天雪地，地面积雪不少于 30-50 公分。下面冻土 1-2 公尺。那来的瓜菜代粮呢？菜收在地窖里，一个分场几千人。怎么代？一天老王和我讲：“窝头越来越小。我这老头夜里都饿得心慌。瓜菜代粮倒提醒了我。我们天天收萝卜，萝卜缨子不要，何不收起来，堆好，盖上雪。必要时好拿它来度命。”

我和老张立即赞成，说干就干。每天中午吃过饭，不休息。就去工地打扫，收集，堆放，盖上雪，一共五大堆。只有我们三人知道。到了 11 月中旬，每天才有三两的窝窝头，一顿两小个，饥极了的人一口就吞一个。菜叶飘在清汤里，油腥味都闻不到。

为了防止暴乱，岗哨增加了，夜里探照灯在高墙、铁丝网间扫过来扫过去，看守得特别严格，谁都无法外出。一天我病倒了，又冷又饿，越饿越冷。去医务室看看吧。虽说高墙内有医务室，但设备很简单，唯一的医生宋大夫是原国民党起义过来的军医。没判刑，刚调来这里，也够他受的。

“姓名？”

“黄湛。”

“哪儿不好？”

“昨夜发烧，全身无力。”

“抬起脚来我看。”

我一面按着髌骨部位一面给他看。

“好像不肿。”

“你就是那个由总场下来的，大墙内的工程师吧！”

“也算是吧！”我苦笑了一下。

“老黄啊！几岁啦！在这里可是要多自我保重啊！”

“能行吗？这您知道，每天有多少食物下肚。”他看看四周。

“你会外语吗？”

“我云大毕业又在南京大学进修过，有字典可以看原版英文资料。”

“我这里正缺个药剂师，缺个帮手，我跟丁场长说说你就来这儿吧！”

就这样我变成了药剂师兼护士。拿药，打针，不几天静脉注射也会了，我就成了宋大夫的助手。

有几次宋大夫要我去护理警卫班的病号，这样跟大军也搞熟了。猪号、马号在大墙外的平房里，由刑满就业的预备和试用工人干活。我跟他们也熟了，就夜里出去：“报告大军，犯人出去。”警卫战士看见是我也都放行。猪号时有死猪肉，马号时有死马肉。他们都悄悄地让我参加吃。就是没有菜。于是我把一处萝卜缨子的秘密告诉猪号组长。他说：“嗨！你这黄老头，有办法。这回有肉都给你留着。”

1月份老残队抬来两个病号，其中一人就是老王——王团长。一米八的山东大汉，缩得又干又瘦，人都脱了形。他得了并发心脏病，气息奄奄。

我给他揩过脸后，又给他喂水、喂药。他看旁边无人，就说：“你这是白费力气了，我的病是饿出来的。”

“你安心养病吧！我有办法，晚上我弄给你吃。”

晚上九点我回来了。煮注射器的铝盒里装着猪肉烧萝卜缨子。他高兴极了。我扶他坐起来，慢慢地吃完了那盒菜。他一面轻轻地吃一面细细地品味着，额头渗出了汗，兴奋得眼睛都亮了。

“大兄弟！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山东泰安老家。孙子这会都十来岁了。一别十多年，真想他们啊！”他笑了笑说：“我吃得真香。总可以不做饿死鬼啦！”

我给他拉上被头，掖好，盖得严实。看着他胡子拉碴的瘦脸，我的心紧缩了。第二天早上去看他，已经冰凉了。

那位姓张的建设科长 2 月份也来了。他患了肺心病。已到了严重缺氧的状况，嘴唇指甲都青紫。我也悄悄地喂了他猪肉烧萝卜缨子，十多天后他仍然走了。我把萝卜缨子的秘密告诉了宋大夫，以后我们就名正言顺地用这四大堆萝卜缨子，大约 1000 多公斤，给患水肿病的人煮了吃。每天能吃上 1-2 两的较轻些的病号，都保全了性命。这萝卜缨子含有多种维生素，又不怕冻，效果真太好了。做好事的人走了，却把它的好结果带给了百多个人。确实该呼“萝卜缨子万岁！万万岁！”

饥饿众生相

每当我写到 1960 年冬天那凄惨的日子。我的手仍然在颤抖。我的心滴血。人权何在？生存权又是怎样被剥夺的。当 960 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笼罩在饥饿的阴影下，数以千万计的人被饿死的时候，在社会最底层之下的劳改犯们，又是怎样的生生死死呢！

难道仅仅是官方称呼的中国人民战胜了“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三年困难时期”这些好听的字眼吗？为什么不敢不愿或是不能报露实情呢？是层层暴君，是魔王的专制造成的吗？总有一天人们会从许多层面来真实地描写那个年代。

我在医务室，头个月还可以按处方配药。以后病人越来越多，大部分是水肿病，病名“611”。死的多是由“611”引起并发症造成的。药也不多了，只不过给点维生素什么的。宋大夫要我当护士，一天到晚忙个不休。最后病人多到 300 人，又腾了几间房子，成了“医院”。一间房两排长炕，一排排长炕上睡满了病人，头朝中间走道脚朝里。他又拨了四个“犯人”给我，权充“护理员”，

我就成了“护士长”。

“病人”被人扶着来，拄着拐杖来，抬着来……。他们除了公家的棉袄、铺盖，还有点私人物件。我就一一登记，编了号码。能由家人领走或邮寄的另放一屋，准备让他死时穿的就放脚头。

奇怪！个头大的，原来的强劳力，最难捱饿，瘦得快，缩得快，肿得厉害，也死得多。

在基建队干过活的山东人李富财，登记名字时我才认出他。眼窝深陷，白色透黑，人称之为死气。一身皮包骨头，肚子却出奇的大。一路嚎叫着被抬来。

“他饿极了，吃泥巴。吃了两、三天了……。”

“泥巴怎么咽得下去。”

“老黄，你不知道。”抬的人也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昨天我们在挖沟工地，手还扶着锄头把，倒地就死了两个。不知道哪天该轮到自己。”他叹口气慢慢走了。

这李富财，我们没办法把他弄上炕去。不知他哪来这么大力气，一忽儿用头撞炕脚，一忽儿爬起来如捣蒜般地磕头：“医生，救救我啊！我没有犯法，没有罪啊！小香兰被镇长抢去了，我喝了酒说要杀他，是气话啊。他就把我抓了判刑。我有老娘、小弟，我要回家乡去呀！”

“小李先躺着，我们给你吃药灌肠，能好的，听话啊！”

他认出了我，求道：“黄公，我肚子疼死了。你拿把刀来，帮我剖开，把泥巴掏出来好了。”

他又从炕上滚到炕下，在走道上乱滚，乱嚎，折腾了一晚。天亮前他又叫我，此时已气息奄奄了：“黄公，你记下我这话，就是冻死、饿死也不能吃泥巴胀死。把我的几件衣服捎回去给我娘，带好小弟，我的魂会回去的……。”

他的眼睛睁着，眼皮怎么也合不上。公家的大棉衣留下来。

穿着他身上的衣服，抬到大墙外的停尸房。马号背后 100 多公尺的一排三间种子库，倒了两间，还剩下一间，专门摆尸体。停尸房此时已经塞得快满了。我编了号 A、B、C、D、E 五排，中间是走道，头在里面脚朝走道，每排一个压着一个可堆八个。每个鞋底上又贴上号码。A-6 就是李富财，他家是不会来领尸的了。放心，零下 20-30 度的严寒，尸体是绝对不会坏的。

当地犯人家属来领尸体，我就翻开所掌握的特殊户籍册“生死簿”，查×××，×月×日死亡，放在×排×号。两个护理员和我进停尸房，稍微抬起上面的，用铁勾勾住脚往外拉，尸体冻得梆硬，一拉就滑出来了。

我们这分场“医院”没有外科。不远的红光农场和海仑（伦）县医院都有外科，但场领导认为送到别处影响不好。也许是劳改农场的上级或上级的上级早有指示：“自然死亡率”可控制在某个百分比吧！殊不知，历次政治运动，都有指标。镇压反革命指标是百分之多少；肃反指标每个单位是百分之多少；反右的指标每个单位又是 5%，如此等等不一。为了达到指标，生拉硬扯的把人们从他们的生活层次中拖出来，批倒斗臭，最后还送进大墙劳改、劳教，一去宛如无期徒刑。即使是被判“群众管制”，也变成无情斗争的一只替罪羊。

没有外科又不能送出去就医，需要手术的犯人，就这样活活的疼死、胀死……。

东北的大豆，颗粒大又饱满，黄灿灿的，那可是上等食品，享誉全国的呀！怎么会可怕呢？常言说“大米医饿病”，但饿极的人不能多吃，而且开始应该吃半流质的稀饭。大米在这里比什么

都珍贵，大豆却遍地都是。那年冬天地里还有些没来得及收的大豆被雪埋住了，场长就安排了些犯人去刨。这下饿极了的囚徒们不顾冻得梆硬，也不管咬不咬得碎，一边刨，一边吃。有的适可而止，有的想，好不容易碰上这个机会，怎能错过机会吃个饱吃个够，吃一顿至少也可以顶上两三天。大家于是就没命地吃，有五个人就这样被抬进了我们“医院”，这种撑坏的病人可怜亦可悲，没有一人能活下来，除非剖腹把胃切开。

那大豆从秋到冬干透了，颗粒很小。遇到水，到胃里暖和了，体积可以涨大三倍，在肚子里撑得紧紧的。我用手摸他们的肚子，铁硬的，肚皮子绷得像鼓。他们嚎叫着，拼命挖自己的嘴，想吐出来。满地打滚。我眼巴巴地望着，只能给他们打止痛针。

其中一个小伙子，猛吃快吃，没有下到肠子，全在胃里。我煮好了小刀、钳子，跟宋大夫说：“让我试试吧！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看他太难过了。”

“不能！快放下。”

“我来吧，你只要装作不知道就行了。”

“你疯了，你不要命啦！你动了刀，他也必然要死。罪名还要弄到你头上，你的罪还嫌少吗？”

“他也是人呀！他是饿极了呀！”

“送县医院，开辆卡车去，三小时就到了。书记不让送，说什么影响不好。我有什么办法。在他们看来死几个犯人算什么！”

宋大夫看我仍呆呆地站着，里间小屋里是杀猪般的嚎叫声、哀求声……他叹了口气：“我看你是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才劝告劝告你。总场测量队的刘毅，你们肯定更熟悉，也是不准送，死在这里的。”

“我知道……。”多少年没流过的眼泪，滚下来。我连忙擦去。

还在 10 月中旬，我在老残队时，一天收工，从医务室门口过。我注意看了看，门口靠墙的苞末杆子上坐着一溜病号。我意外地发现了——刘毅，我们测量队第二水平组的组长。我急忙跑上前：“小刘，你犯了什么病，几个月不见瘦多了。我还不知你也在这场呢。”

“黄公”，他拉着我的手，仔细端详我：“我在十三井子那边属这里的第六大队。四天前肚子开始痛，越来越厉害，实在受不了。卫生员看看不能医，才转来场部。”

我急忙问：“现在怎样了。”

“也怪！从今早上起就不痛了。”

我是过来人，知道要是阑尾炎，不痛那就意味着穿孔了。那时医务室还有两个医生。我找到姓李的医生，讲了刘毅的情况和我的体会。

“等检查了再说吧！”

第二天未出工前我就跑到医务室看他，他靠右边的肚子都硬了。我知道不好了，又去找李医生。

“李医生，我患过阑尾穿孔的腹膜炎，也是这样。先痛后肚子硬。动了手术好不容易才活过来。我看他也是这样，晚了就没法救了，你想想办法吧，他还年青哪！”

“上面不准送到别处治，我又不是外科医生，再说也没有器械设备，没有药，我有什么办法。”他摊开两手，“爱莫能助啊！刘毅，我们也认识的……。”

我一溜小跑，才赶上出工队伍，心里老挂记着他，关于他的一幕幕场景又在我脑海浮现了。两年前我们测量队，正测着现在红光农场的大片荒原，新调来一个济南犯人，我看他有高中文化

就亲自教他大地测量的基础操作，晚上在绘图之余，又仔细地讲解。他迅速作着笔记，字写得很清秀。夜深人静之时，我也很感慨地问他：“干吗会来到这里来呢？”

“黄公，我是济南二中的，十七岁参军，十八岁入党。51年入朝作战。半年后不到廿岁的我就当上连指导员。唉！一言难尽。”

下面就是他的故事：

一次大规模的向南突进，受到了猛烈阻击。我们团突得太远和大部队失去联系，死了一大半，活着的人变成了俘虏。我藏在死尸堆里，乘着黑夜以北极星作方位，翻山越岭往北爬。白天就躲在丛林里，到第二天傍晚碰到我们连的二排副。他杵着根棍子，脚上负了伤，衣服撕得一筋一柳的，也和我一样满身血迹。第三天拂晓，陆陆续续遇到了一些逃下来的败兵。据说我们师差不多全军复没。二排副老李和我商量：

“我参军前是刻字店的学徒，会刻章。现在能弄点吃的和医药最好。”我想了一下：“行啊。你就刻个我们一二七师收容站的图章嘛！去年我在清州江那边一次战斗间隙，还真见过收容站。站长是我老乡。我见过他盖章让战士去军部领给养的。”

这样我们第四天就在一个无人的小村住下，陆陆续续来了四十五人，办起了收容站。从七十多里外的军部领到了粮食、衣物。第二次我去时，军后勤部的李干事，给了我几箱药要我办个“医院”。十多天后又来了一个医生两个护理员。这下我胆子大了。前后收容、治疗了差不多两个连的人。编了队指定了负责人，又送到军部。这下我就变成“政委”，二排副就当了收容所的所长。可是好景不长，我们师副师长景跃清从国内接兵回来，他是分管后勤的。我们师全师复没，师长、政委都没有下落，从哪冒出我这收容站政委。调查来，调查去，二排副说出了真情。

“怕啥！我们在枪林弹雨中，拣了条命。没投敌，没开小差，

还收容医治了二、三百号人。交上级。官是我们自封的。怕啥！我寻思着还有功呢？”

“这下完了。好戏还在后头呢。”我是党员，知道组织纪律的重要。可不，我这个“政委”，就和“所长”一起送进了后方鸭绿江边的军法处。在集中营里干活、出操。又过了半年，审了几次，还好从轻发落。我被开除党籍判刑五年。先在沈阳劳改，后一起都转到北大荒来了。

他在测量队勤奋好学。不到半年就掌握了技术。还当上了第二水平组的组长。

下午收工我又去看他，整个肚子都硬了。匆匆说了两句安慰的话离去。第二天一早我又提前去看他。鼻子尖了，眼眶凹下去，死相毕露。我再也忍不住了，把我的经验告诉他。腹膜炎死亡率达95%以上。“你生还的希望太少了，有什么未了的事想一想告诉我，我一定替你办到。现在要出工，下午再来。”

第三天下午收工时，我急忙奔到他面前。他有气无力地说：“我父母双亡，从小是当清道工的哥哥把我带大，还有一个妹妹在郊区老家。他现在济南市环卫站，他还以为我在抗美援朝呢。”他拉住我的手，眼角滚出了泪。“我不甘心的就是农场害了我，不给医治。请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他叫刘泉清……。”他喘了口气又说：“黄公，我们师徒一场，你耐心地教我，很快掌握了技术。我快满刑了，还想以后为家乡的建设好好干呢，没想到却要永别了。你的心肠太好了，在这种地方要学会保护自己啊！”

“我一定做到。”次日早上我又去，他已到了弥留状态，见我苦笑了一下，嘴唇在动。我把耳朵贴在他的嘴边才听清楚：“再见了！愿你好运。”说完闭上了眼。我一阵鼻子发酸，赶紧出门追赶队伍，拼命地干活，才算好些。

老王安慰我说：“算了吧！安知我们的下场又是怎样呢？”

下午收工，他已被抬走了。谁知道后来我到了医务所，又当上管“生死簿”的“特殊户籍警”。12月初把仓库的死尸搬到露天停尸场——河心岛上时，又见到了他。61年5月9日，我当“掩埋特务队”队长时，又见到了他。肚子发胀鼓大，耳朵被老鼠吃掉一个，嘴皮和一半鼻子也没有了。如果不是查“户口册”，我将无法认出了。

60年冬天是个凄厉而严寒的冬天。食物太少，犯人们出不动工了。死亡的人数还在增加，停尸房已塞满。上级指示把尸体搬到北河的河心岛上。那地方约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狭长形的河心小岛就变成饿死尸体陈列场。各人的面部表情都不同，龇牙咧嘴的、有圆睁双目的、有狞笑的、有号哭状的、有鼻子、耳朵、手指、脚指被饿极的老鼠吃掉，而面目全非的。真是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要多恐怖有多恐怖。摆放时每人净占一米宽，间隔一米，每排二十人，共有十排。我照样分示 A、B、C、D。×排×号是×人。列簿登记好，备查。

61年四、五月间春季来临。上级通知可给病人每天二两大豆，还能喝上豆浆。死的人渐渐减少了。当时全分场犯人约1500人，死亡193人，死亡率约为百分之十三。除被领认的三十人左右，剩下掩埋160人的任务，丁场长又看重了我，又落到我头上了。他交给我二十个人，由我任队长，限三天完成这一项特殊任务。

当时已值5月初。冰河开冻，草儿发绿。尸体在严寒的冬天这个天然冷库停放没问题，但5个月过去，天气暖和了，尸体腐烂，恶臭难挡。如何完成这项任务？我把大家召集开会商量。先是大家主张挖一个大坑，统统埋在一起。我认为任务重，时间紧，

而土只化了 30-50 公分，挖大坑不行。决定挖小坑单个埋，挖下去 50-60 公分。土不足由旁边当阳处挖来加盖。为防臭，每人发一个口罩，注入酒精。

第二天，5 月 9 日，我们涉水过河到河心岛。隔老远就闻见一阵恶臭，近处更臭不可耐。死尸缺鼻子少眼睛。奇怪每个人都是肚子先坏，发紫绿黑色。我们每两个一组，在死人空隙里挖坑。我用一根木棍检查坑的深度，够深就埋。中午带去的饭（冷馒头）没有人吃得下。我们在上风头河边，身上、手上都残留着臭味，直发恶心。下午不顾河水冰冷，洗了个澡，绕道避开臭气。每组每天埋五人，三天才算搞完。最后我又带人给每一个钉上木牌，写上姓名、死亡日期、编号、绘制了简单的墓地图交给丁场长。他很满意。我也算了却了一桩心愿。能为亡灵做点什么？入土为安吧！

第 四 篇

无墙之囚

(1961—1968)

留场就业海伦农场

在“大跃进”之后不久的1961年，海伦农场遇到了一场大转移。我当时已经被调回农场本部。这时，毛泽东发布了一个新的计划，要把大量的城市青年下放到中国的边远地区，让他们“向贫下中农学习”，并且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海伦劳改农场的设施当时已经相对完备，基本水利系统和取暖系统都已经完成了。一些官员认定，海伦农场是安顿一批黑龙江城市青年的好地方。这里既能够让他们体验农村生活，又不至于因缺少暖气、清洁水和基本的住宿条件，而使他们感觉难以生存下去。于是在1961年，海伦劳改农场的几千名囚徒被转移到黑龙江更为北部的地区，那里的生活设施也更为简陋。我是被下令留下的唯一犯人。我曾经如此深入地参与了这个农场的工农业基础设施的设计和建设，所以，上面作出决定，我必须留下来继续这些工作。

在学生们到来之前，监狱领导把我叫去参加一个讨论。他们说，以前的“海伦劳改农场”现在就要简单地叫做“海伦农场”了。既然所有的犯人都走了，这个地方就不再是一个监禁之地，所以，再叫我犯人也就不太合适。既然如此，从那天开始，我就被看作是一个普通工人，而不是犯人了。但是，很明确，这样的安排只不过是一个表面现象，并不能些微改变我的真实身份和生存条件。我还是干同样的工作，吃同样的食物。唯一的是我的住宿有些变化，没有其他犯人住在那里了，我搬进了普通职工的宿舍。不用说，我的新身份并不意味着我就有希望获准回家。大多数的领导和官员都留下来参加新组建的海伦农场的工作。对于他们，就算他们不再称呼我“犯人”，可在他们眼里，我还是他们的旧日好时光里的那个犯人黄湛。

学生们在农场的将近一年里，干着犯人们在被送走之前干的

同样那些农活。他们大多数是黑龙江省的初中或高中毕业生。学生们都知道，在他们到来之前，这个机构是一个劳改农场。和所有的农民一样，学生们工作负担的轻重随季节起落。农闲时，学生们或以打麻将、读书来打发时间，或者回城短期度假。我不是普通工人而是一个囚犯的明证，就是事实上我没有这样的活动自由。农场领导命令我必须明确地回避学生，所以，我和他们之间只有最起码的一点点接触。虽然此时，我的监禁生活中已经不再有枷锁、手铐和囚室，可是我还是犯人，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中。我整天以工作度日，和一小组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职工一起，做设计、建造和管理农场的基础设施。理论上，我就像同事们一样，是普通工人。可实际上，我还是那个在服着原来刑期的囚犯，只是缺少了一个犯人的称呼罢了。

一年之后，大多数学生都离开了，农场也因此需要补充工人，被迁往北边的囚犯们没有都被带回来，许多囚犯在他们被“释放”时不让回去，被强迫申请留场以保持劳力。于是，就有许多平民工人被送进海伦农场。

1964年的一天，我被叫到场部办公室。一个干部通知我说，我的刑期满了，从那天起，我不再被算作是一个罪犯。在海伦还是个劳改农场的时候，犯人刑满由罪犯转为公民的时候，总是有一些精心策划的仪式。没有给我举办仪式的原因是农场不再是一个“劳改农场”了，而我是唯一留下的犯人。所以没有盛况和仪式，我离开那干部时，就算是一个“新人”了。

在服刑期满的时候，按照给犯人规定的惯例，我被命令写一个报告，汇报我在劳改体制下的这段岁月中，如何受到正面教育而被改造好了。我的报告写了有十页那么长。我写道，我在劳改的这些年月里，深刻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感谢共产党重新教育了我，改造了我的思想。我保证努力工作，建设新中国。我也

陈述了自己在劳改体制下的特殊状态。我是一个有经验的工程师，这使我和大多数犯人分别开来。我写道，通过把我带到黑龙江，共产党给了我一个机会，使我的技术有了好的用途。在劳改制度的支持下，在共产党的指引下，我才有可能为建设新中国作出有用的贡献。所有这一切证明了共产党是永远英明的。当然，这些说法总的来说是扭曲了事实。可另一方面，不管怎么说，我也确实为自己在海伦劳改农场期间能作出贡献感到骄傲。

我“释放”之后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自从1961年其他犯人离开、学生来到之后，我就有了非官方认可的普通工人身份。虽然现在这个身份被官方认定了，可是这并不影响干部和其他工人对我的态度。当然，更没有谁提起让我回云南的家。我留在农场，继续往常的工作。只有一件事有些不同，就是我平时的囚犯工资由于津贴而被提高了。

刚来海伦劳改农场的时候，我的工资被定为每月23元。根据监狱条例，我的工资是同水平的普通工程师工资（230元）的十分之一。可是，监狱还以支付我的食物和监房费用为由，从中扣除十元。这样我还留有十来元钱，而一般犯人几乎一点钱都没有。所以，虽然我是囚犯，我还能存下一点钱，给我在云南的母亲寄去。我在中国的东北做囚犯的将近三十年里，在三次不同的时机，我给家里寄过一百元。在那个时候，算是不小的一笔钱了。

虽然在外面我被认定是一级、也就是最高一级的技术员，在“释放”之后，我被留场，继续在农场工作，却被定为十级技术员，是级别中的最低一级。在中国的级别制度中，工程师高于技术员。工程师共有九级，一个一级技术员，等同于九级工程师。我做着最高技术员级别的工作，可是还停留在最低级别的收入水平。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劳改释放犯”，我拿着89元的月薪，这工资对于一个普通职工来说，都算是运气的了，遑论我这样一

个被“定罪”的人。

在 1964 年被释放的时候，我在海伦农场还是远远领先的最好的工程师。所以，和先前一样，我还是被要求做各种技术项目。我还被派到农场之外，在海伦县筑路和修路。与那悲惨的大跃进年月相比，海伦农场在六十年代初期，相对来说，还是成长和发展得比较强盛的。

1966 年起中国的大地上刮起了所谓“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风暴。毛利用这个运动作为舞台，攻击共产党内的、被他认为的敌人。他宣称他贡献毕生建立的党，已经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篡夺了，如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书记邓小平。当青年学生开始形成“红卫兵”组织，响应毛的号召，重新革命的时候，事态发展很快走向了极端暴力。流荡的一帮红卫兵，把任何有可能定为是“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旧习惯）的人或物，都作为攻击目标。竞争的红卫兵派别陷入暴力，经常武装争夺权力。在中国的一些地区，对立的派别，有的夺取人民解放军的枪支，有的则由军队提供枪支，相互对打。文革最混乱和暴力达到顶峰的时期，是从 1966 年到 1969 年。当文革冲击到海伦农场，我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靶子。作为一个前国民党党员、一名知识分子，以及一个前云南军阀的儿子，我很容易地就被指控为旧的封建社会的残渣余孽。

1966 年，树立共产党河南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为无私奉献好榜样的一场宣传运动正在展开。海伦农场的干部们召集了一个会议，学习和讨论我们将如何学习这个模范干部的精神。对我们宣传了这样的事迹，讲述这个无私干部如何不顾巨大的个人危险，

在猛烈的暴风雨中，检查计划中的灌溉工程。可是，这事迹对我来说很没意思。他干吗要在暴风雨中出去测量？他完全可以在任何一份普通的该地区地形测量图上，得到更为精确的结果。当我试图讲述这个与灌溉工程有关的技术问题时，干部们变得非常愤怒。他们说我是在运用科学知识向党进攻。他们在谈论精神和奉献，而我却还在科学的圣坛前顶礼膜拜。

不懂得保持沉默，使我支付了昂贵代价。此后的两个星期里，我每天都成为下班后的两小时“斗争会”的对象。在农场干部和群众猛烈批判我的时候，我和另外两个有类似错误的人一起，被迫跪在大幅毛泽东像的面前。“你不敬重共产党！”“你是反革命分子！”“你是死不悔改的犯罪分子！”辱骂伴随着不受限制的殴打向我袭来，他们多半是用紧握的拳头打我的头和身体的其他部位。我没有被严重打伤过，可是，精神和身体上的折磨，无疑使得我原来就变弱的身体，变得更糟了。我整天在办公室工作，吃点晚饭，整个傍晚挨斗，然后上床睡觉，早上醒来，再重复同样的白日恶梦。两个星期之后，我们被告知要写一份自我批判、承认错误，并且感激党帮助我们改造的检讨书。我被迫在斗争会上，在聚集的人群面前，大声地念出检讨。只有当群众认为我已经充分认识了自己的罪行，斗争会才最终叫停，我的生活才恢复正常。

那年的后面几个月，有个姓刘的小队干部特别喜欢找我的麻烦。有一天，他指着墙上挂着的大幅毛像问：“这毛主席的像挂歪了吧？”当然，我别无选择地只好同意是挂歪了，虽然我们都知道那张像没挂歪。他命令我去把毛像挂正。我一点也不想参与任何与毛像有关的事情，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选择余地。那干部拿来一把过短的、摇摇晃晃的梯子给我，只为要满足自己的暗算。我爬上梯子的最高一级，梯子就散架了，把我和那张毛像都摔在地上。镜框摔破了，保护毛尊容的那片镜框玻璃在地上碎

成了上千块。我被指控对伟大的毛主席不敬，在文革高潮中，那是极为严重的罪名。于是，他们安排了另一套和上次类似的斗争会。我必须白天上班，在傍晚去充当斗争对象，参加持续两小时精神和肉体折磨的斗争会。我还是得到食物、还能够睡觉，以保证我第二天还能够工作。就像上一次那样，十天后，我被迫写了一张自我检查，在斗争会上当众大声念了一遍。群众认为，我已经适当地认识了自己的罪行，斗争会才终止了。

1968年初，海伦农场有四、五个已经组织了红卫兵组织的年轻人叫我去谈话。他们想知道我是否能够读懂乐谱，我是否知道怎么教唱歌。我不知道他们的意图，不想惹更多麻烦，就说我没有受过音乐训练，也不会唱歌。这不是他们要的回答。他们围成一圈开始打我。他们打得非常厉害，我无法让自己直起来躲避他们的殴打。打了一阵之后，他们累了，我躺倒在地上。其中一个勒令我在一个星期之内学会教唱歌。一个星期之后，我必须去教一些海伦农场的工人怎么唱“造反有理”，那是很流行的文革宣传歌曲，这歌是根据一段著名的毛泽东语录编写的。在一个星期后，我去教唱这支歌，以避免再次挨打。歌词是这样的：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

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

造反有理！

造反有理！

根据这句话，

我们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巫士黄湛

在那个时代，社会的每个层面和部分，都被卷入文革的暴力。

先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继而大打出手、打砸抢、大武斗、大混战。劳改农场曾经意味着可以避开文革的暴力和混乱。海伦农场从1961年开始，已经不再是一个劳改农场了，可是它还是归属黑龙江公安部司法局领导，因此，红卫兵在全国其他地方的党政机关打砸抢，却被严禁闯进我们的单位“干革命”。不许红卫兵冲击，内部不搞四大，正面教育。但是，随着文革发展，暴力变得难以控制，公安人员和军队也被卷入。最后，在全国蔓延的暴力中，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

在海伦农场，由大多数的党政干部组成的所谓“造反派”成立了。他们开始攻击被他们认定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人，原农场场长杨彦、书记钱德福……等等，均被揪出来，关入牛棚，时时开大会批斗，被戴高帽子，挂黑牌，游街示众。而我是劳改释放分子，是“死老虎”，被贴上农场走资派领导的“反革命走狗”的标签，还是反动技术“权威”，每场必陪斗。“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罚跪”是家常便饭。举行“斗争会”的时候，我和其他“反动技术专家”，都受到辱骂和殴打。我工作的规划办公室被指控为“反革命黑窝”而解散了。我下到基建队去拉大锯解木板。

在文革中，我这样的技术专家非常容易成为目标。“无产阶级”进来，“专家”出去。一个姓韩的年轻人把我下放到农村去。他是我的徒弟，我把他从一个当地的高中毕业生，教会成了一个能测量和搞简单设计的技术员。乘着斗走资派的机会，他当上了小头目。就是这个我手把手教他工程技术的同事，先出来给了我最着实的打击。他向农场领导证实我是反革命之后，就可以取代我的位置了。韩被称作“红色技术权威”，而我却被批判。最后，我被“下放”了，去农村劳动。这是我最终离开海伦农场的经过，尽管我在中国的放逐还远没有结束。

韩用了一种很有创造性的方式来攻击我。故事开始在一个晚上，我必须去上厕所，当我离开的时候，和我同铺睡的、来自黑龙江已经服完五年刑期的留队人员，正在呼呼入睡。在1940年代，他杀了一个对他父亲的死负有责任的人，然后逃往北方，越过边境，进入了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二十多年之后，当中苏关系在1960年代变得紧张，他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在这段时间里，他杀死的那个地主的儿子长大了，而且是县政府里一个重要的干部。当这个干部知道杀死自己父亲的人已经回来了，就找了个借口把他给逮捕起来，送进了监狱。在1968年，我这个同铺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

那天晚上我起来上厕所，我记得他鼾声如雷。厕所在室外，离房子很远。晚上去厕所，你得带上一根小棍，室外没有灯，地面总是坑坑洼洼的，所以，小棍就可以引着你安全地来去。在那天晚上，我还发现小棍另有一个用途。那是一个开敞的毛坑，我蹲在地面的洞口如厕，一堆“鬼火”开始在我周围飘荡。鬼火是一种磷，在人移动的时候会散开，静止下来，它又会回来。我蹲坑的时候，就舞动那根棍子驱赶鬼火。回到屋子的时候，我告诉守夜人，我那晚和鬼火相遇的小小冒险故事。在我回到床前的时候，我的同铺不再打鼾。我上前去看他，他已经去世了。

一周后，这个姓韩的徒弟开始把矛头指向我。听了鬼火的故事，他到农场领导那里指责我在宣传迷信。他告诉干部，我在利用同铺的死亡事件，骗取信誉，说什么通过舞动小棍，我可以移动鬼火，勾魂杀人。共产党是坚决反对一切迷信的，因此，这样的谈论可以构成严重罪行。韩还向干部们汇报，说他自己可以轻易承担所有我负责的技术工作，因此，海伦农场不再需要我。这个指控给农场领导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借口，把我踢开，他就是“红色技术权威”了，于是乎我就被下放农村，交由贫下中农管制。

第 五 篇

下放农村十年——怪诞五部曲

下放成了无期徒刑

我所下放的大队叫赵家，就在铁路旁。原来他们说好了，要一个铁匠。哪知原定去的那个人才卅多岁，是基建队的铁匠，绥化人，也是劳释分子。68年夏天，他雨夜回家，划破了脚，开始有点红肿，还来上班的。到第五天突发高热、抽风，第七天一命呜呼。于是我就顶替去了赵家大队。无人敢理睬，无人敢让我住，我只好住在小队部。大队长一看铁匠没要到，来了个不会农活的五十多岁老头，实在窝火。于是一连串好戏就等着我了。

从68年底到79年初整整十年。我是以大小队干部管制下的“四类分子”的身份过来的。在物质生活极端贫困的状况下，要保证长达八、九个月的冬季取暖问题，要干义务工，要送礼给干部，以免受没完没了的非人折磨。还要干最重的体力劳动，忍受没有期待、没有追求、没有理解、没有同情，以及无穷无尽的寂寞。被判徒刑还有期，还期望着刑满，回万里迢迢的家。而现在下放却是无期徒刑啊！这十年中，我曾无数次望着那向南的两根铁轨，它可以把我带回南国，带回故乡。但是有家不能回呀！唯一的安慰是妻子的信，从信中知道老母过世。从信中知道妻子儿女的“安康”。我知道字里行间有多少难言之隐。

我生产队墓葬均在南地头小溪土坡上，西邻铁路六孔桥（当地为水田），时贫病交加，兴许我也将长眠于此！有几次在残酷的折磨下，我以为自己再也站不起来了，在绝望中写下了“埋骨赋”。

埋 骨 赋

1970年1月

埋骨铁道旁， 时常听车响。

魂归离恨天，
长辞赵家站，
横越万里外，
滇山其苍苍，
深秋清气爽，
拜尊筑竹寺¹，
故旧来相看，
埋骨铁道旁，
春迎播种粮，
夏看铲耨忙，
秋收人归后，
冬至五尺冻，
儿童戏相问，

埋骨铁道旁，
前临水一弯，
清明齐扫墓，
重阳送寒裳，
儿女整食具，
我独无人望，

魄随南车返。
永别北大荒。
身漂千重关。
滇水何茫茫。
到处桂花香。
省娘金马山²。
儿孙何满堂。
东邻垅成行。
碧草铺银霜。
浇晒苦难当。
野草没胸膛。
飞雪盖严寒。
何塚是老黄。

水洞在南方。
后倚漫土岗。
纸花常作伴。
件件欲断肠。
老伴哭道旁。
孤塚向太阳。

¹ 父亲骨灰存处

² 母亲葬处

埋骨铁道旁，	列车过四方。
朝迎货如山，	暮送千客还。
人皆有家归，	我独泪两行。
盼亲亲不见，	郁郁心悲酸。
越鸟巢南枝，	胡马嘶此疆。
明月伴孤魂，	幽幽情何伤。
过客笑相问，	何来乱葬岗。
不如作肥料，	倾刻都焚光。

文革期间的劫难

在滴水成冰的 68 年 12 月初，公社召集全体四类分子学习。上午 9 点，五十多个“四类”都来了。天气很冷，一般室外是零下 30 多度。当地人都习惯戴两项帽子。在棉帽下面加一项软布帽。公社公安员喊“起立”“脱帽”“低头向毛主席认罪”。我慌忙间只把棉帽抓下，赶快低头，才感到头上还有一项布帽没拿下来，连忙换左手拿棉帽，右手去摘布帽。唉！为时晚矣！已被公安员发现。他大声喊：“出来！走到前面。”而他自己却戴着皮帽穿着棉军大衣。

“你就是新来的，姓黄的吧！你不要认为是从大地方来的，（指农场）就可以不遵守规矩。”

我小声说：“不敢，不敢！”

“现在帽子还在你头上，还说什么？”

“我错了，我对毛主席不敬，我有罪。我不是故意的，慌忙之间只抓下了一项，请公安员宽恕。”

他叫另一个四类分子：“去把认罪牌拿来。”

一会拿来了，是一块厚一公分，30×20 公分的铁牌子，上面

写着八个大字“坦白交待，认罪伏法”。罚我站在毛主席像前，弯腰九十度。他嫌我弯度不够，还用力按了两下。然后叫人把牌子挂在我的脖根上。起初，我并不感到怎么重，估计也就两公斤多吧！只是铁丝太细，扎得颈子痛。

他即以“坦白交待，认罪伏法”为题训了一顿。接着他说：“你们三大队和七大类的四类，自己坦白，给你们十分钟考虑、检举，过了时间，我要重罚。”

三分钟过去了。

“报告公安”站在角落里的一个老头坦白说：“我和小队长吵过架。小队长无中生有地指斥我偷懒，还乱骂我，我就分辨了几句。还说嘴巴不好乱骂人。我有罪。”他赶紧到前面来弯腰几乎到地。

十分钟过去了，还没有第二个人坦白。

公安员大声吼道：“姓吴的站出来！”他指着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你偷队上的包谷种子。”

姓吴的说：“我没有偷过。”

“有人检举，人证、物证俱在，还想抵赖。”拿出一包种子。又问：“小队长，是不是你们仓里的。”

小队长应声答道：“是，我们仓里的。”

“你们这些四类分子、阶级敌人，不规矩伏法，要翻天啦！对你们绝不能手软。”“上来！你们两个人互相帮助帮助。”

我偏头看看怎么帮助法。

“打呀！”公安员把前一个坦白的老头和姓吴的揪了过去，对面站着。“互相打嘴巴，脸打不肿不算。”他手提一棍子，亲自监督。打得不力的就给他几棍子。“啪……”十分钟后，两人鼻青脸肿，小队长求情才算完，并叫他们二人写检查交到大队。

“你们大家看到没有，该不该罚。”

“该罚！该打！”

“你们大家谈感想。说！快说！”

于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12点散会。此时我颈部疼痛难当，腰、腿都麻木了，以为可以获释了，殊不知公安员说：“为了加深你的认识，更好地帮助你记得，再支持一会吧！”扬长而去。值班民兵不时进来看看。屋子里没生火，少说也有零下20度。头冷，脚冻，耳朵像要掉下来，腰麻木了，脖子上挂铁牌的铁丝扣进肉里，疼痛之极。我忽然想起《水浒》上说到，牢城营里的配军，如不送差拨红包，就要挨一百杀威棒。现在文明了，共产党讲政策了，“杀威棒”改为帮助记忆的“杀威站”。公安大人口口声声说：“不要以为是从大地方来的。”不就是那个意思吗？

那天可惨了，没人时我只好把头抵在墙上，双手捂住耳朵。颈部实在痛得不得了，用双手把铁牌托起，那知铁丝勒进皮肉，一托更疼痛难忍，鲜血直滴在地上，马上冻成血冰。下午三四点钟，公安大人来了，看见我脸色青紫，靠头顶在墙上撑着才没有倒下来，地上已滴满了一滩血冰，才叫民兵把牌子拿掉。从此腰颈部脊椎带上残疾，廿多年来，时时作痛。

他们喝令我“滚回去！”回到所住的小队部，隔壁磨豆腐的老黄头，帮我医伤。幸好存有家乡寄来的云南白药，自疗伤痛。这就是自以为已经刑满释放多年，以农场工人之名下放农村的第一关。

“高帽子”，顾名思义，高高的帽子也。当年批斗走资派、四类分子和九种人时的高帽子，花样繁多，有用竹子扎的，糊以各色纸张，做成一个尖的圆锥形。也有用铁丝绑扎而成的，更有高

大者用钢筋焊制。那时，从手摇“红宝书”到呼“万岁万万岁”；从呼“忠于伟大领袖”到跳“忠”字舞；从一块块红语录牌到全国的红海洋；从一个个钮扣大小的主席像章到茶杯口大、碗口大、面盆大的特大像章；由别在衣服进而别在胸膛的皮肉里……。那耿耿忠心真是一言难尽。

1968年12月下旬。为了过新年，照例大队要把本队的四类分子集中学习，互相帮助、训话、宣布新年纪律等等。大队长碰见我们小队的的一个民兵，要他通知我下午两点准时到大队集会，但他上街忘了告诉我。2点刚过，大队长喊人来找我，我不敢稍停立即赶到。

“你好大狗胆，敢违抗命令，还要我派人再三去请，你不要以为是大地方来的，我不敢整你，先向毛主席请罪。”我立即脱帽弯腰90度，自己编些罪名请罪。旁边早有7个四类分子，已立正站好，大队长把嘴一努：“大家帮助帮助他！”大伙一拥而上，我还没反应过来，忽然阵阵的剧痛，拳头劈头盖脸打来。他们又把我踢翻在地，直到鼻青脸肿。我抱着肚子，挨众人踢过来踹过去，呼叫不已。“我有罪，下次不敢了，再不敢了！”才把我扶起来站到末尾。大家互相坦白检举这个月的错误，自我批评。晚上8点干部回来，宣布新年纪律：

“不准乱说乱动，外出要向队长报告，不准……。元月2号参加庆祝游行。”

9点钟出来，他们都向我道歉。

“我们是故意打头脸，造成伤重的现象，要害部位像腰、心口、肚子，都没有动手动脚。”

“我感觉到的，实在十分感谢。”

“你初来乍到，不知我们的苦处，除了我们这些相同命运的人，谁能知道这个罪要受到什么时候呀！”

“元月2日，他们庆祝游行，要我们干啥呀！”

“没有好事！”说完各自走了。

元月2号早上，我提早去了大队。看见还有六大队的6个四类也赶来了，大队干部说：“今天庆祝大会，没有你们的份，你们在学校老师的指导下化妆，还要表演两个小节目，违者严惩不贷。今天的盛会名称是“庆祝丰收，嘉奖贫农，镇压四类。”说完队干部都往公社礼堂开会去了。一会儿老师来了，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是“真镇压，假枪毙！”

化妆开始，我们一共14个人，其中反革命9人，其余是地、富、坏分子。他们从一间屋里取出道具，有最大的高帽子一顶，稍小的二顶，还有奇奇怪怪的帽子许多，以及麻绳、破麻袋等。据说我的官大，名列榜首，戴最高的帽子，高约2米，其余两帽一至一点五米。他们先叫我把皮袄脱下，反穿，披上破麻袋，卡上高帽子。太高了不稳当，于是从顶上系上三根铁丝，各成120°，三个人分别拉着。麻绳绑在手臂，手拿哭丧棒，脸上涂白，鼻子涂黑，背上插上“招子”，写着“枪毙反革命分子黄湛”。第二名、第三名照办，第四名以下不要哭丧棒，改为五花大绑，戴怪帽子。有两人拿绳子牵着，手执细条子，不时抽打。那些坏分子只戴怪帽子，捆着手臂，两人牵着。收拾停当，叫到东头等候。

不多会，开会的回来了。前面乐队开道，锣鼓齐鸣，紧接着是两人抬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标语牌，跟着披红戴花的干部受奖队伍。持枪的民兵队伍过后，是一百人的腰鼓队。又有两人举着“贫下中农万岁！”的红布标。获奖的贫下中农胸前挂着大红花，男的帽子上插着红花，女的头发上插着五色花朵，后面紧跟着一大群贫下中农，个个喜气洋洋的，眉飞色舞，在街上转了一个大弯。隔着一段距离，一小队破锣、鼓、破盆乱敲乱打，刺耳的噪声过后，两个人举着打倒反革命分子的横标，横标

后第一个就是我，被七个人押送着。三个拉高帽的铁丝绳子，维持帽子的平衡。他们不时加压，使我抬不起头。左右有“卫士”各一人，手持细条子，牵着绳子。要我走快，背后就被抽打；我要走慢，前胸就被抽打；要我往左，他们牵动左边绳子，往右牵动右边绳子。后面两个持枪大军，刺刀雪亮，押解前进。第二名是伪满洲国营长，年纪已大，但待遇并不比我好。第三名是伪满洲国县里的什么局长，待遇稍好。其他六人每人只有三个押送的。坏分子每人只有两个押送，自己本人还要喊着打倒自己的口号。

游行队伍由东到西，长约两公里，然后回转到最热闹的十字街口，队伍散了，改为自由围观。节目开始了。第一场为镇压反革命。他们先把我拉到路中间，拉帽子铁丝的三个一齐用力往下坠，我只觉得脖子咔嚓一声，立刻被压倒在地上，两个人跑去把预先准备好的门板抬过来，往我身上一压，两个人坐在上面，许多人立即一窝蜂的把砖块、石块，搬来压在我身上的门板上。我匍匐在地，动弹不得，手又被绑不能使力，顿时呼吸困难，眼冒金花。第二、三名也同时被压倒，其他小反革命、坏分子被牵着绳子，在地上学狗爬，学狗叫。小学生把土块往他们身上扔，一阵阵欢笑，一阵阵掌声，全剧达到高潮。我拼命抗拒这巨大的压力，无奈呼吸更急。此时，我只有一个念头“挺住！挺住！”幸好学生们把砖头搬掉，门板抬走。第二名已昏过去，两人把他拖到医院。“执行枪决”开始了，我们八个人按序跪在马路上，16名民兵举枪对着我们，口号声、叫喊声、骂声，此起彼伏，忽然一阵鞭炮声大响，民兵过来把我们一一踢倒，就算枪毙了。坏分子们被押着跪在旁边。慢慢地，人们陆续散去，回家做晚饭。我们还匍倒在地上不准动。一个家属扑在老头子身上大声嚎啕：“啊呀！怎么真死了呢？”她一边抹着老头额上的血，一面把他翻过来。“我是死了，不能睁眼，你嚎些啥。”他小声咕嘟着。

民兵过来：“走开！走开！不准讲话。”

一小时后，日落西山，大队干部告诉民兵：“喊他们滚了。”

我养息了一小时渐渐复原了，多亏年轻时候爱好体育，又跟着父亲练过日本的柔道，才得以挺过来，只是颈部疼痛不止。往回走时，队上那个打更的老黄头赶来扶我，又在坏分子老李家吃了碗面条，才回“家”。那也算家吗？队上的空仓库有一面火墙，两张炕，晚上我和老黄头就睡在那里，这儿同时也是小队干部开会的地方。

事隔廿多年了，下雨阴天我的颈椎骨总隐隐作痛，这是世界上最高最重的帽子的功劳。

在劳改农场时，每个人的身份是分得很严格的。场长杨彦就是因为“要拿耗子，得用猫”而用了我这个黑猫，文革中他被批判为“丧失立场，敌我不分”，被斗得很惨。

在农场第一等人是“干部”，住套房，吃小灶、中灶。第二等人是国家正式职工，有家属宿舍、单身宿舍、大伙食堂。第三等人是劳释分子，不论预备工人、试用工人或工人，都得住在铁丝网内的大宿舍。也有因为表现好带家属的，备有两家合用一间屋，两铺炕的优待，吃都是另一个大伙食堂。第四等人是劳改犯，住有专门大院，有岗哨，持枪武警日夜监视。

下放到农村时，我想想也好，总不致于等级如此森严吧。其实在农村如我这样身份的，简直是过街老鼠，人人得而打之。

那天，农场的汽车把我的东西卸下，保卫科干部把我交给队长。我除了一包铺盖卷，冬衣全部在身上，手提包里有换洗衣服。另外，我还有一个木箱子。队长指着箱子问：“那是什么？打开！”

“一箱子书！”我赶紧执行命令。

“哼！知识越多越反动。”他指着队部靠北墙的坑。“你就睡那里！这边的桌子不准动。”

“是！是。”这个队部三天两头晚上都开会。外面滴水成冰，里面人多，空气很坏。夜阑人散后，静得出奇。只有打更的老黄头，跟我同姓的六十多岁孤寡老头，不时回来暖和一阵子。

隔几天碰上一次不准四类分子听的学习，队长说：“这会不准你听，你爱上哪儿上哪去，十点以后才准回来。”别人家我不熟，人家更不敢随便搭理，怕被扣上帽子。一个人出门，但见四野寂静，月光映雪。零下30多度，怎么能耐到十点？不禁伤感：

茫茫苍野雪映光，月里风高刺骨寒。

孤魂野鬼飘无处，更比农场倍荒唐。

忽听远处火车汽笛鸣，想必车站有暖房，于是直奔车站。果然发现新大陆，有一趟开往齐齐哈尔的客车10点半到，不足30平米的候车室中央有个敞口的大火炉。搭车人两、三个，取暖人七、八个，真如登天堂。9点多钟，虽已不再添煤，但余热不散，到车进站，正好回队睡觉。蹲了四、五回车站，秘密被识破，干部认为不能让这个“老反革命”太便宜了。于是，他们变了招数，正好队上豆腐房做豆腐的病倒了，就叫我顶替。

磨豆浆、推石磨、熬煮黄豆、点豆腐……，我向做豆腐的能手，打更的老黄头一一请教后，就上任了。一了解才知道，原来的豆腐官，是推病不干的。因为夏天时，靠我们田头，有一块坟地划拨给我队，要我们把它挖了，拖拉机才开得成。棺材板大部分都拉回来了，堆在场院的田头。队长要他用棺材板烧豆浆，一股死尸臭夹着松木香的怪味从烟囱四面散发，使人作呕。室内也

不可避免地散发着怪臭味，做出来的豆腐卖不掉。他熬臭味不过，推病不干了。队长还要我用棺材板烧。我把原来卖不掉的豆腐请他闻：“怎么样，不行吧！”他回说：“你通了烟囱，就没有臭味了。”

我用一下午通好了烟道。晚上磨完豆子，劈好棺材板烧起来，仍然臭不可挡。老黄头本想来指导，实在耐不住，被臭跑了。我用酒泡过口罩，戴上稍好一点。早上来买豆腐的群众，一闻豆腐，不住地骂，没有人买。队长来了，我请他闻，他说我烟道没通好，头也不回地走了。我横下心来，不执行他的指示，买一斤酒来透洗用具，晚上用煤烧豆浆，次日有少数几人来买豆腐，闻过以后欣然拿走。不一会传开了，买的人很多，三板豆腐全卖光了。如是者几天，他知道后气势汹汹地来质问：“好啊！你胆大包天，敢不服从指示。”

“照你说的做，豆腐里有毒，社员吃了要发病的。”

此事被大队所知，大队干部把他找去，批评他说：“吃的东西，不能叫四类去干，当心他借机放毒。”

于是他们免去我当豆腐官的职务。这半个月的豆腐官，由于有老黄头的指教，黄豆选过，老嫩适度，博得大家的好评，大家说：“他不会放毒的。”队长无奈，只好推给大队。

后来，我又改为“喂夜马”，白天随大家出工干活，晚上我还是蹲车站烤火，提早回来喂马。不久有一匹老马死了，队干部们大吃马肉，还送给大队上，这下又让大队干部知道我喂马，于是又被革职。他们还批评队长“没有敌情观念，丧失警惕，怎么能四类分子喂马”。

最后换的职务是，除白天全劳动力干活外，他们开会，我打扫场院。这下把我整倒了，两小时的苦力活，累得我腰酸背疼，四肢发软。

春节过后，队上有叫王大老黑的孤老头死了，他欠队上 150

元钱，有茅草屋两间，破烂不堪，大家嫌贵不肯要。于是我就用在农场所得工资的最后积蓄买下此屋。费了许多工夫，和泥涂墙上顶，收拾得也能住人。外间约六平方米，有水缸，锅灶台，一个破桌子，外面大风雪，此间约 0-5°。里间也同样大小，一铺炕，还有一个小玻璃窗。生好火后，炕热，墙热，温度可达 20℃。我从此有了一个“家”。

天打雷劈遭报应

下放十年自骂过四次，第一次是在一场惊心动魄的雷击之后。大队规定要在上、下午位于该镇最热闹的十字路口，手持铜锣，用力敲打几分钟，待围观的人来多后，开始“自我批评”各十次。最初很不好意思，后来习以为常，反觉有趣了。所谓“自我批评”，就是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自己，骂得越厉害，就越算觉悟好，实事求是地说，反而是死不悔改，这也是那些年的怪现象之一。

我所在的生产队，队长是文革后新提拔起来的，阶级斗争观念强，左调唱得高。铁匠没要到，来了个书生老儿。他的一帮“苦大深仇”的哥儿们是很不满意的。在他的指使下，“打头人”即生产小组的组长，是他表弟，就处处整我，在农场称为“穿小鞋”。除做技术活，比如扶犁拉垅、点种、扬叉，还做消耗体力最大的上、下粪等等重活，要我顶强劳力干。他还经常出口乱骂，动手就打。我从小任何事都不甘人后，半年后一切农活我都干得麻利，他还不肯放过我。我宁可少休息，也要搞好质量，落在后面常被当众大骂。有一天铲地时我那条垅草少，我加快速度赶到他前面。他大怒，一甩锄头，冲到我面前，挥着拳头劈头打来。我实在忍无可忍，略施了一点父亲教给我的“柔道”，摔了他一个跟斗。后来大家把他拉开了。晚上队长扣了我全天工分，还报告大队说：

“四类分子无法无天，居然敢出手打组长。”这位组长凭着是队长的亲戚，平常吆五喝六，捧上欺下，不是骂这人，就是扣那人的工分，连贫下中农都对他不满。

偏巧第三天下午铲地，他一个人冲在最前面，我落后五六十米，跟我一起的还有两个中学毕业生。3点左右，天气闷热，北面隐隐有雷声，我们附近都没有下雨，突然一声巨响，一道闪光，从云端打到前面地上，离组长只偏了几十厘米。声响过后，前面倒了十多个人。两个学生吓呆了，我说：“快，先救稍远的。”我们跑过去，晕倒的赶快掐人中穴，进行人工呼吸。距中心近一些的全被击昏，我用刮锄头的小铲刀的尖刺他们脚底上的涌泉穴，都被救醒了，最后我跑去看组长，两只脚被电击，血肉烧干见白骨，眼睛大睁，瞳孔已散大，有人问：“还有救吗？”我说了一声：“活该！天报应！”刚好被赶来的队长听见。

“晚上，我跟你算帐。”叫人把尸体抬走了。

“唉！快找雷楔啊！”我被“雷楔”这新鲜事吸引了，跟着他们一齐在雷击区的地上慢慢挖，把松土刨开，看见有一处土呈紫色，顺着挖下去，像树根一样，逐渐分成许多岔枝，展开变细，在地下接近两米处消失了。黑土烧成紫色的瓷。大家小心翼翼地抬雷楔回去，倒竖在队部，真像一只紫色的美丽的大珊瑚。

晚上，队部挤满了人，大队、公社的干部都来看“雷楔”，还有就是来“帮助”我。首先队长把我臭骂一顿：

“四类分子，老反革命黄湛，前天胆敢破坏生产，不服管教，今天又约同别人见死不救。黄湛对共产党和贫下中农怀有刻骨仇恨。”

我也据理驳斥，指着雷楔说：“电击情况，它是最好的证明，几十万伏高压电，击中人身，看看他那两条腿，还能抢救吗？土都烧成了瓷，扩散如树根样，说明离得越远的，受电击越轻，是

可以救的，时间就是生命。事实证明，除组长当场被雷打死，其余人都救活了，我的措施是对的，不存在仇视共产党和贫下中农的情况。”

“行了！行了！不许你说，四类分子只有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管教，还要强辩，是极坏的，罚你当众检讨两天。”

第二天早上，我被民兵押到十字街口，先写好一张提纲，命我记熟，还必须加深“认识”。先敲锣，待围观的群众多起来时，念道：“我叫黄湛，是判处15年徒刑的老反革命，我仇恨共产党。”小孩子用土块打，围观的人，有的吐口水，有的大骂我反动透顶。有的说：“他是蒋介石的干儿子。”开初我很气愤，在天灾面前奋力救人，不表扬不记功，反而有罪，受此羞辱，公理何在？后来想通了：大家都在做戏，不过角色不同而已，于是处之泰然。到了下午，我骂出经验来了。你们不是要我加深认识吗？我就先指名骂自己一通后，就指冬瓜骂葫芦，指桑骂槐，凡是老百姓讨厌的事，我通通骂在自己头上，慷慨激昂，越骂越高兴。一个老头子听了一会偷偷地问我：“你在骂谁呀？”

“当然是骂我自己呀！”

他微微一笑转身走了。

下放农村后，干着重体力劳动，好不容易熬到了1972年。严冬过去，4、5月间，冰雪消融，批斗四类分子的热潮似乎降温了，老百姓也习以为常，或许厌倦了。我把妻子、儿女省吃俭用寄来的包裹、云南的好香烟，孝敬了队长、公社公安员，于是乎批准我返乡探亲。我4月间回到昆明时，已春末夏初。

妻子55岁了，每天要转两次公共汽车，再走二里地去“向阳

服装厂”上班。她廿多年一直做缝纫工，先是自己开个小店，1956年合作化高潮，并为缝纫社，后改为服装厂。她住在翠湖与园通山之间大兴街边一间16平方米小平房里，孩子们都长大成家，各住各的单位宿舍。

除了大女儿读到高中毕业，因政治审查不合格（直系亲属有关、管、杀的），没被大学录取外，其它两儿两女，只是受过小学和初中教育，很小就当童工，在艰难中长大。那时我已是七个孙儿女和外孙儿女的祖父了。

我回家的旅费是把两、三年年终分红的钱和劳动工分分得的余粮售出后，才凑足的。除万里迢迢带十几斤豆油外，我还能捎什么东西回家呢？老妻每月工资43元，孩子们也都是每月工资37.8元或45.6元，还要养儿育女。他们只有在休假日，能带上孙儿女们回家吃上顿简单的团圆饭。

我回家的次日就去派出所，凭公社准假证明报了临时户口。两月的假期未到，派出所的警察就登门催促我“快走！”

大兴街是省府要人、汽车进出重要街道，哪能容得劳释分子久待。万分无奈，又由儿女们凑了钱，踏上了北去的旅途。临行前老妻赶缝了一套新棉袄裤，并千句珍重，万句珍重！连知识分子都打成了“臭老九”，我这个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反革命”就更不能指望有什么好待遇了。有家不能回，即便回了也不能久待。人生之苦何日方尽。

56岁的我已是两眼昏花，只有戴着深度老花眼镜，才能勉强看书，自理生活。这是廿多年（从54年至68年）的超负荷造劳作造成的。在北大荒初建农场群时，野外勘测，在昏暗的油灯下，用极细的笔，一划划一笔笔地填图、绘制。只要出一点差错，掉脑袋的下场就等着我。长期的压抑和营养不良，加上这两年过重体力劳动，令我未老先衰，身体极度孱弱。

过北京时特意去拜访一下几位世交，想请教一下，能否写信，要求转回昆明。他们默然良久，似有许多话不能开口。原想在北医附一医院认真检查一下眼睛，与一世交之女约好，次日她失约，显然不愿安排我就医。我感悟到了自己的身份和处境使他们害怕了。谁都怕沾着我这样的“反革命”。受牵连被迫害的残酷，是十年后我才知道的。1972年的中国真是走到了黑暗的谷底，悲惨的日子何日才能了结？

匆匆回到北大荒我那间低矮的小茅屋里，等着我的是白内障恶化和双目失明的痛境。

我们公社五、六两个大队，有14个人患白内障，两个已瞎多年。四分之三的是四类分子或其家属，可见精神上受压抑关系极大。患病初期只觉眼前模糊，渐往中心发展，到眼神散阶段，看任何物体都会看到两、三个重影，接着出现幻觉，常常使人毛骨悚然。夜深人静时不论闭眼或睁眼，总看见一个或几个无头的人影，站在身旁，一转眼间又会变成没有下肢，头脸模糊的人影。还有的作出各种索取，打杀的姿式，可怕至极。我曾多次自问，生平光明磊落，从未做过亏心事，难道真是前世冤孽找上门来？莫非我阳寿将尽？日不思饮食，夜不能成眠，遂日渐消瘦。每凡举步，即觉天旋地转，常常高一脚低一脚，平地摔跤。方向不清，东跌西撞，我杵着棍子，摸到铁路边，真想躺在铁轨上一死了之，又不甘心自杀，在悲愤之极中写下了埋骨赋（见本篇前言）。

有一天，有人找我问了一个工程上的问题，我一时记不起来，必须查阅书籍。在眼镜、放大镜和两支手电的帮助下，读了一页半书。来人走后，当夜我发现几个大字缺头缺角地站立在身旁。一转眼又变成一行字，好像被截去了一段。过几天远处来了一个朋友，一直耽到天黑坐火车走了。晚上我看到黑处有一个灰白色的人站着，嘴以上没有了，细看服装，就是那人。我揉揉眼再看，

变了，这次是膝盖以下没有了。恍恍惚惚总是一灰白色的人影。次日我翻看了相片簿，晚上只看见的是相片上的模糊影子，一排排缺头少尾。我相信不是什么鬼怪，是视神经细胞病变所致，加紧四处寻医问药。

偶然听人说东方红林业局医院可治眼病，我写信并把各大医院的诊断寄去。结果来了，说可以治，费用也不多。我就不顾天旋地转，举步艰难，杵着棍子，爬上火车，又经哈尔滨、牡丹江，赶至乌苏里江边的虎林县，找到该医院。徐医生用晶状体切碎吸出法给我治疗，我一天后就可起来，三个月后全好！配上合适的眼睛，近处视力可以到 0.8。

我屋子斜对过的张老太太，常见几个无头的鬼来向她索命，她害怕得要死，把儿子、媳妇、女儿都叫到跟前，那几个“鬼”仍然不离去。她成天烧香拜佛，口里不停地求饶，弄得家人害怕，四邻不安。谣言传开说，她过去是地主婆，逼死两个长工，他们来找她算帐。又说她丈夫有血债没有交代，大队都找张老头去谈话。那时我刚医好回来，戴上眼镜，照样干活。我主张他们去就医，替她联络并借钱给她。三个月后回来了，一切幻觉消失了，戴上眼镜可以做针线。一天，她丈夫陪同儿女绕到我的小屋中来，一下就跪倒在地，不住地磕头，千恩万谢。社会的下层或偏僻的民间照样有真情在哩！

1974 年 3 月，妻子来信说，“果儿近日将和厂里的主要技术人员出差到东北，齐齐哈尔也将去，他已配好了你需要的不同度数的眼镜，适应近距离和远距离用的。”妻要我到齐齐哈尔找他。接到果儿由齐市发出的电报后，我就爬货车赶去。当时我看不清五步开外的人，戴着眼镜，再举着放大镜，凑近人才瞧得清楚。果儿已 30 出头，做了三个孩子的父亲。他从小聪明，可惜初中毕业就不得升学。15 岁的孩子在砖瓦厂背过砖头，后再到机械厂当

学工。工余之后抓紧自学，实际操作车、钳、铣、刨，理论从设计、绘图皆精。在苦难中长大的孩子，确也不易。我在旅馆门前正拿着放大镜四处找人时，他却从背后抱住了我：“爸爸，我在这里。”

当时我穿着一身黑棉袄裤，满身煤灰，脏里吧叽的。父子终究在东北能见上一面了，这使我寂寞黯淡的生活增加了几许色彩和希望。

第 六 篇

亲人挽歌

两岸遗恨

1991年，家人辗转传来消息，我妻子的二哥罗曙，90年5月22日死于台湾花莲，骨灰葬在花莲国军公墓。

在遥祭罗二哥时，我心里充满着内疚之情。若是我在1949年12月云南起义即在旦夕时，不顾罗大哥的挽留，早走三天，罗二哥一家定能团聚，他的晚年也许不致于在充满期待和遗恨中度过。罗二嫂和内侄子罗世明也不会吃尽艰苦，丧失了亲人团聚的机会，唉！我自己也不致于当卅年囚徒，到现在贫病交加。

我岳父罗佩金将军，是辛亥革命云南重九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1905年留学日本，毕业于士官学校步兵科，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回国后先任广西陆军小学总办。回滇后，又举荐蔡锷来滇任职。后与蔡锷、李根源等共同发动了云南起义，在讨袁护国战争中，曾把数世积累的家产抵押作军饷。他任护国第一军参谋长，转战川滇。袁氏败亡后，继蔡锷之后任过四川督军。后于军阀纷争中愤世闲居。1922年被唐继尧杀害，当时我妻子才5岁。我岳母范氏夫人，是岳父的继室。岳父原配夫人，生有长子罗暉，次子罗曙。岳父过世后，封建大家庭顿失中流砥柱，为财产之争，引发过人间惨剧。妻子的同胞小弟弟被毒死，岳母抱恨而亡。罗家大少爷勾结族人独霸家产，欺压自己的弟弟和异母妹妹。于是罗二少爷罗曙愤然离家出走。

罗曙毕业于南京工兵学校。抗日战争中任工兵连长、营长，在九死一生中，其经历极其悲壮：1939年底，南京保卫战，他们在北门一红门附近挖地下工事，没日没夜地赶修，到军部去领给养时，才发现部队已经撤光，日军早已进城。他们四、五十个活着的弟兄，只能潜伏在地下工事中，继续往城门下挖去，他们一连挖了两天两夜，挖出一条通道穿过城门，到长江附近。能听见

鬼子在城上的说话声，机枪和探照灯封锁了城墙。到江边的 100 多米开阔地，日军用机关枪，探照灯封锁了整个地带，冒死冲过去跳下长江几乎是唯一的出路。要逃出去，只有奋力奔过开阔地，扑向长江中。开头可能不被敌人发现，越到后面，逃出去的可能性就越少，众人抽签决定跑出去的秩序。罗曙抽到第 13 号，官兵相竞相冲出洞口，各人抱着一块木板奔向江边。很快被日军察觉，子弹密密扫射过来，中弹者一个个倒地。罗曙不要命地奔到河边，跳进冰冷的河水中，只觉江水冰冷刺骨，奋力游着游着，就不省人事。他醒来时发觉自己躺在岸边的一个小渔棚里，老渔翁正用酒擦着他的全身，说“我以为救不活了。”老人是早上去打渔，意外地捞到罗曙的。他一摸胸口尚温，就背回来了。老渔翁喂他吃鱼汤，又把自己的衣服给他穿了。他感激地跪下磕头，拜老渔翁为干爹。两天后，老人送他到对岸，嘱他珍重，他沿津浦线爬火车，到蚌埠以北找到了国军，辗转 to 武汉，找到了部队。

其后在湖南一次大撤退中，他已升任工兵营长，后面是追兵，天上是日本飞机，他们负责架浮桥，桥被炸断了，他们营没死的弟兄，站在江水里，用肩膀扛着木架，让大部队从桥上跑过，炸弹在前后左右爆炸。一个大爆炸之后，他失去知觉，倒在水中。江水中漂满了死尸，从浮桥处下去一公里多有一个小水坝拦水，旁边一木制水车取水，那里有后卫部队的一个排正负责把江水中的尸体钩上来，在岸边就近掩埋。他们已经挖好一个大坑，把尸体连钩带拖往坑中扯，铁钩钩破了罗营长的皮肉，一阵强刺激才把震昏的他弄醒，哼哼出声，大家才知道他还活着。他们仔细一看，知道他是少校，赶快送医院抢救，脑震荡很厉害，把他留在湘西的一个小县医院养伤，伤好后他和医院的一位女护士结了婚，他们的女儿还没生下，他又辗转到重庆去找部队。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知道她改嫁了，军旅之中不便带孩子，他的女儿又给了

妈妈。

1946年罗曙已升任机械化工兵第五团上校副团长，驻扎在芜湖，经同事介绍，与芜湖人胡淑英结了婚，36岁时罗曙方在芜湖成家。此时罗大少爷已把祖、父辈遗留的家产，花天酒地的搞得所剩无几了。罗二少爷早已发誓不再回云南。

1947年5月上旬，我到南京参加国民代表大会，会后罗曙开着吉普车来接我，一起到芜湖。当时他的独生子罗世明刚刚出世，小家碧玉的夫人胡淑英，高中毕业，纤细的身材，面孔俊秀，温柔贤淑。内兄罗曙不善于钻营，在军队中又没有后台，凭资历能力任副团长，还时时受人排挤。我们对政治的腐败有同感。我劝他回家乡任职，他叹息良久，总觉得混不出个名堂愧对祖宗。回顾往事，我们倾谈至深夜。住了三天，我返上海乘机到香港回昆。谁想到这就是我与罗二哥的最后一面了。罗曙后随国民党军队撤退台湾。

第二次见罗二嫂胡淑英，是1949年3月，上海解放前夕，罗二哥来信来电，把她和罗世明送回来，要我们到机场去接。那时八弟黄治是26军驻守机场的连长，上海来的班机一到，八弟上去了。我们在栏杆外等，一会儿，八弟一手扶着二嫂，一手抱着不到两岁的罗世明，第一个走下飞机，此后她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我家。

1949年11月。罗曙来电，要我送她到香港，他在香港接我们同去台湾。结果我磨不开情面晚走三天，一失足成千古恨！1949年12月9日，云南起义，以后昆明保卫战，以后的以后，我进了牢房，全家扫地出门，吃饭都成问题，缘何再谈走！罗曙也就再未见到他的家人。

由于家破人亡，谁也顾不上谁。为了吃上一口饭，罗二嫂先帮人带孩子当保姆。当时请得起保姆的人已经很少了，她常常跑

东家奔西家，工作时有时无，只好拉板车搞搬运。罗世明才五、六岁就跟着妈妈拉板车。空车时，他坐在车里，妈妈拉重车时，罗世明就牵着绳子，跟着车旁跑。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一根油条，一个饼，跟着妈妈饥一顿饱一顿。1958 年才 11 岁的孩子就进市车辆厂当童工。胡淑英所在的板车社，并入中建二公司（后改省建筑公司），她拉板车体力实在太差，就在建筑工地当小工，筛沙和泥。她学会了推独轮车，推灰浆上脚手架，能看图纸又调去做钢筋工，一根钢筋几十斤重，搬起搬落，扳弯扳直。她常年风里来雨里去，住工棚吃大锅饭。后来她终于熬到了退休，却落得一身病，肺病、心脏病、肝硬化，常常要住医院。好在省建筑公司还算条件较好，晚年她分到房子。我和妻子常去看她。提起往事，她埋怨罗大哥不该强留她三天。以致于从此和罗曙失去联系，孩子没有父亲。一过 40 年，生死两茫茫。

1989 年 8 月 20 日，老妻静娴，跌断了腿，老年人最怕股骨颈骨折，这种病常常因不能治愈和并发其它病而一命呜呼！12 月初，胡淑英来医院看望静娴，这就是我们最后一面了。当时她住在建工医院。不几天后她早上起来打水，脚下一滑跌倒在地，右脚不能站立。拍 X 光片后，医生正商量着如何处理。她疼痛至极出口骂护士。小护士急了，就把她的 X 光片拿来：“你还要吵嚷些什么？你的腿骨都跌断了，骨断处间距三公分，整不好要把你的脚锯掉。”她一急之下，骤然心肌梗塞，20 分钟后离开了人世。她的骨灰寄放在昆明跑马山公墓。

罗曙 49 年 11 月到香港，拍电到昆后。等呀等，一直到 12 月 9 日。那时云南起义扣住一切飞机，他知道妻子和儿子是再也不会来了，失望至极只好回到台湾。据 80 年代后辗转传来的消息得知：他一直在部队干到退役，当时是中将衔工兵总监。后娶了一位台湾籍的小学教师为妻，没有子女。更可悲的是退役后，他把

退役金投资办厂，该厂又在竞争中倒闭。晚年移居花莲，经济不宽裕。抗日战争中的震伤遗症，使他双耳失聪。他时时拄着手杖立于海岸旁，遥望西南方。1990年，他逝世。骨灰葬于花莲国军公墓。

祖国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传统同时也是沉重的历史包袱。在探索富国兴邦的征途中，一代代人付出全部精力乃至生命的代价。我父亲黄斐章将军如是，我岳父罗佩金将军如是，我内兄罗曙如是，我也如是，只不过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牺牲者而已。

哀哉！罗二哥与夫人独子，40年不得相聚，骨肉亲人隔海相望，双双遗恨而亡。

八弟之死

我的小弟弟黄治，比我小十岁。1926年生于四川成都。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人长得很俊。妈妈没有女儿，特别疼他。1945年，他十九岁，英语专科学校毕业。一天李根源、李烈钧大伯都在座，说起父亲“将门岂能无后，你这小儿子，英俊高大，好好磨练磨练也是一个人才。”说得父亲高兴，当即修书一封，八弟就到重庆上了中央军校第21期。

46年他毕业分在26军，先干了一年参谋，后升任中尉连长，驻守机场。参谋是个闲职，长官知道他是滇军名将之子，也听之任之。他常常回家在昆明玩。云南起义后，26军第8军围攻昆明，他正在家里。后来卢汉用枪械和银元把26军、第8军打发走。解放军又从贵州、广西星夜兼程赶往昆明。我劝他赶快去追队伍。我被捕三个月后释放，才知他没有走，又去读云大外语系。当时六弟黄澂在云大外语系任教授。我父亲、母亲都对新政权抱有幻

想，觉得自己未参加过对共产党的敌对行动，对蒋系政府又不买帐，作为云南名绅又支持过卢汉起义，想来这些共产党也会知道，因此妈妈舍不得小儿子随 26 军逃往国外，要他好好学习外语，以备后用。谁知他的一个同学，是个和共产党作对的死硬分子。黄治曾和他一起玩过，受牵连，于 51 年被捕。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不宣布他判几年刑，又没有具体罪状，一个中尉参谋，又没有任何罪行，总不能说年青力壮，军校毕业就是罪啊！就内定暗判刑 5 年。不宣布，不通知本人及家属。而我多少还在监所里当众宣布判刑 15 年，没有罪状，没有判决书。因为我当过国大代表，三青团昆明分团主任，是“职务罪”吧！具体查来查去，46-47 年，我任职一年中不过办过歌咏队，搞过演讲比赛、体育表演、救灾义演、组织下乡宣传等活动。不能判我死罪，就是判 15 年，也写不出具体罪行，只好不给判决书。可怜的八弟，自己一直蒙在鼓里，已经在劳改农场服刑三年半了，如果明白告诉他判刑 5 年，他还会跑吗？母亲每个月再困难都要亲自去送点日用品，要去见上一面。八弟在绝望、没有奔头的情况下，在其他人的怂恿下冒死出逃，直逃到距国境线不远的地方。他本应该夜行晓宿，谨小慎微，结果他极其大意，找人带路白天走，碰到的是早布下的暗探，专门把他们带到边防军的伏击圈，束手被擒。抓回来，当场枪毙二人，三人判死缓，二人无期判徒。八弟从 5 年一下变成了无期，押回二监狱。据后来妈妈说：父亲 55 年补为省政协委员，曾视察二监，特意要求见了小儿子黄治。八弟当时见父亲，只说了一了句：“父为座上客，子为阶下囚。怒谁乎。”父亲当着许多大官的面只能勉励他“好好改造，妈妈会经常来看你。”

母亲后来摔断了腿，行动不便，却依然托人捎东西给八弟。我 64 年回家，妈妈青光眼双目失明，跟五弟一起生活。五弟当时

因肃反后被清除出教师队伍，在市味精厂当工人，勉强糊口。五弟黄清，毕业于联大历史系，云南起义时是省府秘书，兼昆一中历史教师。51年以后，被迫与家庭划清界线，仍免不了坐监牢被清洗的恶运。1964年，我万里迢迢奔回家中，母亲和五弟住在钱局街两间快倒的破土基房里，当时父亲已过世。妈妈用颤抖的双手摸我的脸，摸我的全身，我眼泪再也忍不住滚出来了。母亲用手擦去，“哭什么！生、死、沉、浮应慨然处之。”但妈妈心里是异常悲苦的，她熬过了1955年儿辈全部被捕，孙辈嗷嗷待哺的困境。58年父亲又被划为“右派”，饮恨而亡。61-62年，粮食紧缺，生活困难，母亲又股骨颈骨折，虽经草药医生治好，但行动不便，一脚高一脚矮。母亲直到68年患肺癌过世，一直关切着牢里判了无期的八弟。

八弟在二监做电工，他肯钻肯学，工作勤奋受过奖。我熬过了最初下放农村最困难的那几年，返家乡探亲，专门和静娴一起去二监看望舅舅朱白东和八弟黄治。当时极左路线甚嚣尘上，亲人们都不敢去探望。舅舅已很苍老，胃经常出血。八弟见我大动感情，眼泪滚出，我也如鲠在喉，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想不到这就是我与舅舅和八弟的最后一面了。

1976年初，二监又来了一个犯人电工，此人是专学电工的，实际经验差。他们两人就互不买帐，互相瞧不起。后来在监狱管理人员的“策略”下，互相揭发，互相“整”。二监是云南省的“模范监狱”，在昆明城北，铁峰山下，高墙电网，内有几个工厂，有被服厂、汽车修造厂、机械厂、木材加工厂等等，都由犯人干活，生产许多当时畅销的产品。有次遇上工厂断电，那人就揭发黄治“破坏生产”。黄治帮管教干部修收音机，他就揭发黄治偷听敌台广播。黄治也不肯让步，互相抵死“整”。连监管人员都知道他们是“闹气”。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华国锋接班还兼任公安部部长。内部有文件规定“全国处于非常时期，在全国监狱和劳改队中的犯人，有不稳定者按1%的比例镇压一批。”全国的在押犯人少说也有百万，按1%，少说也有万人。这么庞大的殉葬队伍，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我的小弟弟黄治由26岁一直关到51岁。1976年，那是个飘摇动荡的年代。9月底，监狱突然召开大会，批斗处理犯人。他们把黄治和那个电工乱污乱咬的所谓“材料”作为确凿证据来批斗他们。那次批斗大会，有十几个犯人加刑。那个电工由十五年徒刑加到死缓。黄治等七人由无期改为死刑。斗争会一完，打开后面铁大门，他们立即被枪决在铁峰山下。

八弟啊！八弟，廿五年的牢狱岁月，没有追求，没有爱情。老父、母过世后，兄弟手足具在重压下苟活，子姪辈为生存而奔忙，没能照顾你！我的小弟弟啊，你死得多冤！你活得多累！

八弟啊！八弟，也许在临刑的五花大绑中，在坚决镇压的吼声中，你的脑海会闪过青少年时代的几许真情，对亲人的几许思念。也许“活着不如死”，你在最后的思绪中，祈祷上苍的垂怜，祈祷老父、母的快来接应。

八弟被杀后，监狱派人来找黄清，先说要他去领尸，后又补上一句：“我们已经处理了，安葬了，还立了碑，看来你也不用去了。”

事隔五年后的1981年，他们又忽然送一个平反书到五弟处，上面主要说：“确实量刑过重……。”

一条人命。一个无辜无罪的人，一生就这样被坑害了，真乃天理不容。

1982年春，清弟、竞妹、幺妹（舅父朱白东的女儿），我们一同去寻找舅舅和八弟的遗骸，一无所获。

有寻亲骨歌一首，聊以寄托哀思：

斜日西风寒，	寻骨铁峰旁。
高墙锁硬汉，	铁扇鬼门关。
林残败草黄，	荒坡乱葬岗。
空穴无完骨，	新垅半成行。
亲骨知何处，	高声咒上苍。
空谷回音响，	无奈导酒浆。
呜呼吾叔弟，	哀哉敬上香。
乱世草菅命，	先杀后平反。
惆怅寻归路，	悲伤泪盈眶。

大哥的冤狱

我的大哥黄汶，生于1914年7月，是父亲正式结婚前一侍妾所生。母亲虽然没有歧视他，但他自小所得的母爱很少，加之身材较矮小，黑瘦，与我们其它弟兄很不相像。他从小胆小怕事，性格内向，反应显得迟钝。他毕业于军医学校，历任医生、军医，卫生院长之职。他的妻子是云南名中医姚贞白的堂姐，结婚后就和我们这个大家庭分开另外过日子了。

1953年，他调到普洱某医院任住院医师。他为人耿直，不会营钻拍马，加上小时候生过大病，听觉很差，除工作外和同事关系很淡漠。由于所谓“出身军阀”家庭，本人又当过少校军医，1955年被莫须有的罪名判处七年徒刑，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1981年我们分别了卅多年后，他由漠沙劳改农场请假回昆探亲时才见到了他。我详细地询问他到底犯了什么罪。他说“是医疗事故。”

“真是你的责任吗？”

“我做事从来小心谨慎，哪能对病人不负责任啊！第一件是一个患肺炎的病人，拖重了才来住院，我看呼吸很弱缺氧，就告诉护士给他吸氧气。护士拿了一个没有清洗过，管头内部堵死了的氧气瓶，塞给病人，病人反而窒息死了。那个护士是个党员，抵死不承认，反而说是黄大夫塞上的。不由分说，我被指控为失职，造成病人死亡。第二件是一个患腹膜炎的病人，已是晚期。下午三、四点钟送来，等我来上夜班时，病人已气息奄奄。白班医生诊断立即开刀，就推给上夜班的。病人才打下麻醉针几分钟后就死了。第三件是我开的处方，药房把药拿错，护士静脉找不好打不进去。我在旁边看着就接过来注射了。当夜病人突发高烧，经多方抢救幸好没死。处方没错，护士和药房都不认账。又算在我头上。1955年正是肃反高潮，他们以医疗事故为名判我七年徒刑。”

按说1962年就该刑满释放。谁又知道一旦进了劳改劳教队，就是“无期徒刑”到死才了。我大哥一直在漠沙劳改农场，那是云南亚热带河谷的荒凉农场，其迫害犯人的残酷程度也是闻所未闻的。

1981年，冰河开冻，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了，农场才勉强准他回昆明探亲。听他讲后我非常气愤，劝他写报告请求复查。他不敢写，他亲眼见三个释放留场的工人因为写了报告要求复查而被关小号之后加刑。我劝他多写几份，直接投给省公安厅。他仍然不敢。我们多方打听，找到他的女儿姚又樱。女儿不认他，妻子又故世，唯一的一个儿子中专毕业分到浙江省去了，他又只好回到农场去了。

不久我向省高院申诉要求平反的正式平反书收到了。我又写信给他要他上报告，他回信只字不敢提。不得已我用我的名字为

他整理成材料，分上给各有关机关。半年后才接到他来信说：领导找他谈话，指责他指使我到处上报告。他把我写给他的信给领导看了，才算免脱罪责。后来他连和我们的通信往来也不敢继续了。我和清弟，又数次写信给漠沙农场领导，最后直到1982年8月才接到他短短的回信说：“我很好……。”

一个虽然出生在我家，但备受冷落的庶出哥哥，一个胆小怕事，老老实实的医生，却因什么“医疗事故”打到漠沙农场，种甘蔗，干大田作业，一直到年老体衰改为放羊，名曰留场就业，实际上一辈子在劳改队，有儿女，却没人敢过问。到右派摘帽，“反革命”平反，“农村地富摘帽”，全国大势所趋时，边远的“漠沙农场”还在继续威吓，压制我大哥这个老实胆小得不能再老实的人，这是一种无奈的悲哀。

1986年3月，我的祖籍镇沅县县委书记亲自派车到昆明接黄清、我、杨学元等几个镇沅县籍的知名人士回家乡，共商改革大计。我们专门从墨江绕道漠沙，去看望他。打电话询问场领导，才知道大哥已于廿二天前过世了。想去坟上吊祭一番，一问才知，他所在分场离总场还有十八公里，车又不通，只好作罢。据说死的那天上午，他还去放牛，中午回场去食堂打饭，正在吃饭时死在宿舍。尸首埋在山坡上，插上一块木牌。

我回昆后，写信通知他儿子黄柏（后改名为志敏）。1987年7月间，黄柏回来住在我家。他妹妹已改名姚又樱。听说她不愿相认的父亲在劳改农场过世后还有点抚恤金，正准备去拿。我和清弟、澂弟联名写信给劳改局。农场接到上级转来的信后，把黄汶的尸骨挖出火化了。他儿子黄柏去到漠沙农场，拿到了塑料袋装的骨灰和300元抚恤金。

黄柏又去到普洱法院，拿到他父亲的平反通知书：“认定黄汶医疗事故三桩，因证据不足，查无实证，撤消原判，宣告无罪。”

一个政策，甚至是一纸文件，或是某当权者的一句话，就能让无罪变为有罪，没有罪名的可以任意找个罪名安上。几年刑期也能变成无期徒刑，一入劳改队，就是终身为奴，死亦无葬身之地。卅多年的活受罪，折磨致死，换得一纸空文。像这样的人何止千千万万。

黄柏又质问法院，“善后问题，怎么处理呢？”法院回答：“那是他原来单位医院的事了。”找到医院，书记说：“那是病家告的，与我院无关。”再去再追问，回答是：“我们事忙，无可奉告。”1987年了，还如此横蛮不讲理。明明是医院开了公审大会，送法院判刑。病家告也只是告医院，医院再汇同调查责任者，才能由法院决定负不负刑事责任。

1955年肃反时，在“文、教、卫”等知识分子多的系统，党组织和行政领导采取深查细挖的方法，叫“人人向党交心”，掌握了一些材料后，又动员互相揭发来整人。各单位的重点人物，可以先关起来再动员群众揭发，于是墙倒众人推，多少不实之词，诬陷的、报复的、忌妒的纷纷出笼。他们就凭这种办法凑成材料，再走走过场，由法院宣判被害者的罪行。想想大哥一生确实悲愤难平。有诗一首：

七律

欺压善良愤不公，	狐群狗党真狠凶。
划地为牢谁敢动，	谈虎色变心内恐。
妻离子散女不认，	无可奈何回队中。
可怜无罪公文到，	漫草荒烟墓已空。

革命以如此残酷的手段革掉了敌人、无辜者、朋友及自己人的命，这样的“成功”，正是它的失败。我家庭及别人的遭遇越是悲惨，就越是证明这个革命失败得越彻底。

尾 声

重返流放地

回 家

这么多年在东北劳改，我对昆明家中发生的事几乎一无所知，兄弟、妻小日夜思念，不得一见，看见一辆辆列车隆隆驶过，我不敢想有朝一日可以坐上火车回到故乡。这一天来到时，我还害怕不是真的。我的几件杂物分别送给常发公社的穷乡亲，终于离开了我那间赵家庄摇摇欲坠的小茅屋。坐在火车靠窗的位子上，目送远去的田野、农舍。近三十个年头的往事不堪回首，不念再见，只有心酸。

1979年2月回到昆明，亲友一齐到月台上来接。甫下车，最先跑到跟前的是我从未见过的两个小人，一个3岁，一个6岁的小孙孙。我儿子把他俩抱起来，让他们叫爷爷，不由想起贺知章的诗：

少小离家老大还
乡音未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应不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妻子、儿女、亲友一一相拥后，我问妻子为何大女儿和小儿子不在场，她面有难色，我心知不妙。原来他们被关起来了。两个孩子被卷到文化大革命中去，像他们的父亲一样被打成反革命去坐牢。

两个孩子关在狱中，一家老小要吃饭，我非得去干活挣钱，不久就在昆明一家建筑公司找了份工。因为父亲、岳父属于高级统战对象的关系，1980年，我被指派为昆明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虽无甚兴趣，还是愿意去挂个头衔，这多少可以改进我的政治待

遇，我那时仍然是受“大处理的劳改释放犯”。1951年判了我15年劳改，之后又作为内控人员被放逐15年，到80年代，罪名仍背在身上。

当了人大代表后，我的工作单位帮我向云南省公安厅递交材料，要求平反，1981年9月29日，我接到短短一纸公文：“黄湛曾支持1949年中国的和平解放，取消1951年对他的指控。”苦苦等待了三十年，九死一生，受尽磨难，被如此轻易打发。最为痛我心者，是我的亲人也无辜背了三十年“反革命劳改犯家属”的罪名，在社会上受尽歧视，五个子女失去上大学，甚至中学的机会。在过去三十年频繁的政治运动中，遭受肃整。政府只字不提判决的错误和我受的冤枉，不认错，也不提赔偿，没有表示一丝一毫的歉意。

现在，这个释放不足一年的旧时反革命犯人，带上一顶人民代表的帽子。我一共任了两届，1981到1983及1987到1989。当人民代表并没有任何权力，也无福利，只不过让我不必像劳改犯那样，出了狱仍然是“劳改释放犯”，抬不起头来，找工作也容易一点。对才放出来的劳改犯来说，在建筑公司的工作也算是一份好差事，但毕竟是合同工，我不可能在退休前储够工龄领退休金。我们两夫妻将来的生活仍没有着落。我也想方设法找个好一点的工作。不用说，平反也罢，不平反也罢，当过劳改犯三十年之久的人，不受欢迎。

1982年我收到一封信，寄自黑龙江海伦农场，那是我监外服役多年的地方。他们请我回去工作，答应我过去在农场做事的年份可以一起算工龄，将来拿退休金。庞大的农场基础设施大多是我亲手设计的，我像一位老农了解自己的土地一样，熟悉农场。他们知道我的用处，要我回去。说来讽刺之极，回到原来的劳改农场，似乎成了最好的出路。他们答应让我做三年，我提出条件，

每年冬天能回昆明探亲。于是，回到故乡三年后，我和妻子一道又打点行装，重返我的放逐之地——黑龙江。

宽 恕

回到农场，和许多原来管我的监狱官成了同事。很奇怪，彼此倒没有多少芥蒂，关系也并不紧张，似乎可以融洽相处。有一天我遇见那个 1968 年诬告我的韩某。他的诬迫害得我被遣送下乡十多年。他向我一再道歉，表示后悔。我能够原谅他，但并不想和他交往。他妻、我妻倒常常结伴来探我们的班，慢慢变成好朋友。我和妻子甚至不时去他家吃晚饭。

我回农场不久便撞见钱德福。他属“地方班”干部，在海伦劳改农场的头几年，在他们一伙的折磨下，我过着非人的日子。现在我们成了平起平坐的同行，他第一次向我伸出手来。他仍本性不改，在办公室内向我摆架子，不过四周无人时，也会表示亲近，说过去的事就算了，要我不必计较。有一晚，我们俩在办公室制图工作到很晚，他突然拉住我的手久久不放，“你是我的老师！”他很诚恳地说：“我非常钦佩你的人品，你的技术、学识。”他一定要请我吃晚饭。于是当晚我与从前的打手美美地共进了一餐。

我也想不到自己在农场会干得那么卖命。这一片冰冷广袤的流放地，我曾咀咒了半辈子，怎么会对它如此关切？我年青时的梦想便是用科学技术令中国强盛。当囚犯的 30 年，再以公民之身任职的如今，我在北大荒所做的，也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吗？

一天，我碰到原劳改农场的党支部书记杨彦，两人都异常高兴。当年他待我不薄，我们一齐合作搞当地基础建设，如今又成为同事，我也不再是犯人之身。两人兴致勃勃，共同为建设黑龙

江的农村出力。那时最大的问题是食水供应，当地农民没有自来水，饮水不卫生，常常引起各种疾病。

杨彦招聘了大约二十名高中毕业生，让我负责对他们做三个月的技术培训。这些所谓高中毕业生都是在文革中上的学，只学会批斗老师，不大懂得基本的代数几何。教育落后，人才缺乏是当地最严重的问题，于是乎政府才想到要招募我这样的“老反革命”去帮助搞建设了。

我们终于建成了蓄水池，解决了威胁农民生存的水污染问题。一天早晨，我在黎明前醒来，窗外一片“闪闪星光”，上百当地老百姓手持火把、香烛，连夜赶来向我们致谢。此情此景令我感动得两眼湿了。我从来埋怨命运不公，四分之一世纪的生命白白抛撒在这茫茫的荒原上，这一晚的场景令我想到我在这里做的事情，当囚犯也好，做工程师也好，对当地老百姓多少有些用处。也许，我的年华并没有虚度。

注：初稿于1996年完成。2001至2002年，Robert Gray博士译为英文，并访问作者黄湛先生，补充了一些内容。此书的尾声及第四篇的主要内容，译自英文稿。

附 录

忆熊韞石兄长

我们交往近 70 年，他干净利落地走了。这只有智勇双全的人才能办到。追忆往昔的悲欢离合，使我久久不能平息，像一幕幕电影涌现脑际。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嗜好如此相近，气质如此吻合的朋友了，怎不使人悲伤和惋惜！

我们相识是件巧事，那是 1929 年秋，我还只有 13 岁 3 个月，竟然在成德中学毕业了。当时招生的有新办的工业学校和东陆大学预科，父亲叫大哥黄汶和我都去报名考试。那时我见应考的都比我大，心里十分怕不如人，考不起。工校出榜那天我独自去看榜，不敢从正面看，心想考得起就算不错了，所以从后面往前看。已经一半多了还不见我的名字，心里著急，以为没有希望了。因为榜高人小，只得由后往前移，不留心碰到一位漂亮的小伙子，我十分不安，怕他怪起来又打不过他。但他却毫不介意地笑着说，小兄弟你为什么要从后往前看，我答考得不好。他又问你叫什么名字？当我告诉他时，他又大笑了，说莫急，你考得不错，在 15 名，只在我熊韞石后一名，我急忙看去，果然有我的名字，不禁惊喜若狂，手舞足蹈。于是就攀谈起来，感到很投机，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我又再往前找，不见我哥的名字，他问我还找什么？我答，找我哥黄汶的名字，他又帮我从头到尾找了也不见，那肯定是没有录取。

几天后预科也出榜了，我考在倒数第六名，大哥也没考上，我去读预科，大哥冒我的名去读工校。一学期过去了，我舅妈到南京，我舅和金陵中学校长张方是北大同学，于是我凭预科修业证书就进入该校高一就读。学校是教会办的，功课很紧，70 分才及格，体育音乐都很出名，就是有欺新生的校风，我初去被他们戏弄得很苦。我听同学们谈话有很多是广东口音，一问之下才知道 40% 是广东人，华侨居多数。我舅替我出了个主意，要我冒充越南华侨广西西林人，现家住昆明。此方真灵，不几天我就和他

们打拢了，从此没有人再敢欺负我。在校的一年中我学会了广东话，英语也有很大进步，也踢足球、游泳、打网球、跟他们做礼拜唱歌，还学会了提琴和一些世界名曲，如圣上夜、圣母颂好几个小夜曲，安慰送别等歌曲。

年底舅父调上海工作，寒假我到上海玩，住在虹口舅父家。赶巧碰上了一二八战争爆发困了一周，水电全无，炮弹横飞，尸横遍街，幸得各国领事出面调解停战四小时，全家有幸逃出虎口来到法租界，花加倍的钱买到几张到香港的船票，才算逃回昆明。当时逃回来的学生很多，东陆大学特别招收了一批插班生，我得以同等学历的准考条件，考得备取。战事结束有人纷纷出走，我才得注册入学，仍在原工科八班，直到1935年毕业。

熊韞石于1932年毕业，到公路总局工作，我们相见过两三次。最记得的是在一个朋友婚礼上，他和三个友人吹奏著婚礼进行曲，新人手挽手按韵律缓缓进入礼堂，当时在昆明是别开生面的新鲜事，颇惹人注目。在他的启发下，我和几个爱音乐的同学也组成一支乐队在学校庆典上、恳亲会上亮相，博得好评。后来同学的婚礼我们也去演奏，视情况的不同采用适合的进行曲为主，配以其他悠扬的曲子。到后来却变成了一个包袱，连不认识的人，也想法辗转介绍，请我们去参加婚丧典礼，忙得不亦乐乎，外界称我们为“洋吹鼓手”，好不难听！

1938年初我调回昆明叙昆铁路，但短期不能成立，友好马崇周相约暂就省公路局工作，一天因马科长不适，命我代他去验收昆沙段，只知段长姓熊名韞石，等到见到人才知道是老朋友，二人都喜出望外，畅叙阔别之情，并介绍夫人相见，因他结婚时我已出省，我结婚他又在县，都错过了。因而彼此夫人都未见过，但和尔瑞相谈之下，才知道她父与我父都是同时代留日学生，早已为朋友。我们是父交子往属于世交，不用说我岳父也是同时代

留日仕官生，也必然为世交了。当晚即住他家，尔瑞亲自做了许多好吃的菜，当夜一直谈到十二点才睡。

验收后他调回局，我请科长把他要到桥梁股，从此朝夕相聚。当时工作异常繁忙，全省公路每一座桥都要详细审查设计。工程量，价值……等。没有木桥或其他材料做成的桥，唯一的就是石头。经过我和他的研究，决定先做一套石桥涵的标准图，材料预算都配套印发，各路段遵照执行。后来我又兼公路线股的事。9月，叙昆铁路局成立，我离开铁路局，这一套图是他替我完成的。但他在图纸上只留下制图栏的签名，设计一项则签上我的名，足以说明他那“实事求是”的精神，要是换了旁人，我既已离职，当然要显示一下自己，而他则不这样，这种精神极为可贵。

这一段相处时间虽不长，但彼此有很多嗜好相同，个性相似，因此友谊进展迅速，成为了通家立好，莫逆之交。

我报到后，派在叙昆铁路第一总段定车站测路段，忙得不亦乐乎，很少有机会看到熊大哥。后来马科长病重辞职，科长由东大第一班同学吕廷相担任。大哥又被派出外段施工。1940年初，我施工小河口工程所，修好之后又调滇缅铁路24分段。分段位于南丁河西段，那是有名的蛮烟瘴雨之区，大家都不敢去，找人困难，我只得轻装简从，自己跑一趟看看情况。那时日本南进政策已付诸实施，越南、菲律宾相继失陷，外界因素十分不利，而分段所在地气候炎热，前无村后无寨，人烟稀少，施工困难。

回来后我把情况向父亲说了，正好公路局四处找寻技术人员，父亲说还是回昆明吧！于是我又二次进公路局，仍担任桥涵股主任，兼管路线事宜，赶修滇缅公路。我曾设计了功果、汇通两桥，并赴仰光购置钢索。因路局常和美军后勤部SOS打交道，局里无适当之人既懂工程又善外语，于是我又提升为副科长，主办外交。我与熊大哥来往不多，只有一次为了确实知道昆明到开远的里程，

我们组成了一队用竹尺丈量的队伍从车站一尺尺地丈量到开远，途中一个不大的石头把车子的电池碰碎了。想了许多办法都失败了，最后只好搭便车到开远美军 SOS 求援路易斯，大尉借我一个蓄电池，并开著他们的车子送回。途经渡口处遇上美军宪兵，硬说我俩是偷车贼，不由分说带上手铐，押到办公处关押，后经大尉证明，才算了事。后来提起这事不禁大笑，其实应该向美方索赔才对！

1942 年底因军运需要，陇局长命我组工程处抢修元谋至龙街公路，恰好熊大哥施工告一段落，我要求调他担任副处长，找来旧部李华清、蒋 XX 等，于新年后开到元谋县。办公室设在北门里小学校旁，当即内外联系，春节后即行开工。从此又是朝夕相聚了，我和他同住一屋，因气质近似，嗜好相投，有时长谈到深夜。

他精于射击，天亮起床后常一人出猎，只带一粒子弹，总是弹无虚发，不管是斑鸠、野鸡，总要带回一只供午餐之用。我也有枝德造七九步枪，和他的一样，那是父亲调选出来的，偏差极少。我不服气，也只带一发子弹出去，利用鸟类谈情说爱追求对方的机会，它们这时警惕性最差，可以更接近目标，在准星中出现目标重合的瞬间开枪，常可以一弹双收。有一次他和我同去，这个窍门被他发现了，他耐心的等候，恰好有一个第三者赶来凑热闹，他创下了一弹三中的记录，足证他观察能力强，应用得当，我弗如也。

小学校有一架破风琴，我俩详细检查，原来是鼓风部份被老鼠咬坏，有办法修好，就和校长商量，我们代为修好并要借用几个月，他同意了。我们又商量一番，用胶布补好。蒋校长会拉二胡，记得的曲子也很多。李工长会弹三弦，二分段长是音乐的能手。于是我们便组成了一支中西合璧的乐队，每当清风明月之夜，

就在我住所阳台之上演奏起来。中西乐合奏，另有天地，尤其是奏哀艳凄凉的曲子，如中国的汉宫秋月、昭君出塞、二泉映月等，西洋的有小夜曲、安慰圣母颂、圣上夜等曲子。我们最初拍节不齐，后经熊大哥调教一番，倍觉动听。有一天晚上，我们连奏了许多中外哀艳的曲子，半个多小时过去，我们虽然很兴奋，但感到有些累了，就休息一下。大家这才发现大门外水池边，树荫下基上竟然有百十来人，男女老少都有，正在全神贯注地听。往里看天井，到处都是来听音乐的人。一位老者上楼来和我们说，他活了 70 岁，还没有听过这么好的音乐，希望我们能留得长一些，让大家饱饱耳福。盛情难却，我们又演奏了一小时才停。

当夜我们很兴奋，第二天小学校长一定要请我们中的一个去当他们的音乐教员。我们说大家各人都有事，婉言推辞。但许多别的教员也来了，学生也来相请。后来我们只好答应，但不是一个人而是谁哪天可以抽身就由他去，维持了一年。当地居民都把我们称之为“北门大师音乐会”。那时在当地小有名气，这是和熊副处长的提琴技巧的高明和组织能力是分不开的。我对于拉京胡及京戏比较感兴趣，李工长爱唱，嘴里常哼哼，空城计捉放曹等，只是缺少唱旦角的。有时我和蒋配合，他拉二胡也拉一些旦角唱的板。真巧极了，有一位另一所小学的女教师，是个戏迷，听见我们拉，不觉喉痒，自告奋勇地来唱。她真唱得不错，于是我们这乐队又添了一个戏班子。

春种过去了，别县的民工陆续来到，只有一个县的始终未来过，于是就由熊大哥去催，十来天他回来了，带来不少鸦片烟土，说该县民工不足，以钱代工，钱又不足，只好以烟代钱（当时烟土是半公开的），我们全部一次转手赚得五千余元，留下三千，其他大家分了，这三千元只有他和我知道。

这时县府请我各单位包括在该县整训的两个团长去参观麻疯

院，出东门沿小河进山约 10 公里，到河源一个水塘傍，有十来间房子很整洁。旁边是个小村庄，庄后白洋里就是麻疯院。主持者是几个教会的洋人，在办公室招待我们。县长介绍，这病院是基督教会办的，洋人绝大部份是医生，护士则多半由当地人经培训而得。

提到麻疯，人人害怕，真有谈虎色变之感，我们连茶水都不敢喝。医生介绍说麻疯细菌虽然利害，但很娇弱，在空气中只能生存一两分钟。传染是直接的，如果你皮肤破了一点，又接触病人的血液或排泄物就染上了。去参观之前需要检查身上，手上脸上是否有伤口，贴上橡皮贴膏就无问题了。那位院长告诉说他们这里的病人分轻、中、重三期，轻的全身毛发逐渐脱落皮肤白嫩微红，妇女非常美丽，但好景不常，有的三年，多则五年之后毛发脱落，一般不超过十年。早期治愈率可达 15%。中期开始的信号是指甲从小到大，从上到下开始脱落，病人并不感到痛，也不流血，渐渐末端关节开始脱落。病人只觉痒，创口暗红，稍有黄水，但其他关节仍可活动。先手后脚直至手足指关节全部掉光，面部五官又开始脱落，这段时间约为 3-6 年，治愈率急剧下降。前面讲的手指开始脱时，治愈率尚达百分之 0.5，到五官脱落下为万分之一。重期面部只剩下六个紫红色流黄水的洞孔。手由腕关节脱至肘关节，足部踝关节至膝关节，终至死亡。此期已无可挽救。

大家听后有的不敢去看了，我和熊大哥两位团长都去看了。果如所言，尤其是“重期”尚有五人，状至凄惨可怕，医生不让我们进屋，只在宅外看看，我忍不住问医生明知必死，何必再让他们受罪，他说上帝要我们治病救人，怎么还能杀人！回来后直发恶心，大家都感到余惧犹存。经过一番消毒处理后，大家又坐下了。有人问你们医生护士曾否有过传染，院长说 20 年来只有一

个英国人医生和两个护士被传染了。我问现在呢？他说两个自杀了，一个尚在中期，工作特别努力。我们都十分钦佩他的这种精神。院长留我们在他院吃饭，大家互相看看，面有难色，县长说我已准备了午餐，彼此都忙，就此告辞吧！

辞出后我和大哥并肩骑马，缓缓而行，我问这些洋人在他们国家里生活舒畅，异常地享受，为什么偏偏要到这种山野小村，过著担惊受怕的日子，天天要和恐怖打交道，究竟为了什么？是不是还有特殊任务。熊说我也有此怀疑，我注意了他们连电都没有。我说移动式收发报机，只要两个人一摇不就可以工作了。后面李团长说我们在元谋一共只有三个电台，彼此位置都熟知，还从未听见有别的电台在附近。王团长也插嘴说，这些传教士有两个美国人两个英国人，老院长系法国人，但他在英国传教多年已加入英国籍。美军电台有的是用密码的，堂而皇之地发报，谁也不知道。我想真是治病救人，不会是间谍。我和两位团长是中训团 21 期同队的同学，在团时已认识。尤其是李团长，是高个子，还是 21 期 2 大队篮球队长，我是队员，为取得冠军立下战功，所以无话不谈，诸事好商量。

电报局张局长也插言，他的看法和两位团长相同。他已在元谋县八年之久，对于麻疯病院老百姓无不称赞和钦佩他们的精神！后来又谈到这次县里组织参观还请吃饭，目的很明显，只不过没有说破而已！我小声和大哥商量，我说他们（指军队）吃空额粮食有的是，我们总该有所表示才好呀！他说我想了，把那剩下的 3 千元钱捐给他们吧！我本来还想了别的办法。但他这样一表态，我只好同意了。席间，不等县太爷开口，我们纷纷表示军队给粮，商业部门、电讯和我们捐钱，好不热闹。我心里十分钦佩熊大哥急公好义、甘愿把他辛苦弄来的钱全部捐出的举动。事后他向我说人家舍掉舒适的生活，冒著生命危险来到这穷乡僻野帮我们救

人，那是我们的同胞，就是倾家荡产也是应该的。他那爱国精神和伟大无私的气概使我再次惊叹！

1943 年底元龙段通车，提前两个月，受到局里表扬。翌年春，验收完毕，我俩都回到昆明路局。我因时势造成，内定担任昆明市自来水厂厂长。陇局长因路局尚有许多我曾参与和经手的事，留我兼任工程专员。而元龙段还要铺路及部份加宽，陇局长也顶赏识大哥的才干，就升他为一等技士元龙段工程处处长。

1944 年 7 月 15 日我接管水厂，我和熊大哥商量妥了，我聘他为水厂工程师。他以路局的事为主，抽空来厂走走。后来他想把家口搬下元谋。我知道他的居住条件太挤，建议等他回来就搬到我家去住。我让他上任之前再来我处，再次商讨今后情况，这十来天先摸摸底。7 月下旬他来了，说即将动身。我们商谈了整夜，共同拟订水厂整顿方案，主要为调整人事增加供水提高水质，严密收发，摸清用户供水及全市管路等。元龙段加定结合铺路进行，用他叔叔熊光煊的枪药向李团长等换取炸药，借电动取爆装置炸下全部 ZDM 加宽工程的松石方一举两得的方案。三天后，他举家到元谋去了。值得一提的是，美军的朋友们知道我任厂长都来道贺，后来又要求供水。我趁机要了不少油管及漂白粉，安装了美军专管。从此开始昆明自来水消毒的创新。1945 年 9 月我要到越北受降，工务方面请大哥不时来照应，使我无后顾之忧，受益匪浅。

1946 初冬一天下午，熊大哥来厂找我，说他下面工程完了无所作为，已请调但无回音，故来昆明探听一下。我们彼此各人汇报近况，很投机。我说你调一个信闲的差事，也好多来厂里合作，共创未来。图谋发展，仍是不要放弃路局。你住得困难就搬到我家，下班后可有充分时间。反正我家房子多，又难以租出，没有人住反而不好。王士坤、杨钜廷现还住在我那里呢。他说还要

再考虑一下。

下班了，我约他回家吃饭，那时我已有一辆新的吉普车还有一个车兜，只花了 300 美元。刚要走突然有电话找他，电话声很大我听得清清楚楚。原来说的是苏尔瑞在他走后接著也搭车回昆明，不幸路上病倒不省人事。同车的怕她受不住车上的拥挤和颤动，只好把她寄放在离武定不远的路北一户人家里。他们忙上昆明送信，他父亲说车已借好，迟则不行。我急忙说我找医生，买点乾粮吃吃，立即动身。他说药针现成有就走吧。我叫电话室通知家中，立即开车买好吃的，又在水厂拿了 200 元开到他家。严协成家轿车已在他家门口等候，六点半就出发了，到夜里快十点才找到那户人家。

尔瑞已苏醒，但极度虚弱，妹妹（景明，两岁）饿得直哭！路上细问才知道今早七点熊大哥要上昆明，尔瑞也要来。大哥说他安顿好了，会来接她。但尔瑞不同意，争执了几句大哥不理登车而去。尔瑞想不通，心想单你会走，卡不著我。于是不顾身怀六甲，带上妹妹搭上九点钟开的车，随后上昆明来。不料车挤风大又冷，而且颠簸异常，她受不了，心脏病发，昏倒在车上。有乘客问了几户人家，都不肯收，怕人死在家怎么办？这一家的老娘念佛，大发慈悲，又颇有经验，认为不致于死才答应收留。

尔瑞看见我们来了，一阵欣喜兴奋，又昏过去了。大哥急了赶快去摸脉，只见他吃惊地叫道，脉都没有了！我见他赶紧找出针药，在吸药时手都发抖。我仔细摸脉尚有但极细微。他慌乱中连打针位置都不顾，我忙上前去说，我打吧！他抬起头来有不信任之状。顾不了这许多了，我把针接过来把他推开点，找准位置，进针快，一次到位，但进药水却十分慢。我知道突然受到刺激，病人心脏吃不消，可能会立即停止跳动。

针打完了，他说看不出我还有这两下，我说一家人四个医生

(指我哥及三弟夫妇)，看都看会了，莫说我还真的学过。于是大家都笑了，气氛较前轻松。他搀扶尔瑞，我把妹妹抱在怀里说，叔叔给你蛋糕吃。立即抽出来一只手，让她拿一个吃，还给她一杯温的开水。她和我见过多次并不陌生。此时尔瑞苏醒过来，用极细弱的声音说话。大哥把耳朵凑近了才听见她说“赶紧走”，大哥转过脸来对我说我们快走吧！

我给了主人家十元。大哥把尔瑞扶起来，想背又怕挤著。我知道他的心情，就自告奋勇说自己力气大，我来背，绝不挤著肚子，但你必须在后面相帮。路不好走，到公路还要上一个小坡，我近车边，转 180 度蹲下来，他坐在车里把尔瑞拉进车内。那晚半钩残月，寒风徐徐，借车内灯光一看，尔瑞经不起背上的摇动和冷的刺激，又昏过去了。我俩面面相觑，我终于把想说的话讲了。我说她一天水米未进，心脏病发极度虚弱，连这五六十米小路都经不住，还有百十里的路程，又不平，能经得起吗？你不怕她虚脱吗？他说那怎么办呢？我建议把她弄回去给她东西吃，休息一夜恢复了再走。大哥同意了。

我又建议由大哥像现在一样的抱著，我用双手帮他支承另一边，我们横著走。驾驶员抱著妹妹并扶著尔瑞的头部，十分钟后我们又回到屋里床上躺好。大哥又给她打一针“可拉命”。我忙著帮主人家煮稀饭调葡萄糖水。不一会，尔瑞醒过来了。大哥也意识到虚脱的危险性，决定不走了。驾驶员说车明天已安排他用，不能等。我们再次商量，决定我先回去，明天两点前开吉普车带兜垫软些，带上我弟媳来接，用慢速开回，最多黄昏可到。他正喂她葡萄糖，我准备走，问他要不要钱，他说不要。我知道他没有带钱，于是趁机将原封的一百元开了封塞到他们被盖里。还怕他不留心挤掉到床里，又抓了几十枚铜币塞在附近被里，留下吃的。一切说妥，急忙赶回家，已夜里三点半了。

在回程的车上，我想起前半月他给我信中提到他想调回昆明。今天下午在厂里他透露了与他后妈不好的口气，以及想找房子出外住的事。结联起来，我想到他可能不便向他父亲开口。于是我想到，帮忙要帮到底。他不便开口，我开口一举数得。回家后胡乱睡了一阵子，天亮了。到七点钟我去向双亲请安并将昨夜发生的事和我的想法都告诉了。父亲说处理得当，并说我对王士坤一家的作风，真可以和古人“托妻寄子”的美德相比拟了，叫我依计划而行。

得到父亲的话，九点多，我赶到民生街熊府见到他父亲，先汇报了昨夜情况，之后又提到水厂今后必由之路，大哥已答应尽力相助。我又说道他想调回，我已和刘存忠科长说妥调局安个闲差事，并拟趁现在有人，如允准，我叫李华清（他父亲认识）带人来搬。我弟及弟媳在军医大学毕业等著分配，可以照应。恰好水厂同事杨钜廷新居落成，前几天才搬走房子空著。我和大哥讲了请他到我那里，白天有事晚上可以共商大计。他父亲先是表扬后答应了。

已近十一点我就在他家吃饭，回到水厂告诉李华清带人去搬家，要弟媳吴秀兰带有关药物针水到水厂，又告诉罗静娴负责布置那搬来的家具行李。十二点过了才出发，开快车想两点左右赶到武定。不料刚看得见富民城，迎面来了一辆卡车，载有十几个人缓缓而来。因路窄我停到一边让它过，忽听得轱石兄大叫，随即卡车停下了。他说尔瑞已恢复多了，早上遇著便车，与司机商量过，轮胎放了些气，缓行已走了四个钟头。吴秀兰快步上车护理，我看尔瑞气色显然与昨天不同，好多了。但大哥不拟再搬上搬下，说你先回到两站等我，吴秀兰留下。我看表已两点多了。他们走后，我调头开到西站打电话安排大哥住房的事情。约莫四点卡车才到，我忙上车拿行李什物，叫看车的小杨抱著妹妹先上

吉普车。熊吴两人把尔瑞抱下车，坐上兜垫，慢慢开行，五点多才到家。

静娴已把菜饭备好，我们吃完饭领著他们到新居一看，窗明几净，布置妥当。他俩人不胜惊喜。把尔瑞安顿好，吴陪著打针吃药。我又和大哥回他家见爸娘，简要地把后半段说了。他爸说道，还不给我跪下道谢。我连忙拉住说此乃好友应尽之责。又谈了一会，他爸说你们也累够了，早点回去休息。于是我们告辞而出。一场危险风波就此告终。回到家只见妹妹正和小伙伴们在灯光下草坪上玩瞎瞎摸鱼，笑声阵阵。她年纪最小，浑身圆鼓鼓，别具风韵，惹人喜爱。

三天后尔瑞完全恢复了。熊大哥请调也批准了，调局工务科。他家也开始烧饭，大家都很融洽，处得很好。前几年跑警报我也常到车家壁他们家。静娴生的第二个孩子不幸夭折，妹妹还吃过静娴的奶呢！他白天得到局应付一下，精力都集中在水厂建的方案上，找水源，图上测定汇水面和算水量，化验水质，找资料，纵谈将来的设想等等，常谈到深夜。杨钜廷也常来参加讨论。47年春夏天开始，实际勘测想定的水源如松水坝上游、宝象河上游干海子、大板桥、呈贡后山、杨宗海、抚仙湖等都跑遍了。下半年开始实测，冬天做内业，忙得不亦乐乎。可是彼此心理上都很高兴。他和杨成了我左右臂，由于他俩都在路局任职，因而仪表测工都无问题。

1947年春一天晚上，我和他谈到十一点多才辞出，他送我出就便解小手，忽然空中一亮，只看一颗红色飞行物自西南向东北飞去，速度很快，我漫不经心地说“好大的流星”，熊说怕不是流星吧！流星绝大部份发白光越来越终至消失，很少落至地面上。这颗星截然不同，怕是盛传的飞碟。说完各自分手，我带著问题久久不能入睡。对于它的动力百思不得其解。

次早各自上班，他来厂说报上有了传闻，西安北京都有人看见。可是时间太晚（当时时间不统一），看见的人不多，足证不是流星。我把昨夜思考不解的动力问题告他。晚上，在我处又谈到这个问题，我想起过去测量时在不同地区磁针会乱转，与所测得水平角相差很大。有一次磁针尽然顶在玻璃上，它的力已胜过自身的重力。想来飞碟的动力一定与磁场有关。只要我们能够将分散的磁力聚在一起，又用电场改变磁场的南北极，造成人为的“聚磁”和“拒磁”的情况下，必可获得较大动力。韞石兄也提起他测量时的发现和我说的的大同小异，此时同学马荣标来了，他先不作声倾听我们的议论，最后也加入论战。他也有相似的看法。后来又专门谈过两次，最后决定由他供给各种永磁材料，我们作实验并记录，目的是要想造出地球上的第一个飞碟。

1947 年秋，杨森任贵州省主席，当贵阳市体育馆落成时，邀请我省派队参加网球友谊赛，并请我父亲去主持开幕式时，曾欲留我任贵州省公路局副局长兼贵阳市工务局长，由于我们有这伟大的构想正在进行，水厂发展的方案也尚未完成，这样的良机我都婉言谢绝了。不料当 1948 年初，我们水厂发展计划三方案完成辗转批准时，由于国事日非，卢汉一心要扩军，中途变卦未能实现。大哥和我都很失望。无法可施只好退而谋其次。因为受到河内市自来水发展的启发，以及我厂已掌美军五套半小型供水设备、近两万根油管，经与大哥商定，自力更生实行分区供水计划。建立“新厂工程处”，聘请后班同学数人，勘定分区的划分、水量、水质等的勘测调查工作，选定较易及迫切需要的两区开始实施拟定滇池为水源从大泊荡取水输至楼外楼，设厂处理日供水 3000—4000 吨，以 3 根油管输水供大观路西坝、篆塘各新村，北至西站一带的供水，并拟利用大西门城楼为调剂水塔，于 1949 年初报市府批准开始实施。但时局日非，进展颇为困难，年底卢汉起义，

此举告终。

起义后虽完全遵照四项号召和约法八章的要求办了，但因自知参与过政治活动的声名在外，恐难逃此劫。于是与大哥秘商，决定根据时势需要，由他表面敌我分清，暗中在账务上导以方便。后我果然被捕入狱，他也如约进行。但是我的同学友好不知内情，对大哥此举大肆攻击，形容得不堪入耳。1953年初我患腹膜炎九死一生，创未愈即押往东北劳改。1964年出狱又被下放农村，虽两次回乡，但由于地位分隔云泥，只因往视尔瑞巧遇一次，未便深谈。

造成彼此不快原因，一方面是友好们都说他如何置我于死地；另一方面，外调者出于需要，回来后审讯他时，提到我的证词时，故意歪曲之所致。彼此难免耿耿于怀。1981年我彻底平反，并被选为人大代表。1982年八大代表中的工程技术人员，组成全市防空系统检查组。我们彼此地位略同。中午休息时，有人故意将XXX，韞石和我，安排同在一屋。而XXX因有病妻在家必须去陪，屋内只剩下韞石和我。这才畅谈别后各自的遭遇与外调情况，之后误会全消，倍感亲切，友谊经多年磨难更加深了。

可惜的是，彼此均年事已高，精力不足。虽有交往，但远不如往昔之亲切。我们曾两次出游，在大观楼见到滇池的臭水，均有不堪比今昔之感。我们又曾到九龙池，只见机房尚存，水则早已枯干多时。触景生情，不禁悲从中来。所幸者，原于发展水厂之计划超理想地如愿以偿了。又有一次，他和我去访马荣标，提到飞碟，大家都还记得也坚信我们的想法，都感到今生已矣！但愿后继有人必会实现这一伟大目标。

1994年间，大哥中风，我赶往探病见完好如初，极为欣慰。他突然问起吴秀兰现在情况，我道湘弟及她俱已作古。他叹曰，“人生不相见，动若参与商”。那年承她精心护理尔瑞，曾几何时

她也去了，言下不胜唏嘘。1996年秋，他知我因原单位拖欠退休工资近2万元，生活十分紧张，又托其妹夫杨校长转赠千元，真如雪中送炭。感愧之余特去诚造府面谢，他云何谢之有，君忘被里面的百余元乎？此乃聊表感念当年之义。我答，昔日之事过后，承兄在账务鼎力相助，提它作甚。这就是我俩最后的一面。1997年初，杨校长告知熊大哥脑病复发，临终前将子女等亲人召至床前，头脑清楚地一一将后事交代清楚，并说明不作遗体告别仪式，悠然而逝！享年83岁。呜乎！一位聪明过人，正直无私，胆大心细，急公好义，心地善良的人，我平生唯一知交竟先别我而上天国，令人悲痛不已，不禁潸然泪下。我曾作祭文又于清明节连同纸钱一并烧祭，读景明之对父母吊忆之启发，再写此文拉杂成篇，藉表友情，以志不忘。

黄湛谨撰

一九九八年

永远的北大荒

黑色文库 第七集

作者/ 黄湛

出版者/ 劳改基金会黑色文库编辑委员会

责任编辑/ 廖天琪 古原

封面设计/ 蓝飞 古原

华盛顿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 作者 黄湛

本书版权为作者所有，劳改基金会拥有中文发行权。非经作者及基金会同意，不得翻印、复制和转载文字和图片。

*本书由劳改基金会设计、编辑及出版。若获盈利，仅用作《黑色文库》的出版费用。

The Everlasting Beidahuang

By Huang Zhan

Black Series, Volume 7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2004

www.laogai.org

ISBN 1-931550-95-6

Printed in Hong Kong

定价: U.S. \$ 15.00

一个被流放的生命和被放逐的灵魂

永远的北大荒

黄湛 著

作者简介

黄湛1916年出生于中国云南一个显赫的家族。父亲是辛亥革命功臣。1935年，他毕业于云大土木工程系，从事铁路勘测，修建公路桥涵的工作。44年起，负责云南昆明市自来水供应工程。49年共产党夺取大陆政权，他兄弟几个都被劳改，有的惨死在劳改营里。黄湛被判15年，并送北大荒劳改。其间他两次几乎被判死罪、被野狼围攻、被暴风雪围困、被饿得奄奄一息……，他尝尽人间苦难。刑满后他被迫留场就业，后又被下放农村。79年被落实政策，恢复自由。80年早期，因他在专业上的长年贡献，两次被选为云南人大代表。黄湛前后30年的放逐，身心备受非人摧残。其妻儿也受牵连，生活在异常艰难的境地。黄湛目前仍居云南。

黑色文库 第七集
劳改基金会

The Everlasting Beidahuang
By Huang Zhan

Black Series, Volume 7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2004

www.laogai.org

ISBN 1-931550-95-6
Printed in Hong Kong
U.S. \$ 15.00

